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
日本研究學位學程碩士學位論文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檢證：
以層次分析觀點（2006~2018）

Research on The China-Japan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The Perspective of Level of Analysis (2006~2018)

指導教授：石原忠浩 博士

研究生：葉曙瑄 撰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謝辭

三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除了政大以外，在最後一年有幸到日本立命館大學進行雙聯學位的交換，是我意想不到的。在三年內完成兩份內容截然不同的論文，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過程中也有因為過於孤單、辛苦、挫折而獨自流淚的時刻，但在身邊有無可取代的支持，讓我終於也走到了這一步。

首先，我要感謝石原忠浩老師。透過石原老師的細心指導以及有趣的課程，使我對日本的政治與外交萌生興趣，也讓我找到研究的方向。在石原老師的課程上讓我學習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課程的討論也刺激了我許多的思考。在老師的推薦之下，我也有幸得到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補助，於 2019 年年底到日本進行實地考察。在此我也要特別感謝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補助，該次的實地考察讓我有機會與對中日關係有研究的多位學者進行對話，也對本論文的撰寫有許多的啟發。

再者，也要特別感謝李世暉老師以及林賢參老師的寶貴意見，在論文撰寫以及修正的過程中，老師們的意見使我的論文架構及內容變得更加完整。此外，我也要感謝第七屆日本研究學位學程的各位同學，與大家一起歡笑的日子至今對我而言仍是無可取代的。今後即便各奔東西，希望未來還能有機會與大家一起通宵玩狼人殺、一起去唱歌、吃飯，大家來到關西時千萬不要忘記約我啊！另外也要感謝在我獨自一人於日本求學，陪在我身邊的まゆかちゃん以及さえちゃん。也謝謝前原學姊，經常透過 LINE 陪在我身邊。因為有她們，怕孤單的我才能在日本順利的完成學業。也因為有她們，我的留學生活才變得更加精彩。最後，我最感謝的仍然是我的家人。謝謝我的爸爸與媽媽在留學時給予的金援，若沒有爸爸與媽媽的支持，我是不可能三年間完成兩份學業的。也謝謝我的家人在背後默默地支持我。總是讓你們擔心真的感到非常抱歉，今後將由我努力的回報你們。

謝謝在這一路上給予我支持的所有人，謝謝你們與我一起寫下了這人生的里程碑。謝謝。

2020/06/28，誌於大阪



摘要

2006 年後，日本為了修補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於後小泉時期透過了一連貫的對話及交涉。最後，中日兩國終於於 2008 年提出了名為「戰略互惠關係」的新的合作框架。然而，自 2009 年民主黨政權上台後，中日關係又降至冰點。於 2013 年第二次安倍政權上台後，日本又開始致力於回復戰略互惠關係的框架。本文著眼於此，欲探討在近年來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兩國產生的作用。本文以中日兩國於 2008 年所簽訂的第四份政治文件《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為主軸，分析了中日兩國在 2006 年到 2018 年落實戰略互惠關係上的成敗。並運用層次分析法，探討影響兩國推行戰略互惠關係時的國際、國內與個人因素。最後，再針對 2009 年至 2012 年的「胡錦濤/民主黨時期」與 2013 年至 2018 年的「習近平/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進行比較，並對日後的中日關係提出相關的見解與展望。

關鍵詞：中日關係、戰略互惠關係、層次分析法、新古典現實主義。



Abstract

In the post-Koizumi period after 2006, Japan entered into a series of dialogues and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to repair their relations, and they ended up with a new cooperation framework called “The China-Japan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in 2008. However,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 have deteriorated since Japan’s Democratic Party came to power in 2009. After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regime since 2013, Japan has been working on the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ain to restore the strategic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is, the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is cooperation framework on both China and Japan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paper, the fourth political document,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Common Strategic Interests,” signed by China and Japan in 2008 is the main axis to analyze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implementing the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from 2006 to 2018. Moreover, the Level of Analysis is adop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national, domestic, and individu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wo countries when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framework. Finally, by comparing the “Hu Jintao/Democratic Party Period” from 2009 to 2012 with the “Xi Jinping/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Period” from 2013 to 2018, the dissertation provides insights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China-Japan relations.

Keywords: China-Japan Relations,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Level of Analysis, Neoclassical Realism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4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5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1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介紹	13
第一節 理論介紹：新古典現實主義.....	13
第二節 文獻探討.....	23
第三章 2006 年至 2008 年：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建立	31
第一節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提出背景.....	31
第二節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成立過程.....	34
第三節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內容與意義.....	44
第四節 此階段的中日關係的發展.....	50
第五節 小結.....	54
第四章 2009 年至 2012 年：胡錦濤/民主黨時期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55
第一節 國際體系層次.....	55
第二節 國內政治結構層次.....	72
第三節 個人或決策層次.....	78
第四節 前途艱難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85
第五節 小結.....	91

第五章 2013 年至 2018 年：習近平/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92
第一節 國際體系層次	92
第二節 國內政治結構層次	98
第三節 個人或決策層次	106
第四節 走向穩健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111
第五節 小結	118
第六章 結論	120
第一節 本文回顧	120
第二節 對研究問題的解答	121
第三節 本研究的意義	125
第四節 未來的研究方向	126
參考文獻	127



表次

表 1.1 各學者與其所主張的層次分析結構.....	7
表 2.1 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異同比較表.....	20
表 2.2 日本探討中日關係的相關文獻.....	28
表 2.3 中國探討中日關係的相關文獻.....	29
表 3.1 中日確立戰略互惠關係的發展過程及中日戰略對話概要.....	43
表 6.1 胡錦濤/民主黨時期與習近平/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成果概述表.....	121



圖次

圖 2.1 新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模型.....	15
圖 2.2 第一類與第二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模型.....	16
圖 2.3 第三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模型.....	19
圖 3.1 中日貿易額變遷.....	34
圖 4.1 中國、日本、美國的 GDP 總值.....	60
圖 4.2 中國的國防預算表.....	61
圖 4.3 2009 年至 2010 年日本國民對中好感度變化.....	70





第一章 緒論

在本章節中將對本文做出背景概要的說明。首先於第一節中將介紹本文的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接著於第二節中提出本文的研究問題。在第三節中則將介紹本文的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並說明運用該研究途徑與方法的意圖。最後在第四節中則是簡述本文的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在邁入 21 世紀後，日本與中國之間的交流愈趨頻繁。¹地理位置相近的日本與中國，彼此在經濟上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根據日本財務省貿易統計的官方資料，於 2000 年時，日本的最大出口國為美國(佔出口總額的 29.7%)，中國僅位居第四(佔出口總額的 6.3%)。然而到了 2017 年，雖然美國仍位居第一(佔出口總額的 19.3%)，中國位居第二(佔出口總額的 19.0%)，然而兩者佔日本的出口總額的差距卻急遽拉近，僅相差了 0.3%。而就進口面而言，於 2000 年時，日本的最大進口國為美國(佔進口總額的 19%)，中國位居第二(佔進口總額的 14.5%)。而到了 2010 年時，中國就已超越美國成為日本的最大進口國，而此狀態也一直維持到了 2018 年。²由此可見，中國對日本在經濟面上所持有的重要性。

然而，在經濟往來愈趨密切的中日之間卻同時仍存在不少問題。除了傳統上歷史認識的分歧以外，亦有領土方面的紛爭，這些因素使得兩國關係往往處於不穩定的狀態。自小泉純一郎總理時期開始，中日之間就因首相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歷史教科書問題、東海的領土資源問題、日美安保條約的範圍爭議以及中國反對日本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等因素產生激烈衝突。³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¹ 本文的「中國」意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意指台灣時將會以「台灣」或「中華民國」表示。

² 財務省貿易統計，日本財務省，<http://www.customs.go.jp/toukei/info/tsdl.htm>。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³ 毛里和子，(2006)。日中關係 戰後から新時代へ。東京：岩波書店。頁 177-186。

中日兩國形成了所謂「政冷經熱」的現象。以此為背景，繼任的自民黨首相們也開始積極著手修復惡化的中日關係。在眾多的作為中，最顯著的成果即為在 2008 年中國領導人胡錦濤訪日時，與時任首相福田康夫簽訂了《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確立了兩國推動關係改善的共識以及方向。

2009 年，日本政權交替，結束了戰後長期主導日本政治的自民黨政權，由民主黨上台執政。中日關係雖然一度在鳩山由紀夫執政時因其個人欲試圖推動「東亞共同體構想」而有向前邁進的跡象，但其卻因與美國之間的「普天間遷移問題」無法解決而在短短 10 個月後辭職以承擔責任，因此在其執政的期間內並沒有在中日關係上帶來顯著的成果。而在 2010 年，中日關係又因釣魚台撞船事件急轉直下，爾後於 2012 年所發生的釣魚台國有化事件也讓中日關係跌落谷底。這促使於 2012 年底再度上任的自民黨首相安倍晉三在外交上重新重視中日關係的修復。其亦在 2013 年年初即在記者會上表示：「即便日本在釣魚台等領土問題上不會對中國進行退讓，但希望中日兩國能回到戰略互惠關係的原點，建立起相互理解且相互尊重的關係。」⁴ 除此之外，其亦在朝日電視台的時政節目「報道ステーション」中公開表態其在上任後的對中政策之方向，並表達其自身對中日關係的看法，再次強調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重要性，充分顯示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這個框架的關心與重視。⁵

貳、研究動機

如前所述，日本在小泉純一郎首相執政後，中日關係陷入了僵局。除了雙方領導人停止往來以外，在民間，對彼此的感情也受到挫折。然而，在雙方有識人士的呼籲下，加上中日關係的改善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勢不可擋，以此為背景繼

⁴ 安倍內閣總理大臣記者會見，**首相官邸**，2013 年 1 月 11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111kaike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7 月 9 日。

⁵ 安倍：中日應恢復戰略互惠關係，**BBC 中文網**，2013 年 1 月 22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01/130122_abe_china.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7 月 9 日。

任的自民黨首相安倍晉三便於 2006 年 10 月訪問北京，並首度提出了所謂的「戰略互惠關係」。在輾轉經過多次的協調後，於 2008 年 5 月中國領導人訪日時中日雙方便達成了共識，定調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交流框架。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不僅為中日關係帶來新的定義，當中所明定的五大領域也是近年來中日兩國欲大力開展合作的目標。此五大領域分別為：增進政治互信、促進人文交流，增進國民友好感情、加強互利合作、共同致力於亞太地區的發展以及共同應對全球性課題。⁶倡議建立此框架至今已過十餘年，其是否在中日關係上產生了實質的推進效果？亦或只是淪為一種政治口號？至今兩國在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上有著什麼樣的成功與失敗？此為筆者透過本研究探討的核心之一。

而在這些年間中，國際上亦發生了不少事件，如：2007 年至 2008 年的金融海嘯、北韓自 2006 年開始愈演愈烈的核武與飛彈問題威脅東北亞的區域安全、近年來逐漸浮上檯面的南海爭議等等，這些國際事件均對日本的對外政策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國際上所發生的事件為日本在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實踐上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除了國際局勢的轉變所帶來的衝擊以外，這些年間日本國內亦經歷了政黨輪替，在這樣的情況下，領導人的個人政治理念及國內政治的轉換是否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產生了影響？筆者欲透過整理這十餘年間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整體發展脈絡，找出影響日本在推行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上的關鍵因素。

唯若單獨探討日本方的影響因素，將使本研究過於偏頗且不完整。再加上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非由日本單方面即可實行的，而是需要兩國的相互配合與協調才能使雙邊關係變得更加圓滑，因此本研究亦將以中國的立場為分析單位進行相關探討。除了簽定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十分期待與日本在此框架上進行交流以外，繼任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也數度於公開場合表示：「中方願

⁶「戰略的互惠關係」の包括的推進に関する日中共同声明，日本外務省，2008 年 5 月 7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0805_k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2 日。

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繼續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⁷顯示中國即使在對日關係上遇到挫折，也欲重新回歸戰略互惠關係的框架。中國在這樣的心態，其在各個階段對日本在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框架下所做出的種種舉動給出了什麼樣的回應？這樣的回應是否有助於中日關係的改善以及成長？又或者是更加打壓了中日關係？以及除了國際上的變遷外，中國國內亦在這段期間進行了領導人的更迭，其國內的政治因素是否亦為其在外交上的對日政策帶來變數？此亦為筆者欲透過本研究更深入探討的部分。

日本與中國互為鄰國，地緣上的相近使兩國在各層面上長年以來皆有所接觸。尤以國際化的潮流與趨勢之下，日本與中國在社會、文化、人才交流等層面上的接觸愈發頻繁。在國際情勢快速流動的此時，日本與中國若持續維持「政冷經熱」的模式相處的話，將有可能對中日兩國皆產生負面影響。再加上現今中日兩國在亞洲同為深具影響力的國家，兩國關係也勢必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整個亞洲的國際秩序。因此，筆者認為研究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這個框架之執行面將有助於理解中日關係的互動，也希冀能夠透過本研究，了解現今中日關係間仍存在的阻力，並為往後中日關係的提升提出相關建議。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綜上所述，21 世紀以來的中日關係，雖然因著各種歷史上、領土上等爭議而較為僵化。即便如此，因全球化的影響使中日雙方的依賴度日漸升高是為不爭的事實。為了促進雙邊關係並增進共同利益，中日雙方還是有試圖做出努力。為突破「政冷經熱」所帶來的侷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便是在這樣努力上所形成的產物。

⁷ 習近平向安倍闡明中方對中日關係的原則立場，人民網，2013 年 9 月 6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06/c1024-2282404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8 月 31 日。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為要去理解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本質、內涵、以及戰略互惠關係是否只是淪為一個政治口號，或是其在中日關係中起了相當的作用？因此在本文中，筆者將試圖透過在國際上的外交政策及其影響因素的實務及學說上的討論與操作，輔以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案例作為基礎進行深入的探討。以下將根據上述的研究目的，列出幾點本文之主要研究問題：

- 一、至今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成敗如何？以及其為中日關係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 二、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中規定中日雙方在五大領域中建構對話與合作的框架，近十餘年來中日雙方在五大領域中有什麼樣具體的實踐？
- 三、影響日本與中國在實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上的各項因素為何？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壹、研究途徑：層次分析法

本研究的研究途徑將採用「層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這是因為中日關係中涉及的層面過於廣泛，並不是能用單一的視點去說明的。為了能夠掌握戰略互惠關係的全貌，也為了能夠更有系統且更有脈絡地去整理出影響中日兩國實現戰略互惠關係的因素，本文欲應用能夠分析跨越國際、國內以及個人等各層面的「層次分析法」來進行研究。

一般而言，現實主義學者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被認為是最早開始提出層次分析法的學者。其在 1959 年的著作《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中透過三個意象來詮釋戰爭發生的原因，此即為分析國際關係的三個層次框架(three-level framework)。根據肯尼思·華爾茲，此三個層次為：第一層次國際體系層次(international system level)，第

二層次國內政治結構層次(domestic structure level)以及第三層次個人或決策層次(individual or decision making level)。⁸

除了肯尼思·華爾茲以外，另一位將層次分析法應用於國際關係研究中的重要學者則是大衛·辛格(J. David Singer)。他曾公開指出，層次分析法是國際關係方法論中最有力、最具說服力的方法。其在《國際關係中的層次分析問題》一文中強調了國際系統及國家子系統的理論內涵及重要性。進而更將國際關係的研究劃分為兩層次架構：國際體系和國家。透過對這兩層次的比較，試圖在國際體系層次和國家層次之間實現平衡。大衛·辛格指出，國際體系是最全面、最具綜合特徵的層次，其使研究人員能夠從宏觀上把握國際關係的規律；而國家則是微觀層次，可使研究人員分析國家政策和行為的細節。⁹

而肯尼思·華爾茲在 1979 年的著作《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試圖將國際政治系統化。其認為在面對複雜的國際政治時，若能以越少的自變項來解釋越多的依變項，則其「簡潔性」越高，且認為一個好的理論必須具有相當的「簡潔性」，以便分析變項間的因果關係。¹⁰因此其在後來建構結構現實主義理論(structural realism)時，拋開了個人及國家層次，選擇了以國際體系層次為主軸來進行相關議題的分析。¹¹

而在 1990 年代，結構現實主義開始受到了許多挑戰，許多學者因其無法正確地解釋或預測冷戰的結束而對其提出質疑。其次，冷戰後來自國際結構的安全壓力全面緩解，國內因素的影響力開始上升。加上隨著冷戰的結束，民主化的浪潮興起，釋放了許多先前被冷戰的國際結構所制約的國內力量。最後，全球化的加速使國際與國內的界限日益模糊，國家以外的行為體的國際影響力亦逐漸上升。

⁸ Kenneth Waltz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238.

⁹ David Singer (1961).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4(No. 1), 80-89.

¹⁰ 宋學文，(2009)。國際關係的理論與應用 入門、進階與研究設計。台北：五南書局。頁 182-184。

¹¹ 李巍、王勇，(2006)。國際關係研究層次的回落。《國際政治科學》，2006 年第 3 期，頁 113-114。

¹²因此許多學者開始在繼肯尼思·華爾茲與大衛·辛格後，愈來愈多的學者開始將層次分析的單位加以切割，試圖將其修正得更為完整。如詹姆斯·羅斯諾(James Rosenau)提出了五個分析層次變數，分別為：個人、角色、政府、社會、國際系統。¹³還有布魯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哈威·斯塔爾(Harvey Starr)將前者的層次體系加以改良，提出了六個層次結構，分別為：世界系統、國際關係、國內社會、國家政府、決策者角色、決策者個人。¹⁴

表 1.1：各學者與其所主張的層次分析結構

代表學者	主張的層次分析結構
Kenneth Waltz	國際體系層次、國內政治結構層次、個人或決策層次
J. David Singer	國際體系層次、國家層次
James Rosenau	個人層次、角色層次、政府層次、社會層次、國際系統層次
Bruce Russett、Harvey Starr	世界系統層次、國際關係層次、國內社會層次、國家政府層次、決策者角色層次、決策者個人層次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相關資料。

二、層次分析法運用在日本對外政策研究的現況

由於本文涉及中日關係，因此作者欲在此稍微提及層次分析法在日本的相關發展。在日本，肯尼思·華爾茲的理論發展並不像在歐洲一般的受到關注。肯尼思·華爾茲的理論提出是於其前述 1959 年的著作《人、國家與戰爭：一種理論分析》(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中，而在 1979 年的著作《國際政

¹² 同前註，頁 116-118。

¹³ James N. Rosenau (1980).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ichols Publishing Company. pp.115-269.

¹⁴ Bruce Martin Russett and Harvey Starr (1992). *World Politics: A Menu for Choice* (4th Ed.). New York: W. H. Freeman. pp.11-17.

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中試圖將國際政治系統化，為國際政治學領域的發展帶來一大進步。然而，在當時日本並未給予一定程度的重視，這是因為在當時日本的學界仍大力主張「相互依存論」，強調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連結、政策決定論、非國家主體的重要性並否認大國中心主義。即便在當時盛行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及霸權體系(Hegemony System)受到了日本學界的重視，肯尼思·華爾茲的主張卻未吸引日本國際政治學者們的目光，至今仍是如此。¹⁵

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日本的國際政治學界比起結構主義的抽象性，更加愛較為具體的討論與操作。二是日本學界較為重視與本國對外政策有直接相關且具實踐性的研究。舉例來說，雖然日本學界並未重視肯尼思·華爾茲的理論核心「結構主義」，卻非常重視其相關議題，如核武擴散的問題等等。¹⁶

即便如此，在日本仍有些許運用層次分析法進行研究的實例。如：林隆司在《「日韓軍事情報包括保護協定(日韓 GSOMIA)締結延期の要因分析」—署名1時間前の土壇場で政策変更された背景にあったもの—》一文中便運用層次分析法分析了2012年日本與韓國在簽訂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時突然延期的原因。¹⁷小池修也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のなかの日韓関係—国際関係理論からみた過去と展望—》一文中運用了同樣的手法，對影響日韓關係發展的各項因素進行了整體的分析。¹⁸長年以來，影響中日關係的因素並不是單一的，而是受到各項複合式因素的影響，進而形成複雜的雙邊關係。且筆者認為在研究中日關係時，著重在單一層面上固然有其意義存在，但如此一來研究便將缺乏整體性。中日兩國的對外政策長年以來皆受到國際、國家及個人層次此三個變數的影響，唯在不同的時

¹⁵ 岡垣知子，(2016)。ケネス・ウォルツの日本的受容。載於大矢根聡(編)，日本の国際関係論。東京：勁草書房。頁156。

¹⁶ 同前註。頁163-167。

¹⁷ 林隆司，(2014)。「日韓軍事情報包括保護協定(日韓 GSOMIA)締結延期の要因分析」—署名1時間前の土壇場で政策変更された背景にあったもの—。海幹校戦略研究，第4卷第2号，頁76-98。

¹⁸ 小池修，(2015)。東アジア国際政治のなかの日韓関係—国際関係理論からみた過去と展望—。危機管理研究，第23号，頁39-48。

空條件下，三個變數的影響力大小有所不同。因此筆者試圖在本研究中透過層次分析法來分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希望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切入，進行整體性的分析，並為日本的對外政策研究帶來新的觀點與看法。

三、小結

綜上所述，層次分析法在經歷時代的變遷後有不同的衍伸，運用於研究時也有不同的方式。由於本文為中日關係之研究，在日本及中國，國內政治及領導人的影響力不亞於國際因素所為兩國的關係所帶來的影響。因此，筆者在本研究中選擇回歸至肯尼思·華爾茲最開始提出的三個分析層次，藉由探討此三個層次在中日關係的相互作用及影響，分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於這段期間的發展。

在國際層次方面，本次研究將聚焦在探討中日之間的相互依賴性、中日兩國對彼此的態度以及東亞的整個國際局勢。國家層次的部分，本文將以日本與中國兩國的國家利益及政府策略為主軸、輔以兩國的國內政治因素進行探討。最後在個人層次的部分，將探討中日兩國的歷屆領導人其個人的對中日關係的期望、選擇與行動以及其個人風格並加以分析。並希望能透過這些部分的探討，了解日本在這些年中推行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背景，在此之上加以分析其推動的實質成效。

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為了達成上述所列之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將採用質化分析中的文獻分析法 (document analysis)。文獻分析法是一種根據特定的議題，透過蒐集與該議題相關的文獻資料並加以整理、分析並系統化的過程，用以幫助研究者釐清並掌握研究議題的研究方法。¹⁹而文獻的種類可以包含會議紀錄、新聞媒體所刊載的內容、

¹⁹ 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2000)。研究^{方法}：步驟化學習指南(Ranjit Kumar 原著)。台北：學富文化。頁 31-40。

演說、日記、口述歷史、官方聲明、公文、書信等等。文獻分析的功能主要在於能夠幫助研究者透過文獻了解事件發生的過程、經歷的階段以及在每個階段所引起作用的是那些事件。也能透過文獻了解當事者的想法與動機、涉入該議題的相關人物及其立場。²⁰

本研究將以「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之內文為主幹，輔以中日雙方的政府官方資料、公開聲明、兩國相關的媒體報導以及實踐戰略互惠關係的具體事例來對本次的研究問題進行分析與探討。希望能夠藉此找出在各階段影響日本對中政策以及中國對日政策的國際、國家及個人因素，並以此為基礎來分析戰略互惠關係上的實質成果。也希冀能透過這樣的資料分析與整理，對這段期間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做出整體性的評價。

二、比較分析法

比較分析法(comparative analysis)是一種針對兩種事物或多種事物的資料進行比較與對照並加以分析，藉此了解研究標的間異同的一種研究方法。其基本原理可分為兩種：比相同與比差異。比相同的目的在於作出同因必同果的解釋與預測，而比差異的目的則在於證明不同因不同果。²¹本次研究將以後者之比較法為主軸，並以日本及中國兩個主體進行單一國家內的比較。在日本方面，筆者欲試圖比較日本民主黨時期以及自民黨時期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層次分析；而在中國方面，則欲比較胡錦濤時期與習近平時期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層次分析。期盼能夠透過這樣的比較，分析影響中日兩國在不同政權下所展開的對外政策，在中日關係上所帶來不同成果的主要因素。

三、深度訪談法

²⁰ 石之瑜，(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五南文化。頁 184-199。

²¹ 王玉民，(1994)。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台北：洪頁文化。頁 247-249。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屬非結構性訪談中，普遍使用的一種方式。非結構性訪談為質性研究中很常用的資料收集方式，幾乎是所有的質性研究原理背後之特徵的體現。深度訪談是「研究者和訊息提供者直接反覆的面對面接觸過程，以期藉訊息提供者自身的表達方式，來瞭解其對生活、經驗或情境的觀點」。²²

深度訪談的優點在於能夠使研究者對本研究議題展開由淺入深的調查，以探討較深層次的問題，並補足原先研究中所缺乏之大量、詳細及深入的資料。本次研究有幸獲得「日台交流協會」的短期實地調查補助，筆者於 2018 年 12 月赴日訪問在中日關係有深入研究的專家學者。本次一共走訪了東京與京都兩地，並訪談了四位對國際關係研究的學者以及參與中日文化交流事務的相關人士。分別是東京大學的松田康博教授、早稻田大學的平川幸子准教授、國際交流基金日中交流中心的塩澤雅代小姐，以及立命館大學的中戶祐夫教授。雖然在本次論文中並沒有直接引用訪談內容，但透過與四位專家的對話，對筆者在撰寫本論文時的研究方向給予了許多的幫助。透過這樣的訪談，也使筆者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上日方的觀點有更深入的了解，也使本文的構成更為完整。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次研究的時間範圍選定在 2006 年至 2018 年，原因是雖然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是於 2008 年，然而戰略互惠關係此一概念於 2006 年即被當時的首相安倍晉三所提出，為了完整探討戰略互惠關係的建構過程，並使研究結果變得更為完整，因此研究的起始時間選定於 2006 年。而本文開始的撰寫時間點是於 2018 年，故此將以 2018 年作為研究的結束時間。

²² 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2000)。研究^{方法}：步驟化學習指南(Ranjit Kumar 原著)。台北：學富文化。頁 246-247。

貳、研究限制

戰略互惠關係在 2018 的時間點仍為現在進行式，在這個時間點上日本的安倍內閣尚未解散，中國的習近平政權的執政也正持續著，因此筆者在進行 2013 年至 2018 年此一階段的戰略互惠關係分析時，僅能做出階段性的結論，無法給予整體性的評價。另外，雖然本次有幸訪問日本籍學者以獲得日方更深入的觀點，然而在訪問中國籍學者的部分稍有困難。再加上中國政府所提供的對日政策的官方資料有限，因此筆者將以中國所釋出的官方資料為主，再輔以中國現有的研究文獻及新聞報導來彙整中方的觀點。希冀能透過這樣的分析，盡可能使本文的內容變得更為完整。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介紹

在本章節中，第一節將首先介紹本文所使用的理論「新古典現實主義」。透過瞭解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起源、分類及優缺點，將使筆者更加了解該理論的內涵。而在第二節中，則將探討至今對中日關係的相關研究成果，並將相關研究分為以下四大類，分別是：「歷史認識問題」、「領土資源問題」、「經貿交流及發展」以及「戰略互惠關係」。

第一節 理論介紹：新古典現實主義

壹、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起源

冷戰結束後，國際體系的秩序也開始改變。從原本的美國、蘇聯兩大陣營的雙極結構轉變為單極結構，自 1970 年代開始興起的新現實主義也因為無法解釋冷戰的結束而受到挑戰。這樣的挑戰主要來自於三個層面：第一、國際行為的主體問題。肯尼斯·華爾茲雖然主張：「國家不是而且從來不是唯一的國際行為主體，而是主要的行為主體。」²³但在冷戰後國際社會上的非國家行為主體開始增加，且其作用力不亞於國家此一主體，成為國際上一個重要的行為主體。第二、國際社會狀態的問題。新現實主義主張國際體系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強調國際體系中不存在最高政治權威。然而，建構主義卻反駁無政府狀態不是國際體系固有的東西，而是行動主體在互動中建構起來的社會狀態。第三、結構選擇的問題。新現實主義十分強調國際體系的結構，然而新自由主義則認為新現實主義過分強調了國際體系的結構，因而忽視了國際體系中的進程。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指出國際體系應包含兩個層面，一個是體系中的結構，另一則是體系中的進程。進程指的是體系中單位相互作用的方式，包括單位元在相互作用中建立起來的組織機構和相互交往中所遵循的規則。²⁴

²³ Kenneth Waltz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²⁴ 秦亞青，(2005)。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及其批判。《國際政治科學》，2005 年第 2 期，頁 153-166。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針對現實主義進行改良的學者也不在少數。新古典現實主義是現實主義的分支，也是一種近年來於國際關係領域中興起的理論。該分支將新現實主義和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加以批判吸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理論特色。其概念最早是出現於 1990 年代，而「新古典現實主義」一詞最早是在 1998 年被吉登農·蘿絲(Gideon Rose)所提出。其在期刊《世界政治》上所發表的文章評論了當時代表新古典現實主義研究路徑的五本著作，也區分了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其他現實主義分支的不同。為學者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先的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研究做出整理，也為此一新興理論奠定了進一步的發展方向。吉登農·蘿絲也主張新古典現實主義是繼國內政治學派(Innenpolitik)、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及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後的第四個學派。回應上述新現實主義所面臨的第三個挑戰，新古典現實主義主張國際結構的影響須要經過國家層次中的中介變相才能形成外交政策，故不應只注重於國際結構的層次，也應該將結構中的單元(unit)因素加入考量。²⁵

貳、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內涵

一、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強調國際結構作用的新現實主義不同，其主張將國際體系和國內政治結合起來，分析國家內部結構如何對外在威脅和機遇進行過濾，以及國家領導人如何去評估威脅、制定國家戰略、動員社會資源以支持這些戰略，以建立一種解釋國家行為的外交政策理論。雖然新現實主義擅長於解釋國際政治所產生的結果，但因其過於宏觀和抽象，因而難以解釋具體的國家行為。具體來說，新現實主義既不能解釋當國際體系的結構穩定時國家採取某項具體外交政策的原因，也無法說明不同國家對國際體系的結構變化及其方向的認同一致時為何會採取不同的外交政策的原因。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這種解釋力不足有兩

²⁵ Gideon Rose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51(No.1), pp.144-172.

個原因，一是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具有同質性，因而忽略了權力之外的其他因素；另一則是新現實主義把國家看做是「黑箱」，因此國家只能對結構及其變化做出回應。另外對於傳統的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一方面肯定其對國內情況的差異性和影響外交政策的諸多國內因素的考慮，另一方面則也認為其忽視了國際體系的主要因果作用，也不符合嚴格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要求，使其難以適應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需要。²⁶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可以說是兩者的結合，試圖改善上述的缺點，將國際體系與國內因素一併納入考量，為現實主義開闢一個新的視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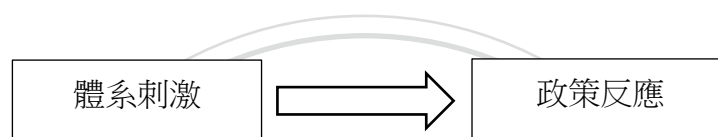


圖 2.1：新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模型。資料來源：劉豐、張晨，(2017)。新古典現實主義 國際政治理論(No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and Steven E. Lobell 原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8。

二、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種類

(一) 第一類新古典現實主義

第一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目標是用於「解釋異例」。其認為國際體系雖然給國家發出了清楚且明確的信號，但這些信號必須要經過國內領導人所接受到的認知與國內政治的傳送才能產生國家的政策反應。在某些情況下，這些信號有可能被領導人所誤解，又或是領導人受到國內政治與環境的約束，因此國家無法做出合理的反應。換句話說，第一類新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新現實主義所提出來的「制衡」的概念在多數情況是適用的，只有在領導人產生錯誤認知或有國內政治的干擾時，才會需要用到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來解釋國際上的不尋常情況。²⁷

²⁶ 劉若楠，(2010)。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進展與困境—評《新古典現實主義、國家和外交政策》。《國際政治科學》，2010年第2期，頁135-146。

²⁷ 劉豐、張晨，(2017)。新古典現實主義 國際政治理論(No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and Steven E. Lobell 原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23-24。

(二) 第二類新古典現實主義

第二類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前者不同，其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不應以只能「解釋異例」為前提，它應該也要能更廣泛的解釋國家外交政策的選擇與大戰略的調整。其認為當國際體系釋出訊號後，國家在大多數情況之下，當國際環境沒有緊迫的威脅之時，通常都有一系列的政策選項提供選擇，而非只有一種明確的最佳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的政策選擇實際上更取決於領導人的世界觀、國家的戰略文化、國內政治聯盟的性質與國內政治的約束力。因此更多關於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文獻關注於國家對外交政策的選擇，而非僅止於解釋國家政策選擇的反常狀態。第二類新古典現實主義與前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其認為新古典現實主義應是一種獨立的外交政策理論，而非是一種為了解釋新現實主義的異例才出現的矯正性理論。²⁸



圖 2.2：第一類與第二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模型。資料來源：劉豐、張晨，(2017)。新古典現實主義 國際政治理論(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and Steven E. Lobell 原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26。

(三) 第三類新古典現實主義

上述的兩類新古典現實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們在理論中導入了一系列的單元及次單元變量，而這些變量在國際體系給予刺激與國家對外政策反應之間發揮中介作用。然而，這兩類新古典現實主義都沒有對由國際體系所提供的刺激的性質，可能對認知、決策制定和政策執行的中介過程產生影響的國

²⁸ 同前註，頁 25-26。

內因素等方面進行詳細的詮釋。除此之外，其將解釋範圍限定於國家所做出的政策選擇，而沒有將這些決策可能對國際體系的結構變遷等更廣泛的國際現象納入考量，因此就理論而言不盡完整。第三類新古典現實主義著眼於此，其更詳盡的解釋了國際體系刺激（自變量）、國內政治的因素（中介變量）及解釋範圍（因變量），增加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解釋力。²⁹

三、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構成

（一）自變量

與新古典主義一樣，新古典現實主義假定國家是國際體系的主要單元，但其也不否定現今國際舞台上非國家行為體的存在。其也繼承了新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國際政治是在一個資源有限且各方意圖與實力都不明確的世界中，為了爭奪權力及影響力而展開的競爭。但與新現實主義不同的是其在體系層次的核心變量是國際體系給國家呈現出的信號，其也導入了「清晰度」的觀念，認為刺激的可識別度也影響了國家政策的選擇。³⁰除此之外，其也導入了國家戰略環境的概念。戰略環境與國家所面臨的危機或是機遇的緊迫性及大小有關，換句話說，若危機或機遇迫在眉睫，國家自然能做出的選擇就相對較少；若危機或機遇較為遙遠，國家所能做出反應的時間以及相對選擇也會變多。³¹

（二）中介變量

新古典現實主義將中介變量分為四大類，分別是：國家領導人的意象與認知、戰略文化、國家-社會關係與國內制度的安排。領導人的意象指的是外交政策的

²⁹ 同前註，頁 33-34。

³⁰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and Steven E. Lobell (2009). "Conclusion: The state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ed. Steven E. Lobell and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80-299.

³¹ Norrin M. Ripsman (2009).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in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ed. Steven E. Lobell and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70-193.

執行者的認知，因此其不僅包含最高領導人，其也包含了關鍵內閣成員、外交政策顧問等核心成員。而國家的戰略文化則能影響國家適應國際體系刺激和物質實力的結構性轉變的方式，一國的戰略文化將會形成政治領導人、社會菁英甚至是民眾對國家的戰略理解。國家-社會關係指的是國家的核心制度與各個經濟或社會集團間的互動特徵，其中涉及了社會對領導人的對外政策的服從程度、民眾對整體對外政策的支持度、不同利益團體間爭奪國家或相關利益的分配性競爭等等。最後，國內制度的安排則將前述的國家-社會關係具體化，其決定了哪些人可以參與國家對外政策的形成、在政策過程的哪個階段可以參與以及是否有政策否決權。上述的種種因素都影響了國家在應對國際體系所帶來的刺激時，其所能應對的能力及應變彈性。³²

(三) 因變量

新古典現實主義主張其不僅能解釋國家對國際環境建構政策的反應，其在時間的推移下亦能透過累積主要大國的政策選擇、戰略集合以及這些政策間的互動，進而對國際體系結構產生深刻的影響。其主張其能以更廣泛的視角解釋國際政治，因為在中長期的時間範圍內，主要大國的戰略選擇間的互動將會影響到國際結果。由於這些戰略選擇本身不僅只是國家對國際體系結構的反應，同時也是經過大國國內政治安排下的產物，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比單純的體系理論更具說服力。³³

³² 劉豐、張晨，(2017)。新古典現實主義 國際政治理論(Ripsman, Norrin M./ Taliaferro, Jeffrey W./ Lobell, Steven E.原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58-71。

³³ 同前註，頁 8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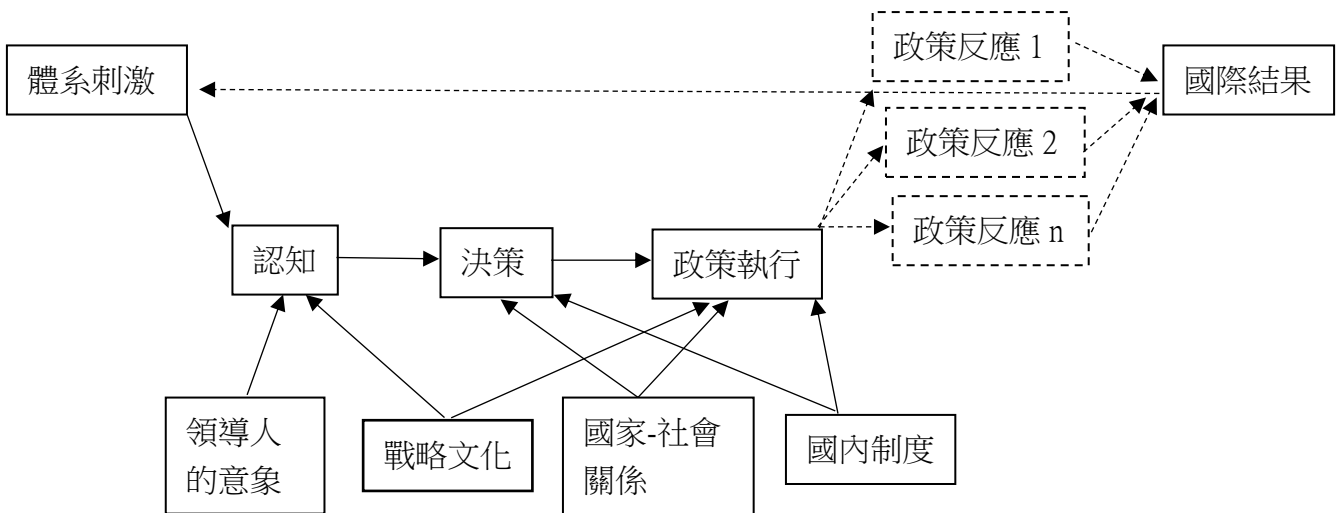


圖 2.3：第三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模型。資料來源：劉豐、張晨，(2017)。新古典現實主義 國際政治理論(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and Steven E. Lobell 原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34。



表 2.1：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與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異同比較表。

理論名稱	認識論與方法論	體系觀	單元觀	因變量	基本因果邏輯
古典現實主義	歸納法、關於政治本質的哲學反應或詳細的歷史分析	比較重要	異質	國家的外交政策	權力或利益分布→外交政策的產出
新現實主義	演繹法、定性與定量分析	非常重要、內在的競爭性與不確定性	同質	國際的政治結果	相對權力分布→國際政治結果
新古典現實主義	演繹法、定性	重要、無政府狀態對決策的影響是會變化的，有時是不明確的	異質	國家的外交政策(有時會反過來影響國際的政治結果)	相對權力分布→國內各項約束與精英認知→外交政策的產出

資料來源：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ed. Steven E. Lobell and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p.20

四、新古典現實主義的缺點

新古典現實主義雖然試圖補足新現實主義的缺陷並為國際關係帶來新的解釋，但同時其也招致許多批判的聲浪，對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批評主要可以分為四個部分。

首先，新古典現實主義缺乏核心概念，使其理論過於鬆散。現今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建立了過多的分析模型，但其分析模型沒有一個一致的框架，使其缺乏內部的凝聚性與統一性。

第二、雖然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因素對國家的外交政策起了主導性因素，然而在研究中卻往往透過案例的選擇來控制結構誘因，放大某幾個國內因素的作用。將國際結構變數控制後只專注於國內變數的操作，使新古典現實主義受到批評，認為其與其說是國際關係理論，更像是一個國內政治理論。簡言之，有學者認為在新古典現實主義中結構層次的變數僅被視為背景性因素來考察，並沒有實現真正的跨層次分析。

第三、新古典現實主義者在處理結構與單元之間的關係上沒有共識，而是模糊地認為二者相互影響，即結構和單元因素都不是完全獨立的，也沒有明確的指出結構及單元在理論中的位置。

最後、除了沒有釐清結構與單元的相對位置以外，新古典現實主義在國內因素模型的設計和國內因素的操作上尚不成熟。³⁴簡言之，新古典現實主義雖然可以突出某個國內因素的影響，但難以對其影響的程度與範圍進行進一步的分析，整體而言其理論的嚴密性尚有待提高。

五、小結

經由上述的文獻考察，可以了解新古典現實主義在發展中演變出了三種模型。在本研究事例中，筆者欲引用第三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框架進行分析。這是因為在探討中日關係之時，除了必須探討國際體系給予國家對外政策的刺激以外，也必須探討國家做出的決策選擇對國際體系所造成的影響，才能使研究更為完整。

綜上所述，新古典現實主義確實為國際關係帶來新的詮釋，然因其尚在發展中，作為國際關係理論確有不足之處。然而本文仍選擇以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來切入並分析中日關係，這是因為中日關係有其特殊性。除了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是一個重要因素以外，在中國與日本的國內政治因素所帶來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³⁴ 劉若楠，(2010)。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進展與困境—評《新古典現實主義、國家和外交政策》。《國際政治科學》，2010年第2期，頁135-146。

尤以中國現行的領導體制而言，中國國內因素更可被視為對日外交政策的主要動因。而近年來，中日兩國的輿論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大，因此筆者欲從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將兩國的國內情勢一併納入考量，使整體的分析變得更加完整。



第二節 文獻探討

雖然影響中日關係變化的因素眾多，然而在本段落中筆者將聚焦在「歷史認識問題」、「領土資源問題」、「經貿交流及發展」以及本文之研究標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進行先行研究的探討。

壹、歷史認識問題

在日本及中國皆有許多關於中日兩國歷史爭議的研究。如笠原十九司所編著的《戦争を知らない国民のための日中歴史認識 『日中歴史共同研究<近現代史>』を読む》中，以 2010 年中日兩國針對歷史問題的共同研究所發表的研究報告書為主軸，探討其意義及所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中日兩國間仍存在的歷史認識差異。³⁵而在由學者松田康博等人所編著的《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へ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的第一部中，也詳述了關於中日歷史認知問題下的幾個小議題的發展，包括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教科書問題、日本在二戰後的戰後補償問題以及中國的愛國教育問題。³⁶

在中國亦有不少相關研究，如徐志民在《中國人眼中的靖國神社及其參拜(1950—2014)—以《人民日報》報導為考察中心》一文中詳述了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點，認為日本首相及其閣僚參拜靖國神社等於是日本部分政要、保守勢力及右翼分子不肯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侵略史實，同時也憂心日本的「軍國主義」再次復活。³⁷而晏因在《自虐史觀與日本教科書問題》一文中也詳述了中國對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上的立場，批判日本試圖推翻「自虐史觀」而建立「自尊史觀」的種種之舉。³⁸雖然中日兩國在歷史認識的層面上有所分歧，但也有學

³⁵ 笠原十九司，(2011)。戦争を知らない国民のための日中歴史認識 『日中歴史共同研究<近現代史>』を読む。東京：勉誠出版。

³⁶ 松田康博、家近亮子、段瑞聰編著，(2012)。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へ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京都：晃洋書房。

³⁷ 徐志民，(2015)。中國人眼中的靖國神社及其參拜(1950~2014)—以《人民日報》報導為考察中心。河北學刊，第 35 卷第 4 期，頁 64-70。

³⁸ 晏英，(2014)。「自虐史觀」與日本教科書問題。日本侵華史研究，2014 年第 2 卷，頁 85-88。

者呼籲兩國應放下歷史成見，透過對話彼此理解，不應讓歷史認知問題成為中日兩國關係發展的阻礙。³⁹

貳、領土資源問題

自 1990 年代起，中日兩國在東海資源上及釣魚台歸屬權的爭議開始浮上檯面，因此在中日兩國亦有不少學者聚焦於海洋問題上進行相關研究。中日兩國在東海資源問題上的爭議肇因於對本國經濟海域劃分的歧異，以及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解釋差異。日本主張中日的經濟海域應按照「中間線原則」，以中日海岸的中間線進行劃分。但中國卻主張應該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7 條的大陸棚自然延伸原則，主張中國在東海上的專屬經濟區範圍應為本國大陸棚的自然延伸。⁴⁰而中國學界則認為，日本所主張的「中間線原則」劃分的話，中國的專屬經濟海域將減少到 180 海里以內，對大陸棚的管轄範圍則會減少更多。且日本的「中間線原則」劃分是直接以釣魚台為日本本國領土為基準進行劃分，中方普遍無法接受。⁴¹

而在釣魚台歸屬權的問題上，中國一向主張由於釣魚台位於亞洲大陸棚向東延伸的位置，實屬台灣的附屬島嶼。且在歷史上皆有明記中國對釣魚台的控制，因此釣魚台為中國的固有領土這點是無庸置疑的。同時也批判日本試圖透過右派分子在釣魚台上的活動、拉攏美國介入釣魚台爭議等手段。⁴²而日本學者中內康夫則在《尖閣諸島をめぐる問題と日中關係—日本の領土編入から今日までの経緯と今後の課題—》一文中主張在 1895 年甲午戰爭後日本便基於「先占原則」將釣魚台劃入現在沖繩縣的領土範圍，而在二戰後雖然釣魚台暫時歸於美軍佔領。

³⁹ 相關文獻參照：太田修，(2007)。2005 年歷史教科書問題——「對話的」真実に向けて。文学部論集，第 91 号。馬立誠，(2002)。仇恨沒有未來：中日關係新思維。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時殷弘，(2003)。中國接近與「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2003 年第 2 期，頁 71-75。

⁴⁰ 村瀨信也，(2007)。日中大陸棚画定問題。國際問題，No.565，頁 1-4。

⁴¹ 周永生，(2008)。日本國內關於東海問題的爭論。國際政治科學，第 13 期，頁 118。

⁴² 屈彩云，(2011)。中日釣魚島爭端的发展及趨勢。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1 年第 2 期，頁 42-46。

1952 年基於《舊金山和約》中亦明定美軍對釣魚台與沖繩群島的主權，而在 1971 年日美簽訂《沖繩返還協定》之時，美軍便將沖繩與釣魚台的主權一併歸還予日本了，因此日本對釣魚台的主權無法被質疑。⁴³

參、經貿交流及發展

中日兩國學界在針對雙方的經貿往來對兩國關係影響的研究數量相當龐大。礙於篇幅限制，在此筆者欲以日本對中 ODA 及中日經濟相互依賴兩個部分為主軸進行探討。在日本，對中 ODA 研究的相關著書主要可以舉出由學者岡田實所寫的《日中關係と ODA—対中 ODA をめぐる政治外交史入門—》，其以政治外交史為切入點，探討中日所簽署的四分政治文件與對中 ODA 的相互關係，並舉出對中 ODA 在不同階段所為中日關係帶來的意義與影響。⁴⁴而學者高嶺司在《日本の対中国関与外交政策—開発援助からみた日中関係》透過聚焦於各階段日本對中 ODA 的政策決定過程，探討各個階段日本透過對中 ODA 所想獲得的國益。⁴⁵在中國，學者金熙德透過《日本政府開發援助》一書，探討這些年來其體制及構造的基本特徵與政策的轉變。⁴⁶另外林曉光在《日本政府開發援助與中日關係》一書中亦聚焦於日本 ODA 的政策發展、其理念的變化以及對中 ODA 的政策調整，指出日本的開發援助除了投資、貿易及開發等目的外，還帶有安全保障等考量，是為追求戰略利益的綜合援助。⁴⁷

在日本，不少學者都相當強調中國對日本經濟的必要性。如學者九川知雄在《「中国なし」で生活できるか—貿易から読み解く日中関係の真実》一書中指

⁴³ 相關文獻參照：中内康夫，(2012)。尖閣諸島をめぐる問題と日中関係—日本の領土編入から今日までの経緯と今後の課題—。立法と調査，第 334 号，頁 70-71。岡田充，(2012)。尖閣諸島問題—領土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魔力。東京：蒼蒼社。

⁴⁴ 岡田実，(2008)。日中關係と ODA—対中 ODA をめぐる政治外交史入門—。東京：日本僑報社。

⁴⁵ 高嶺司，(2016)。日本の対中国関与外交政策—開発援助からみた日中関係。東京：明石書店。

⁴⁶ 金熙德，(2000)。日本政府開發援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⁴⁷ 林曉光，(2003)。日本政府開發援助與中日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出若沒有中國經濟的成長，日本經濟可能仍為景氣低迷的狀態。其也認為日本增加中國製品的進口並非只會讓本國工業衰退，反而也能帶動日本工業的成長。⁴⁸學者瀨口清之也在《中国經濟の構造変化と日中經濟關係》一文中透過分析中國國內經濟構造的轉換，指出即便自 2012 年起中日兩國因釣魚台問題等問題而惡化，仍積極引入日本企業的投資。而日本企業雖然一度凍結了大部分的對中投資，至 2014 年起部分企業又開始恢復了對中投資。⁴⁹間接指出兩國的經貿關係逐漸脫離被政治問題侷限的窘境。

而在中國，透過經濟角度觀察中日關係的研究亦不在少數。如學者徐梅在《經濟視域下的中日關係》一文中指出即便中日兩國的政治關係陷入低潮，雙方的經濟關係仍不會受此影響。這是因為中國在未來仍將是日本重要的生產基地及銷售市場，而發展中的中國仍須要學習日本的經驗及技術之故。⁵⁰學者張季鳳也有類似的觀點。其在《中日經濟關係的新動向與今後展望》一文中則指出雖然近年來因雙邊貿易持續下降加上日本對中的直接投資大幅減少，中日經貿合作處於較低迷的狀態。但中日兩國互為重要經貿合作夥伴的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兩國的經濟依存度仍沒有下降。⁵¹

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雖然研究數量較少，但在中日兩國仍有些許針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研究。在日本，學者石原忠浩指出戰略互惠關係不僅修復了惡化的中日關係，更突顯了中日兩國開始認知到「合作」對自身而言是為最大利益，因此對雙邊關係開始採

⁴⁸ 丸川知雄，(2009)。「中国なし」で生活できるか 貿易から読み解く日中關係の真実。京都：PHP 研究所。

⁴⁹ 瀨口清之，(2014)。中国經濟の構造変化と日中經濟關係。フィナンシャル・レビュー，第 119 号，頁 191-218。

⁵⁰ 徐梅，(2013)。經濟視域下的中日關係。日本學刊，2013 年第 3 期，頁 41-53。

⁵¹ 張季鳳，(2017)。中日經濟關係的新動向與今後展望。日本研究，2017 年第 3 期，頁 25-30。

取務實的態度。⁵²學者松本盛雄則在《日中經濟關係の変遷と「戰略的互惠關係」の再評価》一文中指出中日兩國在實踐戰略互惠關係時需要雙方的政治領導力，並指出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不夠具體的事實。⁵³日本亦有不少人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提出具體化的建言，如：社團法人經濟同友會便在戰略互惠關係的框架下針對兩國交流、環境保護、經貿交流的層面提出相關建議。⁵⁴

而在中國，學者指出要達成中日戰略互惠的成功關鍵在於中日雙方對彼此的「相互信任」。⁵⁵學者高蘭則在《突破“72年體制”建立戰略互惠關係框架下的新型中日關係》一文中指出兩國間雖然確立了戰略互惠關係，但是內涵不明確，並缺乏制度性安排，因此中日關係還是存在了許多不確定性。⁵⁶



⁵² 石原忠浩，(2008)。中日簽署「第四公報」後的中日關係與台灣。《戰略安全研析》，第 38 期，頁 45-48。

⁵³ 松本盛雄，(2013)。日中經濟關係の変遷と「戰略的互惠關係」の再評価。《社会システム研究》，第 26 号，頁 15-28。

⁵⁴ 実効性のある日中『戰略的互惠關係』の構築に向けて—日中両国政府への具体的提言—。《經濟同友會》，2011 年 1 月 21 日，<https://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articles/2010/110121b.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10 月 6 日。

⁵⁵ 相關文獻參照：蔣立峰，(2008)。戰略互惠 合作共贏:中日關係發展新階段。《日本學刊》，2008 年第 4 期，頁 18-27。高洪，(2007)。關於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若干思考。《當代世界》，2007 年第 4 期，頁 7-8。

⁵⁶ 高蘭，(2015)。突破“72年體制”建立戰略互惠關係框架下的新型中日關係。《國際觀察》，2015 年第 1 期，頁 87-98。

表 2.2：日本探討中日關係的相關文獻。

分析角度	主要作者及著作
歷史問題	<p>1.笠原十九司《戦争を知らない国民のための日中歴史認識『日中歴史共同研究<近現代史>』を読む》(2011)</p> <p>2.松田康博、家近亮子、段瑞聰編著《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へ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2012)</p> <p>3.太田修《2005 年歴史教科書問題—「対話的」真実に向けて》(2007)，文学部論集。</p>
領土資源問題	<p>1.村瀬信也《日中大陸棚画定問題》(2007)，国際問題。</p> <p>2.中内康夫《尖閣諸島をめぐる問題と日中関係—日本の領土編入から今日までの経緯と今後の課題—》(2012)，立法と調査。</p> <p>3.岡田充《尖閣諸島問題—領土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魔力》(2012)</p>
經貿交流與發展	<p>1.岡田実《日中関係と ODA—対中 ODA をめぐる政治外交史入門—》(2008)</p> <p>2.高嶺司《日本の対中国関与外交政策—開発援助からみた日中関係》(2016)</p> <p>3.丸川知雄《「中国なし」で生活できるか 貿易から読み解く日中関係の真実》(2009)</p> <p>4.瀬口清之《中国経済の構造変化と日中経済関係》(2014)，フィナンシャル・レビュー。</p>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p>1.石原忠浩《中日簽署「第四公報」後的中日關係與台灣》(2008)，戰略安全研析。</p> <p>2.松本盛雄《日中經濟關係の変遷と「戰略的互惠關係」の再評価》(2013)，社会システム研究。</p>

	3.經濟同友會《実効性のある日中『戦略的互惠関係』の構築に向けて—中日両国政府への具体的提言—》
--	--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相關資料。

表 2.3：中國探討中日關係的相關文獻。

分析角度	主要作者及著作
歷史問題	1.徐志民《中國人眼中的靖國神社及其參拜(1950~2014)—以《人民日報》報導為考察中心》(2015)，河北學刊。 2.晏因《"自虐史觀"與日本教科書問題》(2014)，日本侵華史研究。 3.馬立誠《仇恨沒有未來：中日關係新思維》(2002)。 4.時殷弘《中國接近與「外交革命」》(2003)，戰略與管理。
領土資源問題	1.周永生《日本國內關於東海問題的爭論》(2008)，國際政治科學。 2.屈彩云《中日釣魚島爭端的發展及趨勢》(2011)。
經貿交流及發展	1.金熙德《日本政府開發援助》(2000)。 2.林曉光《日本政府開發援助與中日關係》(2003)。 3.徐梅《經濟視域下的中日關係》(2013)，日本學刊。 4.張季鳳《中日經濟關係的新動向與今後展望》(2017)，日本研究。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1.蔣立峰《戰略互惠 合作共贏:中日關係發展新階段》(2008)，日本學刊。 2.高洪《關於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若干思考》(2007)，當代世界。 3.高蘭《突破"72年體制"建立戰略互惠關係框架下的新型中日關係》(2015)，國際觀察。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相關資料。

伍、小結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除了讓筆者對中日兩國在各項爭議上的立場有更深入的了解以外，也可以發現當今學者在影響中日關係的個別議題研究相當興盛。但誠如前面筆者所言，影響中日關係的從來不僅止於單一因素。如：即便中日間的經濟相互依賴性逐年升高，兩國仍為歷史及領土資源等因素加深關係的惡化。然而，將這些影響因素進行綜合分析的研究仍為少數。此外，至今對「戰略互惠關係」此一交流框架的研究仍尚未興盛。雖然有學者指出了戰略互惠關係的缺點，但尚未有學者深入研究影響實踐戰略互惠關係的因素並對此做出整體性的評價。再加上關於戰略互惠關係的研究，雖然在剛提出時的早期有較多的探討，然而在近年來，關於戰略互惠關係的研究有減少的跡象。本論文與其他研究的相異之處在於，筆者欲以戰略互惠關係為分析主軸，試圖結合各層面的因素檢視這段期間中日關係的發展，並對其做出綜合性的評價。

第三章 2006 年至 2008 年：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建立

在本章節中，第一節與第二節將探討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所提出的背景以及交涉的過程，而第三節將集中於探討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具體內容與其意義。而在確立戰略互惠關係後，中日關係變得相對穩定。不僅是在政治往來與經貿交流上維持一定的熱度，於文化與人員交流等層面也有新的發展。因此在第四節中將分述兩國在這段期間於政治、經濟、文化與人員交流的相關成果，檢視在戰略互惠關係成立後至民主黨政權時期的中日關係。最後則是小結。

第一節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提出背景

壹、中日關係的發展概述(1970 年代至 2000 年)

在 1970 年代，日本與中國簽了兩項重要的政治文件，分別是 1972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下稱：中日聯合聲明)與 1978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下稱：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這兩份文件不僅讓中日兩國確立了邦交關係，也引領中日關係走向另一個新時代。

而到了 1980 年代，中日兩國有了更廣泛的人口、文化、體育交流，雙邊經貿發展也愈發盛行。於 1979 年日本大平正芳首相訪中時，便決定對中國提供日圓貸款，這對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建設帶來重大的影響。1980 年代中日交流的重要準則為「和平友好」、「平等互惠」、「長期穩定」及「相互信賴」。⁵⁷1980 年代中日關係間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中曾根總理與胡耀邦總書記個人層次的信賴關係，在當時所發生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歷史教科書等問題，皆是在兩國領導人有一定的共識之上，才得以減低對立所帶來的傷害的。

⁵⁷ 馬立誠，(2013)。《仇恨沒有未來：中日關係新思維》。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頁 66-70。

進入了 1990 年代後，伴隨著冷戰的結束，日本的國內局勢也開始變動，但中日兩國的政府高層仍有持續性的互動。值得一提的是，1989 年中國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後受到了世界各國的譴責。雖然日本最初亦配合歐美國家對中國採取了制裁措施，卻也率先修復了對中關係。⁵⁸ 1992 年，除了江澤民總書記訪日以外，同年尚有日本天皇訪中、中日建交 20 周年紀念等活動。1998 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到日本進行國是訪問，雖然中日領導人皆未署名，但透過本次訪日，中日間多了第三份政治文件《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下稱：中日聯合宣言），重新定調了後冷戰時期的中日關係。雖然因在本次訪問時中國緊咬著歷史認識問題不放，而被視為一次失敗的訪問。但這是史上第一次中國國家主席訪日，在中日關係上實據意義。⁵⁹

而 1990 年代中日間的摩擦主要可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歷史認識問題、中國威脅論及與日美同盟強化有關的台灣問題。雖然在 1990 年代中日關係雖然已開始出現摩擦，在政治往來上仍在雙方的努力下維持一定的往來。

貳、小泉首相執政時期：政冷經熱

綜上所述，中日關係雖然自建交以來時有摩擦，然而兩國間的政治往來沒有完全斷絕。但進入 21 世紀後，中日關係便開始有了劇烈的轉變。小泉純一郎首相執政的 2001 年 4 月至 2006 年 9 月這段期間，中日關係急速惡化。除了眾所周知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以外，中國內政的混亂及兩國「期待」與「認知」的落差等原因也是造成當時中日關係降至冰點的主要原因。⁶⁰其實在小泉首相執政初期，中日關係尚有一定的往來。2001 年 8 月 13 日，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之舉引發了中國的大力反彈，但其於同年 10 月訪中時也順道參觀了盧溝橋及抗日紀念館，

⁵⁸ 國分良成、添谷芳秀、高原明生、川島真，(2013)。日中關係史。東京：有斐閣。頁 141-167。

⁵⁹ 國分良成，(2017)。中国政治からみた日中關係。東京：岩波書店。頁 183-194。

⁶⁰ 伊藤剛，(2012)。胡錦濤政權と新思考外交の挫折 2003-05 年。載於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關係史 1972-2012 I 政治(417-441 頁)。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為日本在二戰所為中國帶來的傷害謝罪，獲得中方的肯定。中方也認為小泉首相自此應會放棄靖國神社的參拜，雙邊關係才再度回穩。加上於 2002 年 4 月 12 日，在中國費盡心思主辦的博鰲亞洲論壇中，小泉首相發表了駁斥中國威脅論的演說。並表明中國的發展對日本而言不是「威脅」，而是「機會」，獲得了中國的一致好評。然而在 4 月 21 日，小泉首相便又再度參拜了靖國神社，打破了才剛好轉的中日關係。同年 10 月，雖然中日兩國領導人於 APEC 會議上舉行會談，然而兩國對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仍未達成一定的共識。⁶¹

2003 年，中國胡錦濤政權上台後，一度欲採取對日宥和的方針。在當時中國亦有學者提倡「對日新思考」論，主張中國不應執著於歷史問題與日本發生爭執，而是應力求對日關係的改善。⁶²然而這樣的言論在中國仍為少數，加上胡錦濤政權在當時仍不穩定，政府內部仍有許多對日強硬人士存在，使胡錦濤政權在政府內部及民間輿論的壓力下無法採取完全對日宥和的政策。⁶³加上在這時期中日之間除了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以外，亦產生了許多使中日關係惡化的事件。如：中國保釣運動、日人珠海集團買春事件、世界盃足球賽的中日衝突、中國大型反日遊行等等，皆使中日的民間關係跌落至谷底。而於 2005 年 10 月小泉首相再度參拜靖國神社後，使中國對小泉政權大失所望。此後，中國便停止了所有對日關係改善的舉動，同時也宣布斷絕與日本間所有首腦階層的會談，因此中日兩國也開始摸索「小泉後」時期的關係建立及對話機制。⁶⁴

在小泉首相執政時期，可以發現兩國的政治關係與 2000 年前相較之下，處於更為不穩的狀態，甚至於 2005 年 10 月後完全斷絕了首腦層級的對話，達到了完全的「政冷」狀態。然而從數據上可以發現，此時中日兩國的經貿交流與往來是愈發頻繁的。根據日本財務省的資料顯示，中日貿易總額在 2000 年時為 857.31

⁶¹ 田中明彥，(2007)。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 (日本の”現代”)。東京：NTT 出版。頁 300-306。

⁶² 相關資料參照：馬立誠，(2002)。仇恨沒有未來：中日關係新思維。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時殷弘，(2003)。中國接近與「外交革命」。戰略與管理，2003 年第 2 期，頁 71-75。

⁶³ 伊藤剛，(2012)。胡錦濤政權と新思考外交の挫折 2003-05 年。載於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關係史 1972-2012 I 政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417-441。

⁶⁴ 同前註。

億美元，而到了 2005 年則飆升至 1894.45 億美元。同時，於 2004 年中國便取代了美國，成為了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⁶⁵藉此我們可以看出中日兩國的經貿往來不受政府間關係影響，充分展現了「經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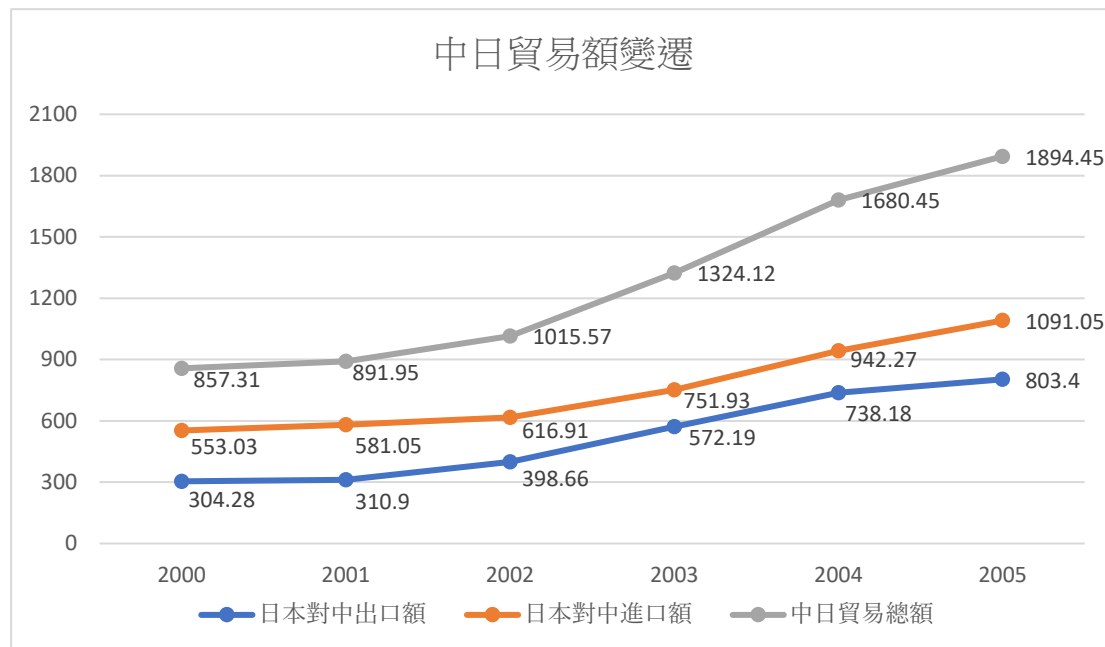


圖 3.1：中日貿易額變遷。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日本財務省網站資料。（單位：億美元）引用網址：<http://www.customs.go.jp/toukei/info/tsdl.htm>

第二節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成立過程

壹、新中日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

戰略互惠關係此一概念的前身來自於中日兩國產生了「雙贏」的共識，在這其中，新中日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便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討論平台。新中日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是中日關係的民間諮詢機構。新中日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的前身是為 1980 年代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訪問日本時，與當時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商議而成立的中日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其目的在於建立更加友好的中日關

⁶⁵ 財務省貿易統計，日本財務省，<http://www.customs.go.jp/toukei/info/tsdl.htm>。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16 日。

係。⁶⁶此外，在與政府相異的民間平台上，各項較為敏感的議題也較能率質地進行意見交換，有著為兩國政府提出建言的功能。而邁入了 21 世紀後，該委員會則進化成新中日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於 2003 年至 2008 年，總共召開了 8 次的會談。並於 2008 年 12 月，該委員會發表了一篇名為「面向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強化」（原文：日中『戰略的互惠關係』の強化へ向けて）的報告書，內容詳述了這 8 次會談的概要，也提出了戰略互惠關係中需實現的具體內容，因此該委員會也可以說是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一個很重要的推手。⁶⁷又根據於 2003 年至 2008 年擔任新中日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日方委員兼秘書長的國分良成，在當時中日兩國的議論重點即為摸索日後中日關係的交流框架。雖然在當時中日兩國社會普遍關心的議題集中在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及當時台灣陳水扁政權所主張的台獨問題，但該委員會的任務為探討如何在中日兩國間建立面向未來且能兼顧大局的長期性關係。而在首次對話後，兩國同意將這樣的關係統稱為「戰略關係」。換句話說，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型早已在 2003 年至 2004 年間，在民間交流機制下被積極的探討並提出。⁶⁸

貳、中日戰略對話

如前所述，中日兩國因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之故使雙邊關係不斷惡化，日本外務省亞洲太平洋局便認為應早日啟動次官層級的中日對話，避免雙邊對話完全中斷。時任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谷內正太郎及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在這當中便擔任了關鍵的核心角色。自 2005 年 5 月至 2008 年 1 月為止，谷內正太郎與

⁶⁶ 新日中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jc_yuko21-2/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7 日。

⁶⁷ 新日中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最終報告書—日中「戰略的互惠關係」の強化へ向けて—，新日中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https://dl.ndl.go.jp/view/download/digidepo_4023437_po_hokoku.pdf?contentNo=1&alternativeNo=。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7 日。

⁶⁸ 國分良成，(2012)。「1972 年体制」から「2006 年体制」へ？日本現代中国学会ニューズレター，第 36 号，頁 1-3。

戴秉國之間一共舉行了高達七次的戰略對話，欲透過對話來推動當時高度緊張的中日關係的發展。

雖然對話是兩國的共識，然而對於該對話平台的稱呼，當初兩國卻存在著分歧。中國主張與重要國家間的對話皆稱為「戰略對話」，因此與日本間也應比照辦理，稱之為「中日戰略對話」。但日本認為與本國的戰略觀、價值觀相異的國家間的對話不應稱為「戰略對話」，而是應稱為「綜合政策對話」(原文：綜合政策對話)之故，該對話平台在日本便稱之為「日中綜合政策對話」。無論名稱為何，兩國當時在面對全球性、地區性等問題的兩國政策需要緊急對話的見解上有一定的共識。⁶⁹

2005 年間總共舉行了三次中日戰略對話。在 5 月第一次的會談中，雙方就靖國神社參拜問題與日本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等問題上的意見仍有所分歧，但雙方一致決定日後利用戰略對話的管道消除中日關係的政治阻礙，持續進行相關問題的磋商。於 6 月舉行了第二次會談，第三次會談則是於 10 月 14 日開始，然而當時小泉首相卻在 10 月 17 日參拜靖國神社，使談判完全破局，直到 2006 年 2 月才重起了對話機制。對中國而言，若想改善兩國關係，就不能迴避靖國問題，因此中方也視戰略對話為解決靖國問題的重要外交管道。當時戴秉國在本次的訪日行程亦會面了尚未上任的首相候選人安倍晉三，表明了中方立場。同年 5 月，開啟了第五次戰略對話，而該次對話也進行得較為順利，中國也感受到日本已開始著眼於後小泉後時期的中日關係了。9 月，兩國舉行了第六次戰略對話。2007 年 1 月，第七次戰略對話開啟，主要任務有二。一是為當時已被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內涵進行磋商，另一則是為當年 4 月溫家寶總理的「融冰之旅」做政治準備。當時所得到的共識有些成為了溫家寶總理訪日的成果，也有許多部份被寫入後述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中。⁷⁰第八次戰略對

⁶⁹ 谷内正太郎、高橋昌之，(2009)。外交の戦略と志 前外務事務次官 谷内正太郎は語る。東京：産経新聞出版。頁 33-35。

⁷⁰ 戴秉國，(2016)。戰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297-324。

話則是於隔年 2 月舉行，不僅為日後胡錦濤國家主席的訪日做好準備，也就東海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磋商。⁷¹

參、破冰之旅

2006 年 10 月 8 日及 9 日，時任首相安倍晉三訪中，這也是史上第一次日本領導人選擇中國作為第一個出訪國。事實上，中方十分在意安倍首相是否會如小泉首相一般參拜靖國神社，使中日關係再度因歷史認識問題惡化，因此在安倍訪中一事上一直游移不定。雖然安倍首相是著名的保守人士，其在擔任小泉首相的官房長官以前也不斷強調：「不論是小泉首相的繼任首相，或是之後的首相都應當要參拜靖國神社。」但其在擔任官房長官後卻採取了對參拜靖國神社不表態的立場。谷內次官的紀錄，當時其向中國表示：「安倍首相有意基於日中關係的大局考量處理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且日中兩國有必要擴大共同利益、建立戰略互惠關係，因此需要及早實現兩國的首腦會談。」試圖說服中國接受安倍首相的訪中。在當時，安倍首相採取了「模糊戰略」，即不向大眾表明是否進行參拜。換句話說，若中國還是不接受安倍首相訪中的請求，安倍首相便有可能就此參拜靖國神社。⁷²

事實上，安倍首相的訪中與第六次中日戰略對話有極大的關聯。日本提出於 2006 年 9 月 22 日至 23 日舉行，這個時間點恰巧位於 9 月 20 日自民黨總裁選舉後，又在 9 月 26 日國會選出首相以前，顯示日本當時希望於首相上台以先就雙邊關係的改善與中國達成共識。然而本次的協商十分不順，談判一度破局。最後在 9 月 28 日雙方在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上達成了共識，這也才促成了 10 天後的「破冰之旅」。⁷³

⁷¹ 第八輪中日戰略對話在北京舉行 雙方願加強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8 年 2 月 23 日，http://www.gov.cn/jrzq/2008-02/23/content_898806.htm。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19 日。

⁷² 谷內正太郎、高橋昌之，(2009)。外交の戰略と志 前外務事務次官 谷内正太郎は語る。東京：産經新聞出版。頁 40-41。

⁷³ 戴秉國，(2016)。戰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315-321。

在相關部門的斡旋及領導人的政治決斷之下，安倍首相終於在上任後短短 13 天內實現了訪中計畫。安倍首相這次的訪中是於 1999 年前首相小淵惠三訪中後，時隔 7 年的國是訪問，也是打破當時高度緊張的中日關係的重要一步。在本次訪中後中日兩國所共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也首次出現「基於戰略面的共同利益的互惠關係」(原文：共通の戰略的利益に立脚した互惠關係)這樣的字眼，這也是後來所建立的「戰略互惠關係」的前身。⁷⁴同時，兩國也將中國所提出的對中日關係的四點基本認識，也就是「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及「共同發展」定為共同目標，戰略互惠關係的建立也就成了達成此目標的手段。

75

當時中國的駐日大使王毅曾表示，本次安倍的訪中主要帶來三項成果。首先、兩國恢復的正常的首腦及交流，重新開始建立信賴關係。這點可以體現在日後的 APEC 會議上胡錦濤再度與安倍晉三會面時，雙方達成了於隔年實現高級官員互訪的共識。再者、日後雙邊關係發展的整體方向變得更加明確。在共同遵守已簽訂的三份政治文件之上，秉持著「以史為鑑、面向未來」的精神建構戰略互惠關係。最後、雙方確立了在日後兩國間與多國間合作的主要領域。如：節能、環境保護、金融、高科技等領域的合作及青少年交流的活化等等。⁷⁶

肆、融冰之旅

2007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中國總理溫家寶應首相安倍晉三之邀而訪日，此次訪日被稱之為「融冰之旅」。在訪日的過程中，溫家寶總理在日本國會發表了一篇名為《為了友誼與合作》的演講，從演講內容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國欲解決

⁷⁴ 日中共同プレス発表，日本外務省，2006 年 10 月 8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cn_kr_06/china_kpres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16 日。

⁷⁵ 宮本雄二，(2011)。これから、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頁 136-139。

⁷⁶ 王毅駐日大使に聞く（3）安倍首相の訪中を評価，人民網日本語版，2006 年 12 月 12 日，http://j.people.com.cn/2006/12/12/jp20061212_6586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19 日。

與日本間的歷史認識問題。其不僅強調中國「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立場，也公開表明對日本政府和日本領導人多次在歷史問題上表明態度，公開承認侵略並對受害國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一事給予積極評價。其也公開感謝日本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所給予的經濟支援與相關協助。⁷⁷綜上所述，其不僅向國內民眾表達了與日本在經濟層面上加強合作的重要性，試圖緩和國內的反日情結。同時也透過公開讚賞日本政府與人民的道歉，試圖說服日本人民相信中國人民已不再只是執著於歷史情結，而是希望能與日本一同面向未來，建立友好的關係。

而本次的訪日也確立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基本內涵、框架和重點合作領域，制定加強兩國各領域合作的一系列措施，為戰略互惠關係的建立邁出了一大步。本次所發表的《中日聯合公報》中明訂了五個戰略互惠關係的基本內涵，分別是：第一、相互支援和平發展，增進政治互信。第二、深化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第三、加強防務對話與交流，共同致力於維護地區穩定。第四、加強人文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第五、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地區及全球性課題。這五點也成為日後正式的戰略互惠關係的基礎。除此之外，在重點問題東海油氣田的開發上雙方也達成了「堅持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共識，也設定了於同年秋季提出共同開發具體方案的目標。⁷⁸

整體而言，本次訪日將中日關係帶向了另一個嶄新的階段，中日間的對話氣氛逐漸穩定，對兩國的關係修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伍、迎春之旅

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應中國總理溫家寶的邀請，到中國進行了正式的國是訪問，這次訪問被稱作「迎春之旅」。本次訪中正是落

⁷⁷ 為了友誼與合作——溫家寶在日本國國會的演講，[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5608455.html)，2007年4月13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5608455.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12月17日。

⁷⁸ 日中共同プレス発表，[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0704_kh.html)，2007年4月11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0704_kh.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12月17日。

實上次《中日聯合公報》中所明定的「兩國領導人保持經常性往來」，同時兩國也在本次訪問中決定於明年的春季由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前往日本進行訪問。福田首相在北京大學的演講中，還提出創新地發展戰略互惠關係，也就是「創造性夥伴關係」的設想。其也提到戰略互惠關係是中日兩國所要共同承擔的責任，構成戰略互惠關係的三大核心支柱則為：「互利合作」、「國際貢獻」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賴」。⁷⁹除此之外，根據資料顯示，兩國透過本次的交流進一步豐富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內涵。雙方還簽定了《推動環境能源合作的聯合公報》、《加強氣候變化科技合作的聯合聲明》和《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動的備忘錄》等多項文件。可以看出本次交流，兩國將非傳統安全保障議題的合作與人文交流放在核心的位置。如：決定自 2008 年起連續四年，達成每年四千名青少年互訪的目標、將 2008 年訂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等等。⁸⁰

在歷史認識問題上，與安倍首相不同，福田首相公開表示不參拜靖國神社，也不做鄰國不喜歡的事情。福田首相也不提倡易引發中國猜疑的「價值觀外交」以及「自由與繁榮之弧」等帶有戰略色彩的外交理念，而是發展與中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在台灣問題上，福田首相也堅持「四不原則」，也就是不支持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不支持入聯公投。這種種的表態也加強了中國對日本的信賴感。但在重要的東海問題上，中日兩國在此時仍未完全達成共識。雖然原於「融冰之旅」中雙方爭取於 2007 年秋季前提出具體方案，中日兩國也為此已進行了 11 輪司局級磋商並同意遵守共同開發的原則，但就海域邊界線的劃分尚未達成一致的意見。在東海問題的會談中，日本主張應為共同開發橫跨日中中間線的海域，包括中國已單獨開發的春曉油氣田；中國則

⁷⁹ 福田總理訪中スピーチ『共に未来を創ろう』，日本外務省，2007 年 12 月 28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fuk_1228.html。最後離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17 日。

⁸⁰ 福田總理の中国訪問（概要と評価），日本外務省，2007 年 12 月 30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fukuda/china_07/gh.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17 日。

是主張應為釣魚台等南北兩處海域共同開發。雙方在基本立場都未作讓步，但仍希望於隔年春天胡錦濤訪日之前能解決東海問題。

整體而言，伴隨著「破冰」和「融冰」，也連帶使中日關係間存有的歷史認識問題、台灣問題、釣魚台主權等問題逐漸被緩解。有中國學者指出，這是因為中日關係出現了結構性的變化。由於福田首相的上任，使得日本政治「脫右傾化」的趨勢增強，對中溫和派人士也重新回到執政舞臺，日本朝野各黨在改善對中關係問題上立場基本一致，部分解除了日本當時亞洲外交的困境，中日關係自然就進入了緩和階段。⁸¹

陸、暖春之旅

2008年5月6日至10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赴日進行國是訪問。這次訪日是繼江澤民主席1998年訪問日本10年後，中國國家元首首次對日本進行國事訪問。本次訪問被稱為「暖春之旅」，也是在本次訪問中日兩國簽訂了《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確立了戰略互惠關係。

經過2007年兩國關係修復的嘗試後，中國民間對日好感度有稍微回復，然而因2008年年初所發生的中國產冷凍餃子中毒事件及西藏騷亂等事件，使日本民間對中好感度不增反減。由於中國武裝鎮壓於西藏暴動的藏族人民，引發世界各國及人權團體的關注。原先中日兩國政府也因此擔心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法實現首腦會談，最終胡錦濤的訪日是在擁護民主主義各國對中國的批判聲浪尚未收斂之際展開的。⁸²

本次訪問對中日兩國各具意義。首先，對中國而言，當時中國為了8月份北京奧運會的召開，正試圖積極提升自身的國際形象。如前所述，圍繞著西藏騷亂

⁸¹ 福田的“迎春之旅”，新浪財經網，2008年1月6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06/11191909748.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12月17日。

⁸² 阿南友亮，(2017)。戰略的互惠關係の模索と東シナ海問題 2006-08年。載於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關係史 1972-2012 I 政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454-455。

的風波，中國與西方各國不論是在政府層面或是民間層面都出現了巨大的分歧，使中國威脅論再次升溫。根據哈里斯民調為《金融時報》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對歐洲各國而言，中國在當時就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秩序穩定的最大威脅。⁸³為了避免長年來中國和平崛起的努力毀於一旦，中國必須通過象徵性的元首外交來滅火。透過與日本首相間的會談展現對國際社會協調的態度的同時，也向其他民主國家及中國國內展現基於共同利益所建設的夥伴關係並不會被西藏騷亂等人權問題影響。而對日本而言，本次會談可以向國際社會及日本國內展現戰略互惠關係是一種有效的、將中國視為負責任的一員並帶入既存國際秩序的「干預」手段。⁸⁴

本次胡錦濤的訪日除了全面深化兩國對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以外，也定調了近十年來中日兩國的交流框架。日美同盟一向是日本外交政策的一大基軸，在這樣的條件下中日兩國開始從戰略上考慮雙邊關係，可以說是外交上的一大突破，也象徵中日關係邁入新的里程碑。因為若將雙邊關係提升到戰略層面，兩國則更容易超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差異，並能在政治理念、外交政策等諸多方面找到更多利益的契合點。不僅對雙邊關係有正面影響，更名為區域的和平發展帶來助益。⁸⁵而胡錦濤不僅注重官方交流，也相當注重中日國民間的感情。因此本次也特意避開容易引起日本不滿的歷史問題，將現實利益與合作放在優先位置。其在早稻田大學的演講中也強調中日民間相互理解與交流的重要性、中國自始至終都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歷史並不是要延續仇恨等立場，欲消弭日本民間對中國的疑慮。⁸⁶同時他也與日本的七大大日中友好團體見面，試圖讓中日兩國民眾都認識到長期和平友好合作是雙方唯一的選擇。

⁸³ Ben Hall and Geoff Dyer, "China seen as biggest threat to stability," **FINANCIAL TIMES**, April 15, 2008, <https://www.ft.com/content/89261466-0a79-11dd-b5b1-0000779fd2ac>.

⁸⁴ 阿南友亮，(2017)。戰略的互惠關係の模索と東シナ海問題 2006-08 年。載於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關係史 1972-2012 I 政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456-458。

⁸⁵ 媒體解讀"暖春之旅":期待中日關係"永遠是春天"，**中國新聞網**，2008 年 5 月 12 日，<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8/05-12/1246165.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18 日。

⁸⁶ 新華月報編，(2008)。暖春之旅—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54-62。

至於在東海問題方面，經過了多年的協商，中日兩國終於宣佈在東海油氣田談判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並於隔月發表了《東海協議》，中日兩國政府就東海問題達成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性共識。同時，這項協議也同意日本企業投資中國的油氣田以換取利益，兩國在不損及各自的立場的情況下於東海問題上跨出了一大步。⁸⁷

表 3.1：中日確立戰略互惠關係的發展過程及中日戰略對話概要。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相關資料。

日期	名稱	會議詳述
2005 年 5 月	第一次中日戰略對話	與會人：李肇星、戴秉國、谷內正太郎 內容：歷史認識問題、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國問題、北韓核武問題
2005 年 6 月	第二次中日戰略對話	與會人：戴秉國、谷內正太郎 內容：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東海油氣田開發問題、北韓核武問題
2005 年 10 月	第三次中日戰略對話	與會人：戴秉國、谷內正太郎 內容：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東海油氣田開發問題、六方會談
2006 年 2 月	第四次中日戰略對話	與會人：戴秉國、谷內正太郎 內容：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中方會見安倍晉三
2006 年 5 月	第五次中日戰略對話	與會人：戴秉國、谷內正太郎 內容：著眼於後小泉時期的政治關係

⁸⁷ 東シナ海における日中間の協力について（日中共同プレス発表），日本外務省，2008 年 6 月 18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higashi_shina/pres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18 日。

2006 年 9 月	第六次中日戰略對話	與會人：戴秉國、谷內正太郎 內容：雙方就如何消弭政治障礙交換了意見
2006 年 10 月	破冰之旅	
2007 年 1 月	第七次中日戰略對話	與會人：戴秉國、谷內正太郎 內容：為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內涵進行磋商、為「融冰之旅」做政治準備
2007 年 4 月	融冰之旅	
2007 年 12 月	迎春之旅	
2008 年 2 月	第八次中日戰略對話	與會人：王毅、藪中三十二 內容：東海油氣田開發問題，為胡錦濤訪日做政治準備
2008 年 5 月	暖春之旅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相關資料。

第三節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內容與意義

壹、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內容

戰略互惠關係經過多次協商後而確立，而根據 2008 年所簽署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主要內容的概要如下：⁸⁸

⁸⁸ 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年 5 月 7 日，<https://www.fmprc.gov.cn/chn/gxh/zlb/smgg/t45047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1 月 10 日。

一、兩國一致認為中日關係對兩國都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且長期和平友好合作是雙方唯一選擇。雙方決心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實現中日兩國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目標。

二、兩國將繼續遵守已簽署之三份政治文件。除此之外，亦繼續堅持和全面落實 2006 年與 2007 年所發表的《中日聯合新聞公報》的各項共識。

三、雙方決心正視歷史、面向未來。並將不斷增進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擴大互利合作，共同開創亞太地區和世界的美好未來。

四、雙方確認兩國互為合作夥伴，且互不構成威脅。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發展給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帶來了巨大機遇，日方對此表示積極評價。

日本在戰後 60 多年來，堅持走作為和平國家的道路，通過和平手段為世界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中方對此表示積極評價。雙方堅持通過協商和談判解決兩國間的問題。

五、日本重申繼續堅持在《日中聯合聲明》中就臺灣問題表明的立場。

六、雙方決定在以下五大領域構築對話與合作框架，開展合作：

- (一) 增進政治互信。
- (二) 促進人文交流，增進國民友好感情。
- (三) 加強互利合作。
- (四) 共同致力於亞太地區的發展。
- (五) 共同應對全球性課題。

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意義

一、將中日關係提升至世界的層次

戰略互惠關係是中日兩國基於資訊社會的進展、經濟全球化以及世界規模的相互依存蓬勃發展等世界性的共識所產生的。而這樣的共識源於重視經濟的成長與國家的發展，換句話說，在當時兩國皆認知到正是經濟關係牽引著中日關係的

發展。雖然重視經濟關係，但經濟關係的維持如何與軍事安全保障領域的矛盾還有雙邊的國民感情取得平衡仍為一大難題。

文件中所寫入的「長期和平友好合作是雙方唯一選擇」不僅展現了「若兩國關係安定則共同獲利、若兩國關係不安定則共同蒙受損失」的立場，也顯示了雙方欲克服此二問題的決心。同時，由於在當時中國於世界上的存在感急速擴大，對日本而言，中國的存在也變得越趨重要。兩國共同認知到這樣的雙邊關係不再只對兩國造成影響，而是牽涉的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因此兩國也開始需要對亞洲、甚至是世界的做出一定貢獻。⁸⁹這樣的認知具體表現在文件中的「兩國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有著重要影響，肩負著莊嚴責任」、與「使中日關係的發展方向與世界發展潮流相一致」等字句上。

二、超越「72年體制」

中國的學者高蘭指出，中日關係在 2006 年以前的基本特徵正是「72 年體制」。所謂的「72 年體制」指的是 1972 年中日恢復邦交時，兩國政府圍繞台灣、歷史、安保、領土爭議等問題的處理原則形成的共識體系。其中最核心的內容有兩個：一為歷史問題，另一則為台灣問題。前者指的是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日本也承諾反省其戰爭責任。而後者指的則是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諾日本將不與台灣保持官方關係。⁹⁰

而日本的學者國分良成則指出，「72 年體制」的建立有四個結構性特點：（一）對歷史的反省與中日友好原則。（二）中日美三邊關係的穩定。（三）日本對中國現代化的支援。四、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⁹¹

⁸⁹ 宮本雄二，(2011)。これから、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頁 140-141、160-161。

⁹⁰ 高蘭，(2015)。突破“72 年體制”建立戰略互惠關係框架下的新型中日關係。國際觀察，2015 年第 1 期，頁 87-98。

⁹¹ 國分良成，(1997)。1972 年體制的變化與發展協調關係之路。日本學刊，1997 年第 5 期。

而造成 72 年體制產生根本變化的具體原因有四個，分別是領導者、國家實力、國家利益及國際因素。首先是領導者因素。在 2006 年以後，由於日本首相的任期普遍短暫，日本領導人更多考慮的是其政權的穩固、利益團體的各種利益訴求以及選民的支持率，因此日本的對中政策也出現了更多不穩定因素。日本的政策受到輿論的影響越來越深，中國也在對外開放的背景下，外交政策也開始受到輿論影響。舉例來說，放棄對日戰爭賠款在當時是由中國政府單方面所下的決定，實際受害的中國人民並沒有參與政策決定的過程，因此近年來中國民間圍繞日本的戰爭賠款問題討論熱烈。

再者，國家實力的變化也是一大原因。1990 年代末期中國的快速成長與日本的相對停滯，為兩國加深了矛盾。第三，國家利益的追求。在當時，傳統的中日關係中的友好關係的重要性開始下降，兩國更趨向於追求各自的國家利益。例如：釣魚台主權、東海海底資源等等。

最後則是國際因素的影響。在冷戰時期，由於有蘇聯此一共同敵人，中美日關係相對穩定。但在冷戰結束之後，蘇聯解體與中國崛起使日本對中國的態度產生變化，日本開始關注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這種種的原因導致 72 年體制鬆動，也成為戰略互惠關係提出的背景。⁹²隨著戰略互惠關係的提出，72 年體制的內容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日關係的本質開始改變。中日關係從以善鄰友好的基礎，重視歷史與台灣兩問題的兩國間思考轉向重視國家利益及現實戰略，連帶使中日關係出現了新的轉型。⁹³

三、戰略互惠關係與先前三份政治文件的差異

首先，中日間的第四份政治文件的簽署者是國家主席兼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胡錦濤，相較於第一份政治文件《中日聯合聲明》中署名的周恩來總理及姬鵬飛

⁹² 高蘭，(2015)。突破“72 年體制”建立戰略互惠關係框架下的新型中日關係。《國際觀察》，2015 年第 1 期，頁 87-98。

⁹³ 國分良成，(2012)。「1972 年體制」から「2006 年體制」へ？日本現代中国学会ニューズレター，第 36 号，頁 1-3。

外交部長、第二份政治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署名的黃華外交部長、第三份政治文件《中日聯合宣言》中甚至沒有署名，第四份政治文件中署名的中國代表人明顯與先前三份政治文件署名的代表人的層級不同，就象徵性的意義層面而言與前三份政治文件相比有升格的跡象。⁹⁴

除此之外，自 1972 年中日建交以來，中日兩國的交流框架是為「善鄰友好」，不論是在《中日聯合聲明》或《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皆強調雙方應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持久和平友好關係」。而於 1998 年所簽訂的《中日聯合宣言》中雖然開始將中日的合作範圍擴大至亞洲太平洋地區，且欲建立「友好合作夥伴關係」，但由於在現實層面上兩國的關係未能修復，因此也導致友好合作夥伴無法發揮機能。⁹⁵第四份政治文件與上述三份文件的最大差異就在於明確的指出中日關係將走向世界，戰略互惠關係與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相較之下，亦有更大的建設性與可能性。

四、對日本的意義

從日本的國家利益的角度而言，與中國建立安定且可預測的合作關係是為國益。除此之外，將中國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最大化，促進國內企業發展及產業的強化也在日本經濟的成長戰略上有所助益。透過對話與中國建立關係，並與中國一同建構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亦為日本的國益。而戰略互惠關係則為日本實現這種種的國益帶來更大的可能性。戰略互惠關係做為日本的一種外交工具，其作法與目標是要穩定中日關係。更具體而言，戰略互惠關係的提出是因為在當時日本希望中國能夠改變想法，不要因一個歷史問題的存在，進而影響整體的雙邊關係。如前所述，日本在當時也已認知到中日關係不再只限於雙邊關係。就橫向的影響範圍層面而言，若中日關係惡化，地區及全球的政治都將受到影響；就縱

⁹⁴ 岡田實，(2008)。日中關係と ODA—対中 ODA をめぐる政治外交史入門—。東京：日本橋報社。頁 195。

⁹⁵ 小島朋之，(2006)。日中關係は戰略的互惠關係に。東亞，2006 年 11 月，頁 47。

向的時間層面而言，若中日關係在此時更加惡化，加上兩國互為鄰國，進而也會影響日後長遠的關係。

此外，戰略互惠關係一詞也凸顯了日本外交的自主性。由於在 1990 年代中國開始重新為雙邊關係重新定義，由當時的江澤民國家主席提出了「戰略夥伴關係」一詞。雖然中國與眾多國家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然而因其與日本間存在諸多問題，所以遲遲無法與日本建立這樣的關係。當時的中國希望日本首相首先做出不再參拜靖國神社的承諾，再與之簽訂戰略夥伴關係。然而日本一方面不願為不再參拜靖國神社做出承諾，也不願使用由中方所提出的關鍵詞來定義中日關係，因此才由日本主動提出戰略互惠關係。在中國接受後，經過多次的協調，最後兩國才終於決定使用戰略互惠關係一詞定義近年來的中日關係。

五、對中國的意義

雖然中國在國際上的存在感已大幅提升，但若想讓國家持續發展，仍有許多部份需要日本的協助。尤以在技術以及投資經驗等部分，中國尚有許多須向日本學習之處。再者，在當時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倡建立「和諧世界」。和諧世界的內涵不僅是維護本國利益，更是兼顧別國利益，並強調相互合作的外交手段。⁹⁶戰略互惠關係是兩國基於戰略利益的一致性，欲克服眼前的摩擦與紛爭，在動態平衡中實現各自的戰略利益與訴求。因此也是體現和諧世界的外交理念的一環，同時這也有助於中國建構與他國間和諧的國際秩序與周邊環境的需要。除此之外，戰略互惠關係也提升了兩國在經濟關係的重要性。

由於中國快速的成長，加上日本的發展日益減緩，使日本國內瀰漫著「中國威脅論」，加大了不平衡性和兩國的矛盾，中國可以透過與日本建立戰略互惠關係在共同發展之上，與日本建立一種新的動態平衡關係。再搭配前述的和諧世界

⁹⁶ 王緝思，和諧世界：中國外交新理念，**中國共產黨新聞**，2007年7月19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6006746.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12月19日。

論，也能夠告訴日本隨著經濟發展，中國在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也將增長，進而論證中國發展的合理性，為中國自身的發展保留擴展空間。⁹⁷

第四節 此階段中日關係的發展

壹、政治層面

在政治往來上，2008年7月於北海道洞爺湖舉行的G8會議中，中日兩國再次舉行了首腦會談。這是在確立戰略互惠關係後首次的雙邊首腦會談。雙方一致同意維持政治高層的對話與往來，並持續推動戰略互惠關係。⁹⁸同年8月，福田康夫受中國邀約，在北京奧運開幕之際再度訪問中國。根據統計，9月繼任福田首相上台的麻生太郎於一年多的執政期間，總共也有高達六次與中國間的首腦會談。⁹⁹2009年4月麻生首相訪中之際，其亦表示今後的日中關係或許不再需要用季節來比喻了，也稱這次的訪中是「穿梭外交」的一環。在兩國相安無事時保持中日高層間的互訪和交流，也意味著中日關係步入穩定向前發展的軌道。在多次的會談中也充實雙方的戰略互惠關係，促進相關的區域合作。¹⁰⁰頻繁的首腦對話不僅有助於增進兩國的信賴關係、增進兩國關係的發展，同時也是落實戰略互惠關係的具體表現。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是兩國首腦在雙邊或多邊對話場域對話的增加，也開始出現了新的多國首腦對話平台——「中日韓高峰會」。中日韓高峰會的構想最早可追溯至1999年日中韓三國在東協+3的框架內之互動。2008年受到國際金融風暴的波及，各國在域尋求鄰國的經濟協力的背景之下，日本的麻生太郎

⁹⁷ 高洪，(2008)。略論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亞非縱橫》，2008年第3期，頁1-4。

⁹⁸ 日中首腦會談（概要），日本外務省，2008年7月9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0807_sk.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12月20日。

⁹⁹ 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の要人往来・會談，日本外務省，2018年8月2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12月20日。

¹⁰⁰ 綜述：高訪“常態化”下的中日關係步入穩定發展階段，《中國新聞網》，2009年5月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5-01/1672632.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12月20日。

首相、中國的溫家寶總理以及韓國的李明博總統，三國領導人在日本福岡共同發表了《三國夥伴關係聯合聲明》，正式啟動了中日韓高峰會，為中日兩國在東北亞的區域整合帶來新的動力。

貳、經濟層面

如前所述，中日兩國即便在政治層面上產生分歧，經貿交流卻從未中斷，在確立戰略互惠關係後亦是如此。2008 年的金融風暴也為中日經濟合作方面帶來些許的影響。就進出口額而言，自 2008 年第三季度開始，特別是最後兩個月，中國對日出口開始大幅放緩，對日進口也連續下降。但中國仍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而日本也仍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和最大進口來源國。在此同時，由於日本對美出口持續下滑，中國便於 2009 年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就投資額層面而言，2008 年日本企業對中的直接投資的實際到位資金同比僅增加了 1.7%，但整體而言日本依然是中國外資的第二大來源。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於 2009 年日本某些企業將推遲或凍結對中的投資項目，但因中國的投資環境和優勢沒有改變，日本對中投資在重整後也逐步回穩。而在這段時間日本地方政府所提出的優惠政策也為中國企業在日投資提供新的動力。¹⁰¹

另一方面，於 2007 年融冰之旅所啟動的「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於 2009 年 6 月又再次啟動。在本次對話中，雙方達成了一同落實 G20 倫敦峰會的決議事項的共識，以維護金融市場穩定，並促進本國及世界經濟的恢復與成長。除了經貿交流外，環境保護的合作也是本次討論的焦點。¹⁰²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的有效執行是戰略互惠關係中所提到的「加強互利合作」的一環，因此該平台的啟動也是落實戰略互惠關係的表現之一。

¹⁰¹ 葉琳，(2008)。“金融大危機對中日經濟的影響”國際研討會會議綜述。日本學刊，2008 年第 4 期。

¹⁰² 第二回日中ハイレベル経済対話の概要と成果，日本外務省，2009 年 6 月 7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0906_g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0 日。

參、文化與人員交流層面

一、四川大地震

2008年5月，在確立戰略互惠關係後不到一星期，中國發生了四川大地震。本次地震一共造成7萬多人罹難、近2萬人失蹤，是中國史上最嚴重的地震之一。在地震發生的第一時間，福田首相便向中國表達慰問之意，也表示日本願意提供相關支援。¹⁰³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JICA 根據日本政府的決定，作為 ODA 的一環，開始對中國開展提供緊急救援物資、派遣國際緊急救援隊等多項支援活動，而日本的救援隊同時也是中國政府第一支批准進入災區的外國救援隊伍。

除了政府層面的慰問以外，四川大地震也對中日民間感情產生影響。日方除了提供贈款外，各大電視台也不斷播報中國震災的募款新聞。而本次日本提供給中國的賑災款項約為5億日圓。¹⁰⁴而中國對於日本在這次救災活動中的幫助，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報以較為正面的評價。透過本次震災造成兩國關係改善的原因主要有二：一為是中國輿論對日本的同情及支援的回應。如前所述，中國方面對日本方面的努力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這樣的評價也透過媒體報導快速於日本民間傳開。二為中國人在災難中的表現。日本媒體除了報導中方善意的回應以外，中國人在災難中相互協助的身影也透過媒體傳達給日本民眾。原先僵化的民間感情也透過媒體的報導出現改善的跡象，也使這次救災工作給兩國人民一個相互接近的機會。¹⁰⁵

二、北京奧運

¹⁰³ 中国四川省を震源とする地震の発生に対する福田総理兼胡錦濤国家主席及び温家宝総理宛見舞いの伝達，首相官邸，2008年5月12日，<https://www.kantei.go.jp/jp/hukudaspeech/2008/05/12messag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12月20日。

¹⁰⁴ 中国四川省における大地震に対する緊急援助について，日本外務省，2008年5月1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h20/5/1180110_907.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12月20日。

¹⁰⁵ 真實報導感動日本民眾 日本救援隊搭起中日橋樑(3)，人民網，2008年5月23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728648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年12月20日。

除了前述福田首相應邀參加北京奧運的開幕式，就政府層面表示支持中國所舉辦的大型活動以外，本次奧運也成為中日兩國拉近民間感情的一個平台。舉例來說，日本運動員在本次奧運中盡量展現了「中國元素」。日本奧運代表隊除了於開幕式中自發性地拿出中日兩國的國旗以外，其也在隊服上印上漢字。另外在花式游泳賽中，在日本籍教練井村雅代帶領下也提升了中國隊的成績。這種種的舉動讓中國人民拉近了對日的國民感情。值得一提的是在女足賽中，中國隊和日本隊展開了「友好競賽」。中國民眾相對積極、正面的看待這一系列的競賽。游泳比賽的頒獎儀式上，中國觀眾也為獲得金牌的日本運動員喝采。¹⁰⁶這種種的舉動皆充分展現出中日的友好氛圍，與 2004 年中日兩國民眾因日本蟬聯亞洲盃足球賽冠軍而爆發糾紛的景象呈現明顯對比。

總之，在 2008 年關鍵時刻，中國領導人對日中關係的重視，兩國實際外交關係的進展，地震援助、奧運等有助於拉近國民感情的事件發生，以及對這些現象媒體的積極呼應與配合，應該說是中國人看好中日關係的原因。

三、青少年交流

200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的 30 周年，同時中日兩國政府也把這一年定為「中日青少年交流年」。這個決議是於 2007 年的迎春之旅時達成共識的，當時中日兩國共同簽署了《關於“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動的備忘錄》。其中明示了兩國將在文化、學術、環保、科技、媒體、影視、旅遊等領域開展一系列青少年交流活動。同時，「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也是繼 2007 年「中日文化體育交流年」和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35 周年後，雙方著眼於增進兩國國民感情並培養友好事業接班人的一項重要交流活動。

於 2008 年日本總共派出了兩個青少年代表團訪中。第一個是在 3 月「交流年」中方開幕式時，以日本外務省政務官宇野治為總團長的第一批日本青少年友

¹⁰⁶ 奧運拉近中日民間情感：“中日良性迴圈的開始”，[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7689515.html)，2008 年 8 月 19 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7689515.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0 日。

好使者代表團 1000 人，第二個則是在 12 月中方「交流年」閉幕式時，以日中友好議員聯盟會長高村正彥為總團長的第二批日本青少年友好使者代表團 1000 人。而中國則總共派出了三個大型訪日團。第一個是於暖春之旅時以全國青聯副主席張曉蘭為總團長的中國青年代表團 200 人訪日，並參加了在早稻田大學舉行的「交流年」日方開幕式。第二個是在 7 月底以全國青聯主席助理倪健為總團長的中國青年代表團 327 人，第三個則是 11 月中以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盧雍政為總團長的中國青年代表團 300 人，並參加「交流年」日方閉幕式活動。¹⁰⁷

第五節 小結

綜上所述，中日關係從小泉時代降至冰點走出至完全建立起戰略互惠關係，是中日兩國領導人經過反覆協商以及不同層級的官員斡旋，才好不容易獲得的成果。同時戰略互惠關係也為中日關係揭開新的序章，其不僅為中日兩國帶來新的交流框架，同時也賦予中日關係不同的意義。雖然日本國內政治在這段期間相對不穩，出現一年更迭一次首相的情況，但同時也正是因為如此，日方不願在外交層面上與中國產生更大的摩擦。在確立戰略互惠關係後的四個月福田首相便請辭下台，雖然鷹派的麻生首相在上台前曾被視為中日關係的一個不確定因素，但其在任期間基本上還是維持了中日關係的穩定。

簡言之，在這段時期中日兩國皆視彼此為重要的夥伴，亟欲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實現友好關係，因此就連在複雜難解的東海問題上也達成了「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共識。然而在這其中也不難發現中日關係除了官方的政治領導以外，亦愈來愈受到大眾媒體及輿論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力也在下一章節中所要探討的「民主黨/胡錦濤時期」變得愈來愈龐大，成為中日關係另一項不確定因素。

¹⁰⁷ 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舉青春之力 謀世代友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8 年 12 月 18 日，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08-12/18/content_118204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8 年 12 月 21 日。

第四章 2009 年至 2012 年：胡錦濤/民主黨時期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在本章節中，第一節將就此時期的整體國際環境及情勢進行探討。又根據新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國內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環。因此在第二節及第三節中則將透過層次分析法的研究途徑，分述在此時期影響中日兩國政策的國內因素及領導者個人因素。於第四節則將檢視在此時期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所規範的五大領域的相關成果，用以評價此時期的中日關係。最後則是小結。

第一節 國際體系層次

在國際體系層次的部分，主要將分為兩個部分探討。分別是：美國的亞洲政策以及東亞的國際局勢。長年以來，由於美日同盟之故，美國常被指為影響日本外交政策重要的國際體系結構性因素之一，因此日本的外交政策在某種層面上時常受到美國的亞洲政策所影響。而除了美國因素以外，亞洲整體的國際局勢也將對中日兩國的外交政策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在本段落中將以這兩個部分為主軸進行相關的探討。

壹、美國的亞洲政策

2009 年 1 月，美國民主黨的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開始上台執政。在喬治·沃克·布希（George W. Bush）政權執政的八年期間，美國歷經了九一一事件，讓美國開始了一連串的反恐戰爭。然而這一連串的反恐戰爭不僅沒有顯著的成果，使美國的國際形象低落。也讓美國的經濟財政出現困境，國內社會問題頻生。除此之外，東亞的國際局勢也開始有所轉變。中國的崛起以及日本民主黨政權的上台，使美國在亞洲的地位受到影響。在這種種的背景之下，美國的外交政策出現了轉變。歐巴馬在競選總統期間便指出：「美中關係間不僅有利益衝突的地方，更有著廣泛的合作基礎與空間，因此美國與中國將形成競爭與合作的共存關係。」展現歐巴馬執政團隊重視中國的姿態。而其在上台之後也喊出了

重返亞洲的口號。¹⁰⁸時任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也在 2009 年 7 月的「東協區域論壇」中正式宣佈美國重返亞洲，不僅欲加強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係，也欲維持美國在此一區域的影響力。¹⁰⁹

美國的重返亞洲的舉動有幾個不同的階段。首先，在經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後美國經濟受到重創，相較之下，中國雖然也受到了不小的影響，然而其靠著強大的經濟復甦力減低金融風暴所帶來的衝擊，也開始以經濟大國姿態在世界上嶄露頭角。中國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也執行發多項具體措施，如：四兆元投資計畫。此計畫為一積極財政措施，其在執行上除了用於美國 7000 億美元紓困計劃以外，也用於公共投資，涵蓋範圍包括交通、農林水利、民生以及環保四大層面，用以維持經濟的穩定成長。¹¹⁰在當時，中國所持有美國公債價值超過 8000 億美元，形成美國對中國態度更加放軟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在面臨北韓核武問題、全球氣候變遷等全球議題上，中美兩國的合作似乎已無法避免。因此在 2009 年之時，美國開始欲與中國共同制定出解決全球問題的合作機制，「G2」（兩國集團論）也開始在美國興起。倡導 G2 的國際秩序的代表主要可列舉出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及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他們基於傳統現實主義及地政學的戰略觀點，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無法避免。他們認為，由中美兩國組成的「G2」不僅可以解決國際金融危機，有效解決氣候變化，限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甚至可能有助於解決以巴衝突。¹¹¹雖然日本在經濟上的重要性及美日同盟仍不可忽視，但站在地政學的觀點而言，中國將在未來比日本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故此，其主張應建

¹⁰⁸ 黃介正，(2009)。歐巴馬亞洲行與美國亞太戰略轉型。*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12 期，頁 1-4。

¹⁰⁹ The Associated Press, "U.S. 'is back' is Asia,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declares," **Daily News**, July 21, 2009, <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s/world/u-s-back-asia-secretary-state-hillary-clinton-declares-article-1.429381>

¹¹⁰ みずほ総合研究所，(2009)。中国『4 兆元』の経済対策の考察，取自：
<https://www.mizuho-ri.co.jp/publication/research/pdf/asia-insight/asia-insight090105.pdf>

¹¹¹ Elizabeth Economy and Adam Segal, "The G-2 Mirage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Not Ready to Upgrade Ties," **Foreign affairs**, May, 200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east-asia/2009-05-01/g-2-mirage>

立更為強韌的美中關係。為此除了需定期舉辦領導人的非公式會談，也需要將美中夥伴關係提升至全球的規模。¹¹²

2009 年之時，中美兩國的高層往來相當頻繁，以此為代表的為「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源於 2005 年的「中美戰略對話」（SD），在 2009 年 4 月 G20 召開之際，歐巴馬總統與胡錦濤決議將原有的「戰略經濟對話」與「中美戰略對話」整合，形成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歐巴馬政府不僅繼承了前布希政府的中美的對話機制，也將此一機制的層次提升，討論的議題也更為豐富且廣泛。¹¹³除此之外，於 2009 年除了歐巴馬總統親自訪中以外，國務卿希拉蕊、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約翰·福布斯·凱瑞（John Forbes Kerry）、眾議院議長南希·帕特里夏·裴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與財政部長提摩西·弗朗茲·蓋特納（Timothy Franz Geithner）皆有訪中的紀錄。另外，於 2008 年 10 月暫時被終止的中美國防部年度工作會也在 2009 年再次舉行，象徵著兩國軍事交流的回溫。¹¹⁴另外，於 2009 年 11 月歐巴馬總統訪中之時所簽定的《中美聯合聲明》中也明記：「中美在事關全球穩定與繁榮的眾多重大問題上，擁有更加廣泛的合作基礎，肩負更加重要的共同責任。兩國應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挑戰，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繁榮而努力。」¹¹⁵強化雙邊的戰略互信以及在全球問題上的「中美共治」儼然已成為此時期中美兩國的共同目標。

然而自 2010 年起，美國的亞洲政策開始稍有轉變，此時期的轉變主要來自於後述的中國崛起。儘管在胡錦濤時期中國不斷強調「和平崛起」，並以建構「和諧世界」為目標，然而其軍事力量的快速擴張再加上領導者意圖缺乏透明性之故，

¹¹² Zbigniew Brzezinski, "Moving toward a reconciliation of civilizations," **China Daily**, Jan 15, 20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9-01/15/content_7399628.htm

¹¹³ 背景資料：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新華網**，2015 年 6 月 24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6/24/c_1115704629.htm。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 日。

¹¹⁴ 陳積敏，2009 年中美關係：回顧與反思，**聯合早報**，2010 年 1 月 1 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letter/us/story20100101-50129>。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2 日。

¹¹⁵ 中美聯合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2009 年 11 月 24 日，<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zmsbzyjw/obama/t628909.htm>。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2 日。

使美國不得不增加在亞太地區的國防開支。除此之外，2010年中國的GDP總值正式超越了日本，成為了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前所述，美國在經歷2008年的金融風暴後，國力已大不如前。由於亞太地區擁有龐大的消費市場以及經濟地位，因此其對美國的經濟復甦來說扮演重要的角色。最後，隨著中國崛起，其軟實力（Soft Power）的增加也是造成美國的亞洲政策轉變的主要原因之一。¹¹⁶根據美國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於2010年的報告，美國的戰略轉變的原因主要可概括為下列五點原因：一、亞洲地區經濟的復甦與發展。二、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局勢轉變。三、區域多邊組織的快速發展。四、區域內所存在的傳統安全威脅。五、區域內潛藏的非傳統安全威脅。¹¹⁷

基於上述背景，美國的亞洲政策在2010年後具體展現於善用巧實力（Smart Power）來達成「再平衡」戰略（Rebalancing）。¹¹⁸再平衡戰略一詞最早是在2011年10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所發表的「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中被提出。其強調美國將來外交政策的焦點將從伊朗、阿富汗、敘利亞等中東地區轉移至亞洲太平洋地區，同時也將擴大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外交及戰略等層面的投資。¹¹⁹而歐巴馬本人也於同年11月在澳洲國會演講時也強調即便美國減少國貿預算，也不會減少在亞洲的軍事勢力，亦強調亞洲在經濟層面上對美國的重要性。¹²⁰而再平衡戰略的概念更加具體地是在2012年1月所發表的《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的國防上的優先任務》

¹¹⁶ 洪銘德，(2015)。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之研究。《全球政治評論》，第51期，頁147-165。

¹¹⁷ Ellings, Richard J., Robert M. Hathaway, Colin Clarke, Anand Yang, Davis E. Bobrow, Amitav Acharya and Parag Khanna (2010). Roundtable. Are We Adequately Trai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sia Experts? *Asia Policy* (No.9), pp.1-43.

¹¹⁸ 巧實力(Smart Power)是美國知名學者約瑟夫·奈爾(Joseph Nye)繼硬實力及軟實力後提出的第三種外交力量。其意指適當利用以軍事/經濟力量為主的硬實力以及以文化/價值觀為主的軟實力，利用軟硬兼施的手段，締造出新的外交力量。

¹¹⁹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¹²⁰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November 17, 201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中被提出。在文件當中指出就長遠的觀點而言，中國擁有影響美國的經濟與安全的潛在能力，因此美國應當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同盟與夥伴關係，並透過國際秩序的建構來確保區域局勢的穩定。¹²¹在這裡地亞太地區同盟則包含了日本，除了日本以外，韓國、菲律賓等國也是美國的重要夥伴。在此時期，美國為了維持其全球領導地位並控制成本，於是運用巧實力來回歸多邊主義，並發揮同盟的作用。在後述的東海議題及南海議題上，美國亦是透過動員相關的同盟來抑止中國的各項舉措。

綜上所述，美國於 2009 至 2012 年的亞洲政策的轉捩點主要是於 2010 年的前後，而最大的改變則是對中國態度的轉變，此也間接影響到了日本的政策。歐巴馬的亞洲政策結合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就前者而言指的是防範並遏制中國的崛起；後者指的則是兩國的相處中夾帶著競爭與合作，並試圖在這樣的過程中影響中國。¹²²筆者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及國際局勢的轉變，其現實主義的色彩也愈來愈明顯。

貳、東亞的國際局勢

一、中國崛起與大國化

在邁入 21 世紀後，國與國之間勢力的消長日益加劇。近年來，「中國崛起」這個詞開始在國際關係的領域中引起熱烈的討論。所謂的中國崛起，廣義而言，指的是中國在全球經濟、軍事、政治等方面的影響力日益增加一事。若從數據層面上分析，根據世界銀行 (World Bank) 的統計，中國的 GDP 產值於 2010 年達到了 6.101 兆美元，超越了日本的 5.7 兆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¹²³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在軍事方面也有顯著的成長。2010 年中國國防費預算

¹²¹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5, 2012, pp.2.

¹²² 金燦榮，「巧實力」：歐巴馬外交政策回顧與展望，**每日頭條**，2016 年 4 月 24 日，<https://kknews.cc/e/2ob9g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4 日。

¹²³ The World Bank Data,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

為 5321.15 億元，比 2009 年增長 7.5%。2011 年中國的國防預算為 6011 億元，相比 2010 年增加 12.7%。2012 年中國國防費預算為 6702.74 億元，比上年預算執行數增加 676.04 億元，增長幅度為 11.2%。而到了 2013 年，中國國防預算總額為 7202 億，較 2012 年提升 10.7%。¹²⁴此後中國的國防預算也一直維持雙位數的成長，雖然中國不斷的強調「和平崛起」，然而快速增長的軍事力也引發國際上的疑慮及批評聲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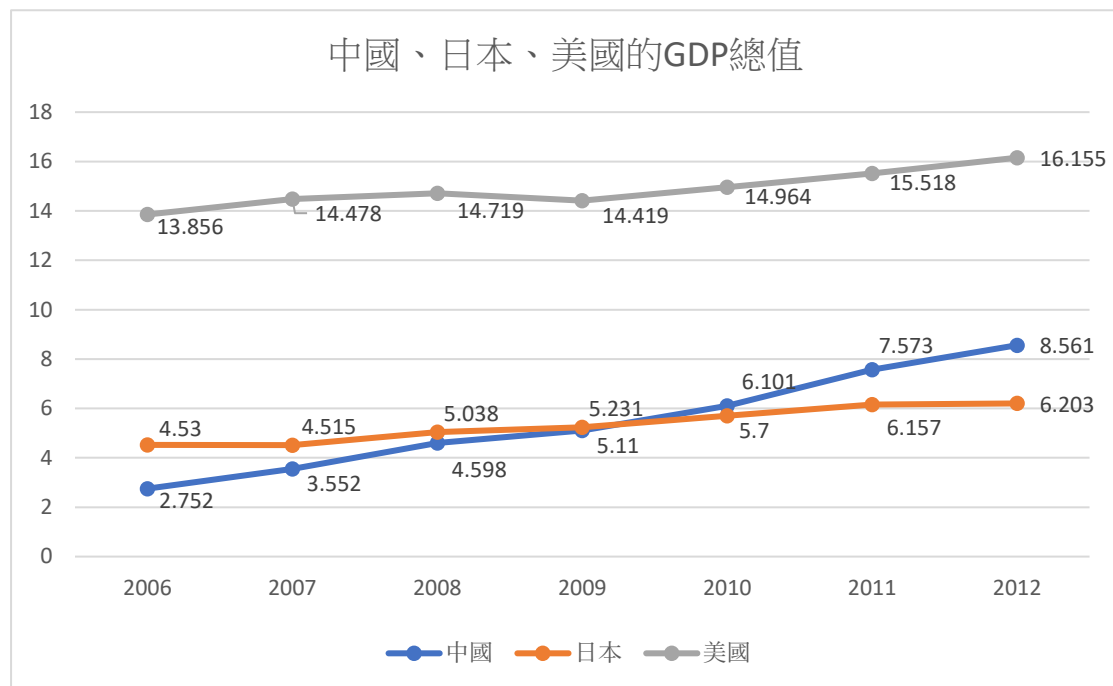


圖 4.1：中國、日本、美國的 GDP 總值。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世界銀行網站的數據。（單位：兆美元）

引用網址：<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¹²⁴ 陳志芬，兩會觀察：中國軍費和「維穩」開支，**BBC 中文網**，2014 年 3 月 5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3/140305_ana_china_npc_army。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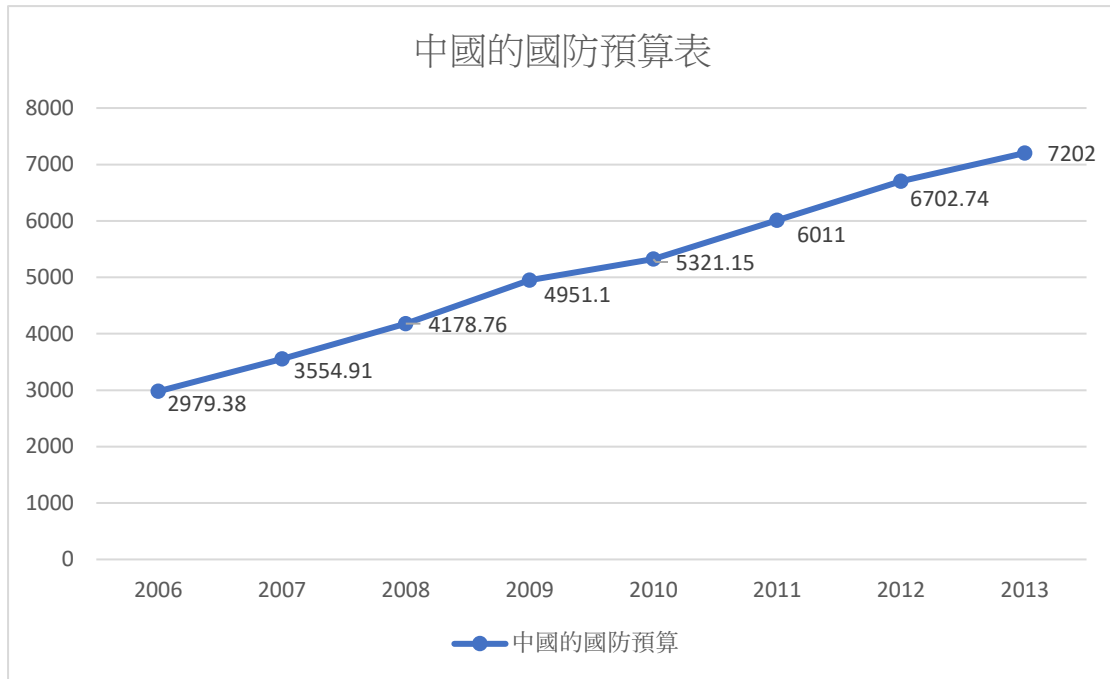


圖 4.2：中國的國防預算表。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中國國防部網站。(單位：億人民幣) 引用網址：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node_47121.htm

中國的快速成長除了透過上述的數值顯示出來以外，也呈現在其他方面。長期旅居日本，並曾受到中國公安調查的中國學者朱建榮指出，胡錦濤於 2006 年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首次提出了「大外交」的概念。同時於 2006 年中國中央電視台也開始推出了一連串以「大國崛起」為名的紀錄片，似乎有意喚起國人對「大國」的認識。¹²⁵而於 2009 年 7 月的第 11 次外交使節會議中，胡錦濤將鄧小平的「二十字外交方針」中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改成「韜光養晦、積極有所作為」，雖然中國當局對此沒有多做解釋，僅表示此為強調以往的方針，然而這使人與日後中國開始對外採取更為強硬的姿勢有所聯想。¹²⁶

再者，中國於近年來有從陸權國家走向海權國家的趨勢。中國重新重視海洋利益的開端在於 2002 年第十六次黨大會召開時所採用的「中國走出去」戰略，隨著海外經濟活動的發展，海外利益逐漸被置於國家利益的延長線之上。邁入 21

¹²⁵ 朱建榮，(2012)。中國外交 苦難と超克の 100 年。京都：PHP 研究所。頁 170。

¹²⁶ 宮本雄二，(2017)。強硬外交を反省する中国。京都：PHP 研究所。頁 74-78。

世紀後，在國家海洋局的主導之下中國開始加強了對有效支配海域的監視及巡航，並於 2008 年起中國海監總隊開始在東海定期巡航。¹²⁷於 2004 年起，中國海軍的主要任務開始包含了「維護島嶼的主權及海洋權益」，中國的認知為：「應屬中國管轄的 150 萬平方公里的海域遭到了外國有效支配，應屬中國的 50 餘座島嶼遭外國占領、海域遭到分化且應屬中國的海洋資源遭到掠奪。」¹²⁸因此為了維護海洋主權及防止中國的海洋權益受到侵害，中國也加強了在海上的軍事力量。除了以往的「近海防禦」以外，另外加上了「遠海防衛」。舉例來說，中國海軍的艦隊於 2009 年左右開始越過第一列導線而到達了西太平洋，並開始倡導「遠洋航海訓練的常態化」。除中國重視遠海的背景來自於其經濟的快速成長，為了確保原料及製品的進出口海上交通路線及天然氣與石油等天然資源的開發，以及在下一章將會提及的「一帶一路」構想。¹²⁹而隨著中國的成長，其感受到權益大大受到侵害的海域便是近年來具有爭議的東海及南海。

除此之外，中國在近年來也開始強調「核心利益」。核心利益一詞的使用使於 2000 年代，所謂的核心利益，雖然最初僅限定在國家主權及領土保全，然而隨著中國對外交勢逐漸變得更加強硬，其內涵也開始擴大。¹³⁰如於 2009 年 7 月國務委員戴秉國即向美國指出，中國的核心利益包含了：「一、國家的基本制度與國家安全。二、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三、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而於 2011 年 9 月，中國為了消弭國際間所瀰漫的「中國威脅論」，因而出版《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當中雖然強調中國的「和平發展」，然而其中也將核心利益定義為：「一、國家主權。二、國家安全。三、領土完整。四、國家統一。五、中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大局的穩定。六、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中國首次在白皮書上對核心利益進行正式闡述，但此後中國對核心利益的

¹²⁷ 毛里和子，(2016)。中國政治 習近平時代を読み解く。東京：山川出版社。頁 109-111。

¹²⁸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中國安全保障レポート 2016。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頁 6-9。

¹²⁹ 同前註。

¹³⁰ 黃安偉，(2015)。國家安全法再次定義中國核心利益，紐約時報中文網，2015 年 7 月 3 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0703/c03chinamemo/zh-hant/>。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0 日。

解釋仍持續擴大。¹³¹由於國家的核心利益不容侵犯是國際社會的共識，因此任何國家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維護。在此時期，中國希望通過此白皮書向世界展現其致力於和平並展現欲合作解決爭議的誠意；另一方面其也意指若是為了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若中國在不得不的情況下採取強硬手段和政策，並不能算是違反其對和平發展的承諾。總而言之，白皮書在一定程度上賦予中國以退為進的空間。¹³²然而筆者認為，中國無法以捍衛其所定義的核心利益為藉口而損及他國的國家利益。以南海爭端為例，南海是否確實為中國的領土仍有待商議，中國無法以單方面的定義對南海採取強硬的措施。然而近年來其在南海爭端的強硬姿態有增無減，這也是國際仍對中國崛起懷有戒心與疑慮的原因之一。

最後，中國在太空及人工衛星等航空技術層面以及軟實力（Soft Power）方面也有長足的發展。2003年，中國成為了繼美國及蘇聯後，第三個可以獨立將人類送入太空的國家。2005年，中國發射了第一艘執行「多人多天」任務的載人飛船。2007年，中國成為了繼美國及蘇聯後有能力發射飛彈並摧毀人造衛星的國家。而於2008年，首次成功實現太空人出艙活動，這代表中國已經掌握載人航天、太空行走等技術。2011年，中國的無人飛船與此前發射的目標飛行器進行了空間交會對接，組成一座小型的低地軌道「空間實驗室」。這表示中國已經成功突破了空間交會對接及組合體運行等一系列關鍵技術，同時也拉開了中國建構太空站的序幕。2012年中國則實現了人控交會對接，表示中國人已具備了向在軌航天器進行人員輸送和物資補給的能力。¹³³中國在航天技術方面的快速發展令世界側目，尤其是中國導彈擁有打擊人造衛星的技術更是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在軟實力層面上，中國也開始積極拓展。根據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報告，胡錦濤

¹³¹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1年9月6日，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1-09/06/content_4295874.htm。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3月8日。

¹³² 潘兆民，(2011)。中國大陸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的戰略分析。《展望與探索》，第9卷第10期，頁13-18。

¹³³ 資料：中國「神舟」載人航天歷史，BBC中文網，2013年6月11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38451050>。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3月8日。

首次在全黨代表大會使用軟實力這名詞。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¹³⁴雖然其在現階段仍無法超越日本、美國等先進國家，然而在近年來也能發現中國在世界各地的校內廣建「孔子學院」，欲以文化交流及教育交流的方式來將中國的文化、語言等對外進行推廣。然而中國這樣的舉動，在近年來則在國際上被批評，認為其試圖以「銳實力」影響並控制他國的行為。¹³⁵

綜上所述，中國在近年來於各方面有快速的發展，其對外交勢也有愈來愈強硬的趨勢。然而，在崛起的同時，中國內部仍存在著許多待解的問題。如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下所產生的貧富差距加劇、快速工業化所產生的水質汙染、空氣汙染等環境問題、勞資關係不佳、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內部的腐敗產生不滿等問題皆是使中國社會不安定的原因。¹³⁶這是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所必須面對的困難，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便這些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中國在國際上日益增加的存在感及影響力確實正慢慢的在改變整個東亞的國際局勢，並引發了世界的關注。

二、東北亞安全局勢

北韓核武問題一直是影響東北亞秩序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日本安全保障問題重要的一環。北韓核武問題首次引發國際關注是在 1990 年代，其起因於北韓於 1985 年加入了《核武禁擴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簡稱 NPT），卻又突然於 1993 年自行宣布退出，引發國際譁然。而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則是在 2002 年北韓承認已開始研發高濃縮鈾（HEU）核武

¹³⁴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07 年 10 月 25 日，<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429414.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8 日。

¹³⁵ 乘原響子，(2018)。中国のシャープパワーに翻弄され続けた世界，WEDGE Infinity，2018 年 11 月 1 日，<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14382>。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0 日。

¹³⁶ 豊田正和、小原凡司，(2017)。曲がり角に立つ中国 トランプ政権と日中関係のゆくえ。東京：NTT 出版株式会社。頁 26-48。

引發，為了解決該問題，六方會談因而啟動。當時的美國由於致力於國際反恐活動，為了減少交涉的成本負擔，因此欲使用多邊協商框架來解決此問題。六方會談的成員除了北韓與美國外，尚還有日本、中國、南韓與俄羅斯。六方會談的主要成果可列舉出 2005 年的「919 共同聲明」、2007 年的「213 協議」與「103 協議」等等，然而在 2009 年 4 月後北韓又重啟了部分原先以廢止的核子相關措施，並於同年 5 月強制執行第二次核實驗，此外又於 2010 年公開濃縮鈾離心分離機設施，六方會談的框架自 2007 年以來並無顯著成果，已幾近名存實亡。

再加上 2010 年 3 月發生的「天安艦事件」及 10 月發生的「延坪島炮擊事件」，使南北韓的關係更為緊張與惡化，連帶的也影響了整個東北亞安全局勢。¹³⁷以下將分別探討此時期針對東北亞安全局勢中國與日本的立場與看法，並觀察其中利害的重疊與衝突，於此基礎上再來探討中日兩國是否於「共同致力於亞太地區的發展」上有所貢獻。

（一）中國的立場

胡錦濤時期中國政府的對北韓政策的核心基礎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第一、維護北韓體制的穩定。第二、解決北韓核武問題與朝鮮半島無核化。第三、維持對北韓的影響力。第四、引導北韓改革開放。¹³⁸由於中國與北韓間存在著《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在北韓核武問題上對其制裁的聲音也較小，因此經常被視為較為包容北韓的一方。然而在 2009 年 5 月北韓強制執行第二次核實驗後，中國對北韓的態度也開始稍有轉變。在北韓進行第二次核實驗前，中國對此問題的態度較為緩和，並希望能夠透過對話的方式誘使北韓棄核。且在此時期中國對北韓所處的立場亦表示理解，面對遭到大國包圍的孤獨感與美國先發制人的壓力，其認為北韓搬出核武的說法是為一種為了維護本國體制安全的一種「防禦性手

¹³⁷ 朴炳光，(2012)。北韓核武問題之未來展望。《全球政治評論》，第 38 期，頁 21-24。

¹³⁸ 朴炳光，(2010)。胡錦濤時期中國對北韓政策及其對北韓核武問題之認知。《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頁 27-46。

段」。¹³⁹然而北韓進行第二次核實驗使中國的兩個目標，也就是「朝鮮半島無核化」與「中朝合作關係」難以被落實，國際上要求中國參與制裁北韓的呼聲也愈來愈強烈。中國外交部也發出聲明，指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無視國際社會普遍反對，再次進行核子試驗，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堅決反對。」¹⁴⁰同時也同意了較第一次核實驗（1718 號）更強而有力的聯合國制裁決議案（1874 號），罕見的在此問題上表現出較為強硬的姿態。

雖然中國在經歷北韓兩次的核實驗後對期產生認知上的轉換，但卻將此轉換形成政策上的變化。這是因為當時中國的領導階級考量到中朝關係的歷史關係，並視北韓的安全與戰略價值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故仍以包容的態度作為對北韓政策的基礎。即北韓的舉動雖然對中國造成困擾並形成一種戰略負擔，但仍肯定北韓作為一種戰略資產的價值。與其失去北韓此一戰略資產並承擔北韓可能因此崩潰的未知局面，不如穩定地管理中朝關係，並藉此發揮國際影響力、加大在國際場域上的話語權較為實際。同時也呼應了後述胡錦濤政權所提倡的「和諧世界」，因此中國雖然同意了聯合國的制裁，但同時也決定要漸進性地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呼籲北韓回歸至六方會談的框架進行協商。¹⁴¹

（二）日本的立場

民主黨在面對北韓核武問題的立場與自民黨看似沒有太大的區別，但在面對北韓時所採取的態度仍有些微的差異。根據 2009 年民主黨所發表的政策宣言，當中對北韓的描寫僅止於：「日本無法容忍北韓反覆的核實驗及飛彈試射，為使北韓放棄核子、化學與生化武器，日本將與美國、韓國、中國與俄羅斯等相關國

¹³⁹ 張璉堯，(2004)。送走切尼 迎來金正日：判讀北韓核武問題走向。《世界知識》，第 2 期，頁 9。

¹⁴⁰ 中國外交部就朝鮮再次進行核子試驗發表聲明，人民網，2009 年 5 月 25 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9491/142315/9361835.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0 日。

¹⁴¹ 朴炳光，(2010)。胡錦濤時期中國對北韓政策及其對北韓核武問題之認知。《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頁 27-46。

家合作，徹底的執行貨物檢查。最後將北韓綁架日本人問題視為對日本的主權侵害，民主黨將致力解決該問題。」¹⁴²而民主黨於 2010 年所發表的政策宣言中對北韓的描寫也幾乎與 2009 年的政策宣言一致，如此可見民主黨在「使北韓全面放棄核武」與「致力解決北韓綁架日本人問題」的基本立場與前政權沒有太大的差異。¹⁴³

然而在鳩山由紀夫執政時期，其開始提倡「友愛外交」。所謂的友愛外交，指的是在面對與日本的價值觀相左的國家時互相尊重並和平共存。¹⁴⁴因此比起前政權所採取的「價值觀外交」，意即強調與和日本同樣具有尊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市場經濟等基本價值的國家強化合作的態度，其對北韓的態度相對而言是較為緩和的。並且其在上任前亦表示：「日本在北韓核武問題中總是被置於事外，因此無法完全發揮日本的力量一同解決問題。而此一問題的根本來自與美國間的信賴關係不夠充分，因此日本總是無法透過美國事先得知相關的情報。故此，除了必須加強與美國間的信賴關係以外，更需要加強與中國間的合作。」¹⁴⁵

到了菅直人執政時期，民主黨的態度又開始有了轉變。原先因沖繩美軍普天間飛行場搬遷問題而弱化的日美同盟，於 2010 年因擔心北韓對日武力威脅而逐漸重修舊好，並有強化的趨勢。加上菅內閣忙於內政以及後述的釣魚台問題，因此在東北亞安全保障的問題上較鳩山政權較傾向於與美國合作。菅直人在任之時，也追加了對北韓的經濟制裁措施，並制定了《關於北韓特別貨物檢查特別措施法》（原文：北朝鮮特定貨物の検査等に関する特別措置法），加大了對北韓的壓力。

¹⁴² 日本民主党，(2009)。民主黨の政權政策 Manifesto2009，取自：

http://archive.dpj.or.jp/special/manifesto2009/pdf/manifesto_2009.pdf

¹⁴³ 日本民主党，(2010)。民主黨の政權政策 Manifesto2010，取自：

<http://archive.dpj.or.jp/special/manifesto2010/data/manifesto2010.pdf>

¹⁴⁴ 第 174 回国会における鳩山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政府インターネットテレビ，2010 年 1 月 29 日，<https://nettv.gov-online.go.jp/prg/prg3202.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0 日。

¹⁴⁵ 鳩山会見詳報(2)完「友愛外交で EU できた」，産経ニュース，2009 年 5 月 26 日，<http://web.archive.org/web/20090529123603/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policy/090526/plc0905261915025-n1.htm>。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1 日。

¹⁴⁶爾後的野田佳彥政權更是加強了日美同盟，其在任期間訪美，與當時的總統歐巴馬進行了首腦會談。這是於 2009 年日本進行政權交替後首次舉行的日美首腦會談，也象徵日美同盟逐漸回穩。同時於會談中野田首相也表示，欲與美國在北韓核實驗及飛彈試射的問題上加強合作，使日美同盟更加深化。¹⁴⁷雖然民主黨在上任之初提倡須更加重視與亞洲各國的關係而有疏遠美國的傾向，然而到了後期則意識到了美國對日本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因此又逐漸回歸了以日美同盟為基礎的外交路線。

三、兩次釣魚台事件

(一) 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釣魚臺相撞事件

中日兩國間於 2010 年及 2012 年分別發生了一次圍繞著釣魚台問題的糾紛，此二事件也是使 2006 年至 2008 年好不容易修復的中日關係再次跌落谷底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釣魚台糾紛發生在 2010 年 9 月，日本的海上保安廳巡視船在釣魚台海域與中國漁船發生衝撞，並將中國船長扣押，引發中國強烈的抗議。此事件的發生過程及大致處理過程如下：9 月 7 日，一艘名為「閩晉漁 5179 號」的中國拖網漁船於釣魚台海域進行捕撈作業時，被日本海上保安廳 11 管所屬「與那國號」等巡邏船驅趕並發生。9 月 8 日，日本海上保安廳將中國船長以妨害公務的罪名逮捕。翌日，船長被移送至那霸地檢署石垣分部接受調查。9 月 13 日，日本首先釋放了 14 名船員歸國，將船長延長扣押至 19 日。9 月 19 日，日本決定延長船長的扣押時間 10 日。在此過程中，中國總理溫家寶在訪問聯合國大會時也

¹⁴⁶ 宮本悟，(2011)。國際的制裁と對外政策。載於中川雅彦(編)，**朝鮮労働党の権力後継(情勢分析レポート)**。千葉：アジア經濟研究所。頁 25-49。

¹⁴⁷ 日美首腦會談(概要)，**日本外務省**，2012 年 5 月 1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noda/usa_120429/pmm.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1 日。

針對日本的行為進行批判，並呼籲日本立刻釋放船長。而於 25 日清晨，船長便乘坐中國政府歸國，此事才暫時告一段落。¹⁴⁸

本次的衝突主要帶來幾個嚴重的影響。首先，中國為了向日本表示抗議，不僅多次向前日本駐中國大使丹羽宇一郎提出抗議，甚至一度暫停了對日出口稀土類金屬。此舉也造成了中日關係的「政經分離」原則受到了動搖，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擔心倘若下次發生類似的事件，中國會不會對日本施予經濟制裁。在民間層面上，根據日本內閣府「關於外交的民意調查」顯示，在事件發生後的 2010 年底，日本民眾對中國懷有好感的民眾從 2009 年的 38.5% 降低至 20%，而不對中國懷有好感的民眾則從 58.5% 飆升至 77.8%。¹⁴⁹ 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也開始上揚，「反中論」亦開始盛行。而中國也一度限制了國民的赴日旅遊，於 2010 年十月中國各地也開始發生了大大小小的反日遊行，雙方的國民感情因此事件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在政府層面上，在事件發生後中日領導人也多次於國際場域上沒有會晤，政府間的互信亦受到了不小的影響。筆者認為，由於戰略互惠關係的達成需要強烈的雙邊互信，因此本次事件也可以說是讓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受到重大挫折的最大原因。

¹⁴⁸ 相關文獻參照：伏見岳人、佐藤悠子、玉置敦彥(譯)，(2018)。日中 親愛なる宿敵(Sheila A. Smith 原著)。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 163-201。

石原忠浩。2010。中國漁船碰撞日本巡邏船事件與日中關係。*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 13 期，頁 19-23。石原忠浩。2012。『政治主導』的對外政策？——日本民主黨執政下的日『中』關係。*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7 期，頁 42-58。

¹⁴⁹ 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內閣府世論調査*，2010 年 12 月 20 日、2012 年 1 月 30 日、2012 年 11 月 26 日、2013 年 11 月 25 日，<https://survey.gov-online.go.jp/index-gai.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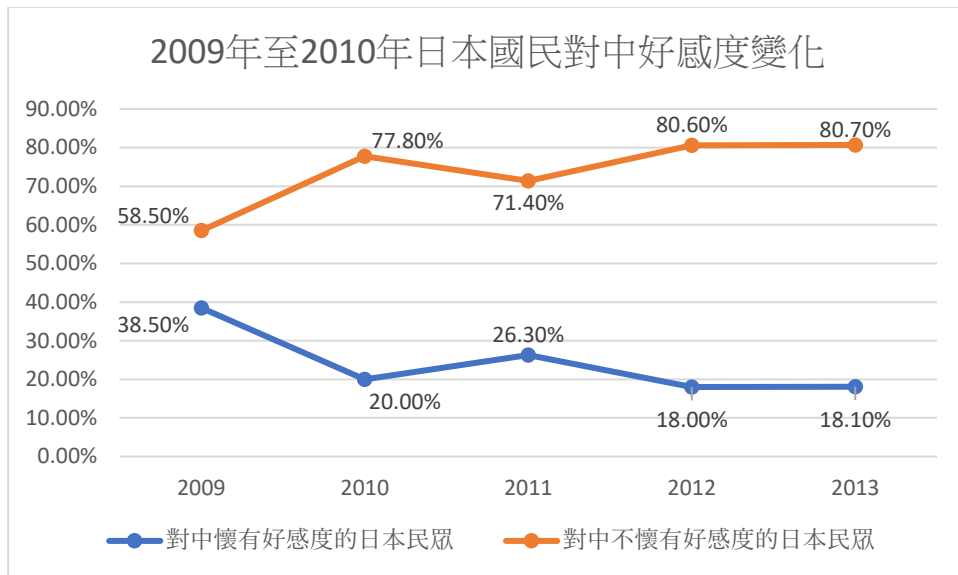


圖 4.3：2009 年至 2013 年日本國民對中好感度變化。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日本內閣府網站。引用網址：<https://survey.gov-online.go.jp/h22/h22-gaiko/2-1.html>

此外，針對本次事件，美國政府首次做出「釣魚台海域屬於日美安保範圍」的發言，這與前述的回歸亞洲政策並加強在亞洲的同盟關係有很大的關連，亦有部分專家認為這是本次事件日本得到的唯一「戰利品」。也因本次事件使日本的輿論強烈地感受到美國才是能夠可靠的同盟國家，如根據日本讀賣新聞的民調顯示，有 71% 的民眾認為：「有關釣魚台的問題，應當加強與美國之間的同盟關係」。¹⁵⁰ 日本的海上防衛政策在此事件後也有所轉變，除了修正了《海上保安廳法》以外，自衛隊更是加強了與美軍間的防衛演習與合作。透過這種種的舉措可以觀察到在東海問題上，美日攜手抑止中國的局面更加明顯，不僅使 2008 年所達成的東海共同開發協議破局，也間接使「共同努力，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標愈來愈難以被實現。

(二) 釣魚台國有化事件

¹⁵⁰ 石原忠浩，(2010)。中國漁船碰撞日本巡邏船事件與日中關係。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 13 期，頁 19-23。

2012 年中日間發生了釣魚台國有化事件，距離前一次圍繞釣魚台發生糾紛時隔不到兩年，中日間再次因為釣魚台產生摩擦。此事件源於當時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欲讓東京都政府取得釣魚台的管轄權，而開始的一連串「購島」行為。2012 年 4 月，石原都知事便宣布將從釣魚台的南小島、北小島的擁有者栗原弘行手中收購此二島。在此同時，當時的沖繩縣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也對東京都購買釣魚台一事表達支持。爾後，甚至有日本民眾發起了「一人捐一萬」的活動，支持政府購買釣魚臺的決定。4 月底，東京都政府甚至成立了「東京都尖閣諸島寄付金」帳號，為了購島而公開進行了募款計畫。該募款於 6 月之時，募款金額突破了 10 億日圓。同年 7 月，當時的野田內閣為了加強穩定管理並避免由東京都政府管轄所產生的行政問題，而宣布將由日本政府進行收購，並於 9 月正式購入南小島與北小島。¹⁵¹

自石原都知事宣布購島計畫後，中國便不斷的進行抗議，然而日本政府不予理會，購島的呼聲反而愈來愈大。根據當時日本讀賣新聞的民調顯示，支持釣魚台國有化的民眾佔了 65%，反對釣魚台國有化的民眾僅佔了 20%。而日本經濟新聞的民調也顯示，90%的民眾認為日本需要強化釣魚台的實際控制；46.7%的民眾則支持釣魚台國有化；45.5%的民眾支持東京都購買釣魚臺；僅有 7.8%的民眾支持維持現狀。¹⁵²顯示當時日本政府的購島行為並不僅只是政府單方面的行為，而是在後面有強力的民意支持。根據相關調查，2012 年中日雙方對彼此的好感度比起 2010 年發生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釣魚臺相撞事件後還要更加低迷。相

¹⁵¹ 此過程參閱以下的著作：春原剛，(2013)。暗闘 尖閣国国有化。東京：新潮社。頁 121-260。

¹⁵² 日調查稱日本超 6 成受訪民眾支持釣魚島“國有化”，環球網國際新聞，2012 年 7 月 16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07/2917080.html?agt=131>。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5 日。

對於 2010 年的 20%，2012 年在日本對中國抱有好感的民眾僅剩 18%。¹⁵³而中國對日本抱有好感度的民眾也從 2010 年 28.6% 的跌至 5.2%。¹⁵⁴

可想而知，本次事件與前年的紛爭一樣，影響的層面不僅止於民間，也波及到了兩國政府的信賴關係。中國一方面主張日本的行為無效並堅持釣魚台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以外，此後，其也強化了在釣魚台及其附近海域的監視活動。例如在 2012 年 12 月，便發生了中國小型偵察機侵犯日本領空的摩擦。此時期中日兩國相繼在東海上發生的領土相關爭議，使中日關係又再度跌入了谷底。

第二節 國內政治結構層次

在國內政治結構層次的部分，除了國內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會為一國外交政策帶來影響以外，隨著一國所追求的國家利益的改變，其對外政策也會隨之不同。在本段落中，筆者將以中國與日本的「國家利益」與「國內政治環境」兩個部分為主軸，探討影響此時期推行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國內因素。

壹、中國國內局勢

一、國家利益

2008 年，發生了以美國為首的全球金融風暴。這場金融風暴不僅為歐美國家帶來嚴重且深遠的影響，同時也對亞洲各國的經濟帶來不小的衝擊。又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下稱:IMF)的報告顯示，其預估 2009 年美國的經濟成長率近乎是 0%，而英國的經濟成長率僅有-0.1%，日本則僅有 0.5%。在這波經濟衰退期中，中國持續的經濟成長也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根據 IMF 的報告，其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仍有 9.3%。此外，在同一報告中也指出，2009 年的全球經濟成長動力幾乎來自於新興經濟體，其中最具潛力的變為中國。

¹⁵³ 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内閣府世論調査，2012 年 11 月 26 日，<https://survey.gov-online.go.jp/h24/h24-gaiko/2-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5 日。

¹⁵⁴ 張隕壁，2014 中日關係輿論調查 公眾好感度不樂觀，中國日報中文網，2014 年 9 月 9 日，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4-09/09/content_18568473.htm。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5 日。

其預估新興經濟體於 2009 年的經濟成長率將在 6%，其中發展中亞洲經濟成長率為 7.7%。¹⁵⁵

中國雖然挺過了此波金融風暴，然而全球經濟不振也使得促使中國經濟成長的出口大幅減弱，全球需求的減低也使得投資意願下降，因此也為中國帶來一定的影響。自胡錦濤上台後，中國便開始推行了一系列的發展策略與社會政策，其中包含了改善社會安全體系、完善金融體系、刺激國內消費等等。然而受到 2008 年金融風暴的影響，胡錦濤政權在推行各項經濟與社會轉型的需求更為急迫。這也連帶影響了中國的對外政策。

2009 年 7 月，胡錦濤便在中國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指出：「中國的外交工作必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服務。」¹⁵⁶而在胡錦濤執政時期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則在 2010 年年末發表了一篇名為「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文章。文內更加詳述了這些核心利益的意涵。文中指出中國的核心利益包含三大範疇：一是中國的國體、政體和政治穩定，即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二是中國的主權安全、領土完整、國家統一；三是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

故此可以看出，中國於 2009 年後的外交政策依此三大核心為主軸而展開。這也影響了胡錦濤政權後期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實行，中國在此時期比起以往更加強調主權與領土完整的重要性，推行了更多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並加強國防建設。如前所述，在兩次釣魚台事件中，中國皆採取了相對強硬的立場，這不僅在中日兩國維持東海和平的合作上產生阻礙，同時也嚴重影響了其他各項戰略互惠關係的細項的執行。

¹⁵⁵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Research Dept.,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8 : Financial Stress, Downturns, and Recover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ctober 10, 2008,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6/12/31/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08-Financial-Stress-Downturns-and-Recoveries-22028>

¹⁵⁶ 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在京召開 胡錦濤溫家寶講話，**環球網**，2009 年 7 月 20 日，<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mbkx>。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3 日。

二、國內政治環境

2009 年至 2012 年屬於胡錦濤時代的末期，此時中國國內的權力鬥爭愈發激烈，其中甚至牽扯到了龐大的人事及金錢爭奪。此時中共指導部大致可分為三派，一派為由江澤民為中心的上海派；另一派為由胡錦濤所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簡稱：共青團）；最後則是以習近平為中心的太子黨派。除此之外，尚有政治家利用個人關係所產生的利益導向政治，國務院中也有許多不同的政策集團存在。¹⁵⁷特別是人民解放軍與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等國防組織的上層官員與黨中央上層的派閥也有著一定的特殊關係，因此筆者認為中國看似是由共產黨單獨領導，然而其中的政治運作並非一黨專政如此單純。

觀察中共最高權力機關「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則可以發現，胡錦濤時代的政治權力基礎並不牢固，因此其在權力的行使上時常受到牽制。於 2007 年舉辦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後所決定的常務委員九人中，除去胡錦濤與溫家寶後，尚有五人為江澤民派（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賀國強、周永康）。雖然好不容易安插其親信李克強進入常務委員，受到曾慶紅等江澤民派推舉的習近平亦被選為常務委員，使當時中國的後胡錦濤領導集團的去向更為模糊。¹⁵⁸因此在眾多場合中，仍能感受到胡錦濤的施政受到了江澤民派等人的掣肘。加上江澤民派多為擁護既得利益集團及既存體制的守舊派，因此受到了長老們及後述的國有企業集團支持；相反地，雖然胡錦濤打出了縮小社會貧富差距的「和諧社會」的口號，看似正確的執政方向卻因其改革志向較為強烈，因此不論是在內政或外交上都到了多數守舊派及既得利益者們的牽制。

貳、日本的國內局勢

一、國家利益

¹⁵⁷ 国分良成，(2017)。中国政治からみた日中關係。東京：岩波書店。頁 217-218。

¹⁵⁸ 同前註。頁 219。

日本民主黨對國家利益的定義，從其所發表的政權公約(manifesto)中可略知一二。有學者指出，在民主黨政權公約制定的過程中，代表的意志扮演關鍵的角色。黨主席一方面與幹事長、政策調查會長等黨內重要幹部，進行黨內外意見的整合；另一方面也將本身的政治理念，以政策主張的方式融入政權公約的內容中。因此民主黨的政權公約也可以說是反映出黨主席的意念之產物。

然而，民主黨黨主席的更替過於頻繁，政權公約的內容也較為不連貫。為了消除民眾對民主黨的不確定感，民主黨在政權公約中的外交與安保政策中的篇幅中保持了對政策的一慣性。¹⁵⁹若觀察其中的內容，可以發現對民主黨來說，除了日本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是外交上的一大核心問題以外，改善與美國間的「不對等」關係也被視為國家利益之一。另外，在亞洲政策方面，民主黨與自民黨不同，其主張更加加強與亞洲國家間的關係，與中國、韓國間建立「東亞共同體」也是其重要的外交目標之一。然而此目標也隨著鳩山政權的下台後逐漸消失，後鳩山政權對東亞共同體幾乎沒有具體的政策主張，更遑論其構想與實踐。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民主黨政權上台時，便指派相當重視中日關係的岡田克也擔任外務大臣，可見民主黨政權其對中關係的重視。¹⁶⁰此外，民主黨的對中政策似乎也相當重視與中國之間的「經貿關係」。由重要的人事部署中可以看出些許端倪。如民主黨政權的駐中大使任命了前伊藤忠商事的社長丹羽宇一郎擔任。丹羽宇一郎在伊藤忠商事從商時曾積極展開對中國企業的投資，同時他也是北京市市長國際企業家顧問會議的顧問，可以看出其與中國間緊密的商業關係。這是日本有史以來任命民間人員任職政府內重要職位，因此也可以看出民主黨在對中經濟層面上的重視。¹⁶¹但也正因如此，在發生前述的釣魚台事件之時，沒有外交

¹⁵⁹ 李世暉，(2011)。日本民主黨政權的外交政策思維。《國際關係學報》，第三十二期，頁 157-173。

¹⁶⁰ 日本民主党「靖国神社は絶対参拝しない」，人民網日本語版，2010年7月7日，<http://j.people.com.cn/94474/702788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6月15日。

¹⁶¹ 中国大使に丹羽宇一郎氏が決定，人民網日本語版，2010年7月7日，<http://j.people.com.cn/94474/702788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6月15日。

談判經驗的丹羽宇一郎無法在第一時間進行協調，導致後續對中日關係帶來極為深刻的影響。

在民主黨的執政下，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似乎能順利地被執行。然而民主黨的國家利益與中國的國家利益間仍有一定的衝突，例如民主黨特別重視「民主」以及「人權」問題。例如民主黨內的前官房長官枝野幸男即為日本國會跨黨派「西藏問題議員聯盟」的代表，民主黨內部亦有 50 多名議員為「日華議員懇談會」的成員。此外，「日本台灣友好議員懇談會」、「日本台灣安保經濟研究會」等親台組織內也多有民主黨成員在籍。¹⁶²在民主黨的對中政策的制定上，佔有重要位置的海江田萬里也曾針對藏獨、疆獨以及臺獨等問題表示：「關於這些問題，我們是作為人權問題來對待的，與干涉內政是兩回事。中國若想在國際社會獲得名譽和地位，就不能回避人權問題。」¹⁶³這與前述的中國的「維護主權及領土完整」的核心利益產生重大的衝突，也為中日關係帶來一定的影響。

此外，海江田萬里也曾表示：「在海洋權益方面，日本政府將繼續主張主權，但重要的是確立不使用武力的共同原則。」¹⁶⁴表明民主黨與自民黨一樣，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問題上不會輕易讓步的基本立場和原則。甚至有學者表示，在涉及領土、資源和海洋權益等現實國家利益的爭端上，民主黨有時會鼓吹采取比自民黨還要強硬的對策和態度。¹⁶⁵如前所述，中國在海洋權益上也絲毫沒有妥協的跡象，這也使得以「東海上的互利合作」為契機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執行變得更加困難。

二、國內政治環境

¹⁶² 林曉光，日本民主黨政府的對中政策，**鉅亨網新聞中心**，2015 年 10 月 22 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317254>。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7 日。

¹⁶³ 日本民主黨眾議員談新政府對華政策，**人民網**，2009 年 9 月 5 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999243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7 日。

¹⁶⁴ 同前註。

¹⁶⁵ 林曉光，日本民主黨政府的對中政策，**鉅亨網新聞中心**，2015 年 10 月 22 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317254>。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7 日。

與自民黨不同，民主黨在執政訴求上特別強調「政治主導」。所謂的政治主導，指的是排斥自民黨執政時的「族議員」、「官僚」、「利益團體」的鐵三角關係，也反對政官關係中的「官僚主導」的決策模式。民主黨主張政策決定的核心應該由政治家來承擔，而非官僚。由於過去的決策機制的責任歸屬相當模糊，因此民主黨決定改變政府和執政黨的二元權力體制，在決策方面由內閣統一決定。

166

有學者指出，為了貫徹政治主導的理念，民主黨的鳩山政權採用了兩個方式。第一、採用「政務三役會議」。外務省和其他省廳同樣地也借用由政治家擔任的大臣、兩位副大臣、三位政務官構成的「政務三役會議」所作成的決策。事實上，在「政務三役會議」中事務次官等官僚人士的勢力已被排除，而官僚必須得到「政務三役會議」的政策指示後再行動。第二、在對外發言方面，取消過去每週定期進行的事務次官主持的記者會。¹⁶⁷「政務三役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於體現決策是由選舉出身的國會議員決定，而非由未經過選舉洗禮的官僚決定的精神。而對外發言的措施方面，則是希望由政務官負責發表對外交事件的看法，而非由官僚進行主導。¹⁶⁸故此，在對中政策的制定上，民主黨內的成員對中日關係的看法比起自民黨時期，佔有更重要的地位。

然而，鳩山政權過度強調政治主導，排除官僚意見的情況之下，面臨了極大的失敗。如在普天間基地遷移的問題上，不但未能達成原先的目標，甚至還使日美關係更加惡化。故此，鳩山政權後的菅政權對政官關係進行了些許的調整。例如恢復事務次官會議，政策決定也逐漸與官僚配合。也可以說，菅政權的做法有回到自民黨執政時期的傾向，爾後的野田政權亦是如此。然而無論是政治主導或是政官同時主導，於民主黨執政時期，黨主席的意念在對外政策上皆佔有一定的

¹⁶⁶ 鳩山由紀夫，(2009)。政・官の在り方，**內閣官房**，2009年9月16日，<https://www.cas.go.jp/jp/siryou/pdf/090918siryou.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3月1日。

¹⁶⁷ 石原忠浩，(2012)。「政治主導」の對外政策？——日本民主黨執政下の日「中」關係。**展望與探索**，第10卷第7期，頁42-58。

¹⁶⁸ 同前註。

比重。日本雖然不像中國有激烈的黨內競爭，然而民主黨內部的不協調與鬥爭也稍微影響了其執政。此外，釣魚台事件後的日本國內輿論以及國內社會環境對對外政策所造成的影響也不容小覷。

第三節 個人或決策層次

在本段落中，將分析此時期中日兩國領導人個人對彼此的看法、其對中日關係的期望，以及其個人的領導風格及偏好，藉此觀察兩國領導人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影響力。在中國方面，將以胡錦濤、溫家寶所領導的「胡溫體制」所倡導的外交理念——「和諧世界」為主軸進行探討；而在日本方面，則將以分析鳩山由紀夫、菅直人及野田佳彥三位首相為主。但由於在民主黨執政初期，幹事長小澤一郎在黨內亦握有相當的權力，因此在本段落中也將把其加入探討。

壹、胡錦濤政權的政治外交理念

以胡錦濤為首的第四代領導集團所提出的「和諧世界」外交理念，是此時期指導中國對外工作和處理國際關係的新方針。其首度提出是在 2005 年 4 月所舉辦的雅加達亞非峰會上，胡錦濤指出：「文化上，我們亞非國家要成為相互借鑒、取長補短的合作夥伴。（中略）尊重各國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的自主權，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¹⁶⁹

同年 9 月，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 60 週年高峰會議上的演說再次提到和諧世界的構想，其表示：「應該以平等開放的精神，維護文明的多樣性，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協力構建各種文明兼容並蓄的和諧世界。」¹⁷⁰隔年 10 月，中國在中共中央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的內容將國內建設和諧社會和國際上建設和諧世界的發展目標

¹⁶⁹ 胡錦濤在亞非峰會上的講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fmprc.gov.cn/123/wjdt/zyjh/t192875.htm>。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3 日。

¹⁷⁰ 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 60 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全文)，人民網，2005 年 9 月 16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4/3699888.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3 日。

連結，把國際上「和諧」作為國內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¹⁷¹該決定定調了日後中國的外交走向，此後其也不斷地在國際場合上宣傳和諧世界的外交理念。

和諧世界的提出背景在於國際上因中國崛起而瀰漫的「中國威脅論」。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圍繞著消弭「中國威脅論」的主軸而進行，尤其是當亞洲國家也將中國視為威脅時，一起圍堵中國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為了回應國際上的質疑，中國對國際關係的相關論述開始由「和平崛起」改為「和平發展」，最後強調「和諧世界」的主軸。和平指的是東西兩大陣營的和平，發展則意指南方國家應獲得發展。中國一直以來自詡為第三世界國家，不參與 G8 及 G2 等相關集團，並試圖以「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和諧世界」做為反駁轉力轉移理論以及大國崛起的回應。¹⁷²筆者認為，中日間的戰略互惠關係便是中國在這樣的戰略思想指導下的產物。此外，中國也與其他國家與集團建立了不同類型的新型合作關係或建設性夥伴關係，用以推動和諧世界在外交上的實踐。

此外，胡錦濤的外交路線主要亦是師承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出發」的觀點，主張融入經濟全球化，但在國內社會問題尚未完全得到解決且工業底子薄弱等情況下，在崛起過程中不與美國爭霸。而其雖然延續了鄧小平與江澤民時其所提出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但面對國際關係的變遷，其也做出了些許的調整與變化。即採取多邊外交的策略，並著重於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周邊環境是中國要維持穩定的國際環境中最重要的一環，睦鄰外交則是達到穩定周邊環境的重要工作，日本也是其中一個重點國家。¹⁷³

而胡錦濤本人對日本的期待除了前述於簽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時所表示的：「確認兩國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相互支持對方和平發展」以外，

¹⁷¹ 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2006年10月11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72347/634799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19年3月13日。

¹⁷² 李思嫻，(2015)。中國威脅論下的「和平崛起」論述。**人文社會學報**，第11卷第1期，頁63-80。

¹⁷³ 許志嘉，(2007)。中國新睦鄰外交政策：戰略意涵與作為。**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卷第3期，頁43-80。

其在公開場合的演講中也指出：「中國和日本都是亞洲和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在中日兩國 2000 多年的交往史上，中日友好是主流。」並強調引發戰爭的只是一小部分的軍國主義分子，顯示其對日本較為友善的態度，也透露其對中日關係長期友好的期望，並希望能於未來與日本一同在亞洲發揮影響力。¹⁷⁴而在發生釣魚台主權爭議之時，中國政府起初雖然堅持自身主權不可退讓的立場，但尚未有過激的反彈，而是到了八月中旬香港的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台並遭到日本當局逮捕後才開始加劇，於釣魚台附近的中國公船也開始增加。根據國分良成，這是因為中國於 2012 年夏天舉辦北戴河會議後黨內權力再次從胡錦濤派轉移至江澤民派之故，成為中國對日轉趨強硬的關鍵。¹⁷⁵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胡錦濤時期的對外政策主要可以歸納出以下兩個重點。第一、胡錦濤除了在中國政府內屬於溫和派以外，其亦是一個務實主義者。在面對與日本間有許多難解的問題如：歷史認識問題、釣魚台主權問題之時，其個人仍保持較為理性的態度。第二、其仍以國內發展為主軸，為了使國內發展更為順遂，因此需要較為和平的國際環境。即筆者認為「和諧世界」表面上雖是外交方針，但實際上卻把「內政改善」放在更重要位置。加上中國於此時期也開始擴大自己在國際上的發言權與存在感，不僅於 2008 年舉辦了北京奧運、於 2010 年又舉辦了上海世界博覽會，大大的增加了國際影響力，因此其也不願輕易地與他國發生衝突。除此之外，此時的中國亦深知自身尚未有挑戰美國的能力，因此雖然於 2010 年起其對外交勢有轉變的跡象，但整體而言仍試圖維持鄧小平所遺留的「韜光養晦」的精神。

貳、民主黨政權的政治外交理念

¹⁷⁴ 胡錦濤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60 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2005 年 9 月 4 日，http://www.gov.cn/lhdh/2005-09/04/content_28944.htm。最後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18 日。

¹⁷⁵ 國分良成，(2017)。《中國政治から見た日中關係》。東京：岩波書店。頁 222-223。

一、鳩山由紀夫

鳩山由紀夫於 2009 年 9 月上任，其執政期間的外交主張為「友愛外交」。友愛外交指的是即便是與日本的價值觀相衝突的國家也要相互尊重，共生共榮。並創立「東亞共同體」，同時也以實現「亞洲共同貨幣」為目標。¹⁷⁶鳩山政權執政之時，全球正因世界金融危機的餘波陷入混亂，在此同時中國也逐漸在國際上展露頭角，正是日本推動東亞共同體的絕佳時機。然而，中國雖然歡迎這樣的構想，鳩山政權的東亞共同體卻沒有具體化的構想，淪為紙上談兵。再加上中日兩國對東亞共同體應納入的成員國有所歧見，中國向來倡導較易掌握主導權的「東協加三」框架，日本則欲納入印度、澳洲、紐西蘭等國來進行牽制，防止中國擁有過大的主導權。再加上美國亦對亞洲區域共同體有所警戒，在各方的意見分歧之下，友愛外交的推動更是雪上加霜。¹⁷⁷

雖然友愛外交及東亞共同體的實現並沒有顯著的成果，但鳩山政權對中友善的態度確實為此時期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帶來加分的效果。如後所述，於鳩山政權時不僅實現了中國副主席習近平與天皇會面一事，前述小澤一郎幹事長也率領了 600 多名國會議員前往中國與胡錦濤進行會談。然而，鳩山政權在推動東亞共同體的同時，日美關係卻因沖繩普天間基地遷移問題惡化。最後，日本不但在中日關係上沒能拿出具體成果，同時也損及了日美關係，導致鳩山政權在執政不到一年的時間便下台。

二、菅直人

不同於鳩山政權，菅政權上台後試圖修復惡化的日美關係。由於鳩山政權時因沖繩普天間基地遷移問題導致民眾對日本政府的執政能力喪失信心，故此菅政權便以修復日美關係為重要的外交目標之一。菅直人在就任首相後在國會發表的

¹⁷⁶ 板垣英憲，(2009)。友愛革命—鳩山由紀夫の素顔。東京：共栄書房。頁 20-37。

¹⁷⁷ 鳩山友愛外交 恐有行無市，大紀元，2009 年 9 月 24 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9/9/24/n2666670.htm>。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演說中表示：「要切實深化日美同盟的關係，日美同盟不僅是日本安全上的保障，也是支持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的國際公共財。」同時針對鳩山政權欲積極推動的東亞共同體，其表示：「日本將與亞洲為中心的近鄰各國，加強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關係，未來再進一步去構想東亞共同體。」¹⁷⁸這顯示出菅政權在執政之初對東亞共同體亦沒有具體的構想，但在外交上仍重視以中國為首的亞洲近鄰關係。

從菅政權與中國政府的互動可以看出，其執政之初仍是希望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如菅直人當選首相後，便致電予中國總理溫家寶，表示欲「同中國加深戰略互惠關係」，並希望能實現早日訪中。他也在日本參議院明確表示：「因甲級戰犯被合祀在靖國神社，所以首相和閣僚正式參拜有問題，在擔任首相期間不打算參拜。」此一發言也獲得了向來相當介意歷史問題的中國的讚賞。2010年6月27日，菅直人也在加拿大的G20峰會上與胡錦濤主席會面，胡錦濤稱菅直人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並表示於同年11月將訪日，出席在橫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菅直人也表示：「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希望加強互利雙贏關係。」¹⁷⁹從這種種的發言可以發現，雖然在安全保障領域上如何落實中日合作有所考驗，菅政權的外交理念中仍是有將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納入考量的。然而，爾後於2010年9月發生了釣魚台衝撞事件後，日本將領土爭端與安全問題聯繫起來，日本國內的「中國威脅論」也水漲船高。菅政權也借此調整安全政策，不僅加強日美同盟，也推出新防衛大綱和中期軍事力量發展計劃，將中國作為防範對象之一。¹⁸⁰這使中日兩國的信賴關係跌落，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落實也雪上加霜。

¹⁷⁸ 第174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10年6月11日，<http://warp.ndl.go.jp/info:ndljp/pid/11236451/www.kantei.go.jp/jp/kan/statement/201006/11syosi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3月19日。

¹⁷⁹ 劉江永，(2010)。菅直人外交政策或將被迫「右擺」，人民網，2010年8月6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236742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3月19日。

¹⁸⁰ 孫承，(2011)。菅直人內閣的對外政策與中日關係。《國際問題研究》，2011年第2期，頁53-59。

三、野田佳彥

野田政權亦相當重視中日關係，其在就任首相後在國會發表的演說中表示：「在與中國即將邁入國交正常化 40 週年之際，希望能與中國持續合作，加強戰略互惠關係。」¹⁸¹而野田於 2012 年的施政方針演說中也表示：「至今，中日兩國領導人間以無數次的確認深化『戰略互惠關係』到方針。往後則會進入使這些內容更加具體化，並加強區域安定的合作的階段。在建交 40 週年之際，從人員交流與促進觀光為首，中日兩國將透過各項層面上的對話與交流深化互惠關係。」¹⁸²從野田首相的發言中不難看出，其仍欲維持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框架。

此外，野田首相也於 2011 年年底訪中。透過本次訪中，日本提出了六點倡議。分別為：（一）增進政治互信。（二）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相互間合作之道路。（三）以東日本大地震為契機推進的中日合作。（四）深化互惠的經濟關係。（五）增進兩國國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六）強化在地區和全球性課題上的對話與合作。此六點倡議不僅反映出了野田政權欲持續落實戰略互惠關係的意念，同時也反映出了日本政府的對中戰略意圖。¹⁸³

然而，其相較於前任的菅政權，更加強化了「深化美日同盟」的方針。同時，野田政權強調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出發點是為經濟利益，與中國間的合作關係相當脆弱。在安全保障領域上，野田的主張相較於鳩山政權與菅政權，其鷹派的色彩更加明顯。其不僅主張日本有權行使集體自衛權，在領土問題上對中態度亦相當強硬，定認為「甲級戰犯並非戰爭罪人」。其還積極主張日本應該制定《安全保障基本法》和《緊急事態法》，顯示其在對外方面以及軍事方面是一個「強硬

¹⁸¹ 第一百七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野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11 年 9 月 13 日，<http://warp.ndl.go.jp/info:ndljp/pid/11236451/www.kantei.go.jp/jp/noda/statement2/20110913syosi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¹⁸² 第一百八十回国会における野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12 年 1 月 24 日，<http://warp.ndl.go.jp/info:ndljp/pid/11236451/www.kantei.go.jp/jp/noda/statement2/20120124siseihousi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¹⁸³ 石原忠浩，(2012)。日本首相也田佳燕訪中の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第 81 期，頁 37-45。

派」人物。¹⁸⁴故此，在中日合作的利基點薄弱的情況之下，野田政權後期發生了釣魚台國有化事件之後，中日兩國間的緊張關係非但沒有得到緩解，反而在 2012 年後半進入了冷凍狀態，也對中日互惠關係的落實產生阻礙。

四、小澤一郎

於民主黨執政初期，小澤一郎曾任民主黨幹事長，其權力相當龐大。在鳩山政權執政時期，其不僅擁有政策決定權，同時也擔任民主黨內的人事管理，在黨內的政策決定上有一定的影響力。雖然小澤一郎並非日本首相，但根據民調結果，有高達七成的日本民眾認為小澤一郎才是民主黨內閣的實質掌權者。¹⁸⁵

小澤一郎被中國視為相當重要的「親中派」人物，如後所述，小澤一郎於 2009 年年底率領了總人數 600 人以上，其中包含 143 名國會議員前往中國與胡錦濤進行會談，積極展現其對中關係的正面態度。¹⁸⁶小澤在政治上師承實現中日建交的田中角榮，在此同時，小澤也是中日民間交流計畫「長城計畫」的負責人之一，其與中國之間擁有相當緊密的個人關係。

話雖如此，小澤也並非不是一味的親中。根據中國環球時報的分析，其認為小澤雖然主張對中友好，其同時也認為日本應走「大國路線」，且其同時也是在保護日本國家利益上相當強硬的政治家。其對中國友善的態度僅是因為其認知到日本就算欲與中國切斷關係，也無法完全斷絕之故。如在民主黨上台執政之前，小澤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會面時曾表示：「我認為中國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此後中國的發展非常令人擔心...（中略）此後對日本、美國、世界各國

¹⁸⁴ 親美派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台灣 e 新聞**，2011 年 8 月 29 日，<https://www.taiwanenews.com/doc/20110829103.php>。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¹⁸⁵ ドキュメント鳩山内閣，**JJJC.COM**，2009 年 10 月 31 日，https://www.jiji.com/jc/v2?id=20091031hatoyama_cabinet_vol2_07。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8 日。

¹⁸⁶ 石原忠浩，民主黨政權是親中路線？：從小澤訪中團與習近平訪日事件談起，**臺灣新社會智庫**，2010 年 2 月 23 日，<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政策報告/兩岸國際/2226-民主黨政權是親中路線？：從小澤訪中團與習近平訪日事件談起>。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而言最大的問題想必就是中國問題了吧！」¹⁸⁷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小澤一郎雖然看似親中，其追求的是對等的日中、日美關係，且對中友善是立基於日本的國家利益，並非無條件的親中。

第四節 前途艱難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壹、增進政治互信

胡錦濤/民主黨時期在增進政治互信的層面上於執政之初可以算是相當成功，如於起初的鳩山政權之時，於短短一年間中日兩國間便舉行了五次的首腦會談。此外，於鳩山政權時期最令人矚目的中日高層往來莫過於 2009 年 12 月 10 日至 13 日，民主黨幹事長小澤一郎率領了 600 多人的訪問團前往中國，其中包含了 143 位現任國會議員一事。雖然本次交流有出現傾向於內政及選舉等考量的「黨利黨略」的本位主義之感，本次交流凸顯了民主黨政府相當重視中日關係的態度仍為不可否認的事實。

此外，同年底中國副主席習近平訪日與天皇見面一事也引起日本國內一陣譁然。日本天皇與外國貴賓的見面雖然是屬於公務活動的一部分，然而本次習近平與天皇見面卻打破了「由於需要事先的充分準備與安排，外國人士與天皇見面時，需 30 天前向宮內廳提出申請」的慣例。日本外務省向宮內廳提出申請的時間是 11 月 26 日，其因超過了 30 天的期限而遭到拒絕。然而 12 月 7 日平野官房長官以「日中關係的重要性」的理由再度照會宮內廳，在未獲得正面回應後，12 月 10 日平野官房長官以「鳩山首相的指示」為由再次向宮內廳提出申請，終於獲得宮

¹⁸⁷ 城山英巳，(2010)。単なる親中派にあらず 小沢一郎「中国観」の本音，WEDGE Infinity，2010 年 2 月 3 日，<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760>。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8 日。

內廳的首肯。¹⁸⁸民主黨政府不惜破壞國內規範也欲讓習近平與天皇見面一事，再次凸顯了民主黨有多麼重視中日的高層交流。

然而在發生了前述的第一次釣魚台糾紛後，中日兩國間的首腦及交流在一瞬間跌至谷底。於菅政權時期，中日兩國之間僅進行了兩次首腦會談。一次是於菅政權上台之初，另一次則是日本在發生 311 東日本大地震後。311 東日本大地震也可以說是使中日關係產生轉變的重點事件之一。在第一次釣魚台事件糾紛後，中日關係雖然暫時停擺，然而在 311 東日本大地震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總理溫家寶分別致電日本天皇明仁與時任首相菅直人表達慰問之意，胡錦濤甚至於 3 月 18 日赴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表達慰問，這是胡錦濤自 2003 年就任以來首次赴日本大使館。¹⁸⁹

而於野田政權之時，中日兩國也進行了兩次的首腦會談。¹⁹⁰故此可以發現，此時期與後述的習近平/自民黨時期相比，中日兩國的高層互動仍算頻繁。除了每年中日兩國領導人的互訪有成功落實以外，中日兩國在日中韓高峰會、APEC 國際會議等國際場域上也都有一定的對話及意見交換紀錄。於 2012 年 9 月發生釣魚台國有化事件後，同年 12 月底中日兩國間仍有高層的對話。雖說這其中也有中日建交 40 週年的因素，但整體而言可以說是中日兩國的高層皆有共識，不希望因為釣魚台事件而使雙邊關係的發展停擺。綜上所述，即便中日兩國在東海問題上有不小的糾紛，於此時期中日兩國在增進政治互信的層面上仍有取得一定的成果。

貳、促進人民交流，增進人民友好感情

¹⁸⁸ 石原忠浩，民主黨政權是親中路線？：從小澤訪中團與習近平訪日事件談起，**臺灣新社會智庫**，2010 年 2 月 23 日，<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政策報告/兩岸國際/2226-民主黨政權是親中路線？：從小澤訪中團與習近平訪日事件談起>。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¹⁸⁹ 日媒：日本大地震為改善中日關係提供契機，**中國新聞評論網**，2011 年 3 月 19 日，<http://hk.crntt.com/doc/1016/3/3/10163333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633333>。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¹⁹⁰ 中華人民共和國 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日本外務省**，2019 年 8 月 28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於此時期，中日兩國在此層面上亦算是有成功落實。如在 311 東日本大地震後，基於人道因素，中國暫時放下釣魚台相關的紛爭，並積極對日本展開援助。中日兩國領導人也在復興賑災地的觀光與各項災後支援上達成協議，如：促進中日友好城市的交流、招待賑災地 500 名學生訪中促進青少年交流、促進中國觀光客的訪日等等。¹⁹¹若從數字上觀察，可以發現 2009 年赴日的中國留學生共有 79082 人，於 2012 年則有 86324 人。¹⁹²而於 2009 年赴中的日本留學生共有 2269 人，此數字到了 2012 年則有 4414 人。¹⁹³雖然這些數字在中間的三四年間有些許的起伏，然而整體而言兩國的留學生人數是呈現正成長的。而中國人赴日旅行的人數也從 2009 年的 100 萬人次上升至 2012 年的 142 萬人次。赴中的日本觀光人次於 2009 年是 330 萬人，到了 2012 年則為 351 萬人。¹⁹⁴整體而言，中日兩國在人員交流上相當頻繁，顯示在此時期中日兩國間的人員交流並沒有受到上述國家利益的衝突的影響。

參、加強互利合作

在加強互利合作這方面總共可以分為兩個層面進行探討，一為兩國的經貿交流，另一則為共同解決東海問題上的合作。就前者而言，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中有明定：「中日兩國應從戰略高度有效運用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在此時期，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僅於 2010 年 8 月召開了一次，爾後即因釣魚台紛爭加上中日 GDP 逆轉，兩國關係進入低潮而暫停舉行，並於 2018 年 4 月才再次召開。然在

¹⁹¹ 復興支援・觀光促進に関する日中協力，日本外務省，2011 年 5 月 2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1/pdfs/jc_fs.pdf。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¹⁹² 外国人留学生在籍状況調査，独立行政法人 日本学生支援機構，2009 年 12 月、2013 年 2 月，https://www.jasso.go.jp/about/statistics/intl_student_e/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¹⁹³ 協定等に基づく日本人学生留学状況調査，独立行政法人 日本学生支援機構，2011 年 4 月、2014 年 4 月，https://www.jasso.go.jp/about/statistics/intl_student_s/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¹⁹⁴ 月別・年別統計データ(訪日外国人・出国日本人)，日本政府観光局，2020 年 1 月，https://www.jnto.go.jp/jpn/statistics/visitor_trends/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本次對話中，中日兩國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雙方總共簽訂了七項合作文件，文件內容不僅包含了經貿合作，兩國還就環境保護、食品安全等議題上展開了廣泛的磋商。此外，兩國也就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經濟政策和金融政策等層面上交換了意見，定調了中日兩國的經貿關係。¹⁹⁵

然而在東海問題上，在此時期兩國不僅沒有加強對話與合作，甚至還因此使雙邊關係更加惡化。如前所述，於 2010 年與 2012 年發生了兩次釣魚台主權糾紛，這兩次事件不僅為兩國的信賴關係造成了極大的引響，甚至也對兩國的民間關係帶來了不小的衝擊。如前所述，民主黨對釣魚台的主權主張不亞於自民黨，兩次釣魚台事件也重創中日兩國間的民間感情。

中日兩國僅於 2012 年 5 月時展開了一次關於海洋問題的高層對話，然而本次對話中日兩國僅進行了意見交換，沒有其他的成果。話雖如此，能在中日關係跌落谷底之時有這樣的對話意見交換平台，已經可以說是有一定的進步了。然而綜上所述，在此時期中日兩國於東海問題的解決上沒有任何顯著的成果。¹⁹⁶

肆、共同致力於亞太地區的發展

在此面向上，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中曾提及中日兩國應以六方會談為基礎，共同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另外兩國也應致力促進整個東亞區域的合作。因此在此段落將分為兩個部分探討，分別為北韓核武問題及東亞區域合作。

在北韓核武問題上，中日兩國的對話平台主要有六方會談以及中日韓高峰會。然而自 2009 年 5 月北韓進行了第二次核試驗，聯合國對北韓進行了嚴厲的制裁後，北韓便宣布退出六方會談。第六輪的六方會談於 2007 年年底召開後就未再次舉行，再加上北韓正式宣布退出，六方會談更顯得名存實亡。於 2009 年的中

¹⁹⁵ 第三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簽署七項合作文件，[中國證券網](http://www.cnstock.com/index/gdxw/201008/814081.htm)，2010 年 8 月 28 日，<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311221530/http://cnstock.xinhuanet.com/index/gdxw/201008/814081.htm>。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 日。

¹⁹⁶ 日中高級事務レベル海洋協議第 1 回會議（概要），[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jc_kk_1205.html)，2012 年 5 月 16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jc_kk_1205.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30 日。

日韓高峰會中，中日兩國針對北韓議題，除了希望能盡速恢復六方會談的框架以外並沒有更進一步的共識。於 2011 年的中日韓高峰會的會談中，雖然以「東日本大震災」為主軸進行合作之協商，但也針對北韓所提出的「鈾濃縮計畫」表達關切，重申三國達成《9·19 共同聲明》之目標。《9·19 共同聲明》是 2005 年六方會談的成果，其重點目標即為以和平方式可核查地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然而，在此時期中國對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態度並不是太積極。如在 2012 年所簽署的《提升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中並未言及關於北韓核武問題一事。這是因為在中國的要求之下，日本與韓國接受了此項主張之故。但在本次高峰會中亦針對當年 4 月 13 日北韓試射導彈一事進行討論，三國同意面對北韓的挑釁行為進行更緊密的合作，並要求北韓「自制」其行為。¹⁹⁷又如於 2010 年發生「天安艦事件」後，使兩韓的關係更為惡化。然而針對本次事件，日本與南韓雖然一同站在譴責北韓之立場，然而中國卻堅持「沒有確證能證實此事件為北韓所為」，而站在中立之立場。事後，中國也拒絕了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對北韓的制裁。¹⁹⁸從這種種的跡象可以看出，此時期中國在各方面對北韓並不願採取過於強硬的態度。

而在東亞區域合作上，主要可以舉出鳩山政權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其在上台前便在 VOICE 雜誌中公開發表了《我的政治哲學》一文，並提出了建構「東亞共同體」的構想。其概念雖然並未排斥美國的參與，卻指出了日本最重要的合作夥伴為中國。此外，於 2009 年 10 月 7 日，日本外務大臣岡田克也也在外國記者協會演說時，首次表明東亞共同體的成員包括：日本、中國、韓國、東協、印度、澳洲以及紐西蘭。其中並未言及美國，因此引發了美國的不滿。面對民主黨的表態，中國甚感歡迎，因為這不僅意味著日美同盟的弱化，也具體反映了中國在東

¹⁹⁷ 第 5 回日中韓サミット 三国間の包括的な協力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強化に関する共同宣言，日本外務省，2012 年 5 月 1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2/joint_declaration_jp.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

¹⁹⁸ 劉德海(2010)，近期東北亞安全局勢中的南韓角色。《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頁 1-6。

亞地區的大國地位。¹⁹⁹然而，此一構想雖然看似為中日關係帶來了轉變的契機，實際上卻沒有顯著的成效。且在日後的釣魚台紛爭發生後，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也隨之泡沫化，成為紙上談兵。整體而言，於此時期在加強互利合作這方面，中日兩國並沒有一定的成果。

伍、共同應對全球性課題

最後則是共同應對全球性課題的部分，面對氣候變遷，中日兩國於戰略互惠關係中確認在能源安全、環境保護、貧困、傳染病等全球性問題展開合作。礙於篇幅限制，在本段落將以環境保護議題為例，探討此時期中日兩國在這方面的實踐。

在環境保護方面，中國與日本雖然對環境保護有一定的共識，卻在實際執行的層面有些許的矛盾。於 2009 年 12 月所召開的哥本哈根會議中，代表開發中國家的中國與已開發國家的日本間有意見上的衝突。雖然日本在峰會前宣佈提供 50 億美元資金援助發展中國家，但前提是峰會必須能達成政治協定。日本希望哥本哈根協議中限制主要發展中國家減排的條款能具有法律效力，不過中國對此堅決反對。而中國在會議的最後一天作出讓步，同意提高二氧化碳減排行動的透明度，也表示：「已開發國家減排是應當履行的國際義務，而中國身為開發中國家，將採自主減排措施。」²⁰⁰中國雖然展現出了對抗全球暖化的決心，其作法上與日本、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的理想有所差距。

雖然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的成果並不顯著，然而中國與日本在環境保護的其他層面上仍有些許的成果。如於 2009 年召開的中日韓高峰會中，三國一同發表了《關於永續開發的共同聲明》。該聲明確立了三國在農業、能源、林業保護等層面上的合作，此外也強化了將於 2010 年召開的三國環保署長會議中所制定的共

¹⁹⁹ 李世暉，(2016)。鳩山、菅直人、野田：「東亞共同體構想」。載於李世暉、吳明上、楊鈞池、廖舜右、蔡東杰(編)，**當代日本外交**(頁 79-90)。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²⁰⁰ 吳漢，(2010)，從哥本哈根會議看中國應對氣候變化談判的策略。**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1 期，頁 23-28。

同行動計畫的細項，使該計畫更有利於執行。²⁰¹於同會議中，2011 年三國簽訂了《關於透過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推動永續發展成長的合作》，明定了於再生能源領域發展上的合作。²⁰²2012 年的中日韓高峰會中也再次強調在黃沙問題及大氣污染上的合作。²⁰³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雖然中日兩國在環境保護上的合作有所共識，然若涉及龐大的國家利益問題之時，中國仍會以自身的國家利益為優先，使合作產生一定的阻礙。

第五節 小結

根據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在此時期一開始雖然中日兩國的關係在日本民主黨的主導之下看似有良好的進展，且兩國在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推行上有一定的共識，然而兩國在東海問題上的國家利益產生衝突，不僅使民間關係惡化，也對政府高層的交流造成一定的傷害。在民主黨的領導之下，政府間的對話與交流並沒有完全中斷，中日關係雖然進入了低潮，與後述的習近平/自民黨時期相較之下，兩國的政府關係並沒有降至最低點。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兩次釣魚台事件的衝突為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執行所帶來的影響相當龐大，不僅凸顯了中日兩國在海洋利益上的衝突，也使此時期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沒有徹底的被落實。

²⁰¹ 持続可能な開発に関する共同声明（仮訳），日本外務省，2009 年 10 月 10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jck/jizoku_kai_ka.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8 日。

²⁰² 第 4 回日中韓サミット 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及びエネルギー効率の推進による持続可能な成長に向けた協力，日本外務省，2011 年 5 月 2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1/energy.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8 日。

²⁰³ 第 5 回日中韓サミット 三国間の包括的な協力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強化に関する共同宣言，日本外務省，2012 年 5 月 1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2/joint_declaration_jp.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8 日。

第五章 2013 年至 2018 年：習近平/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 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本章節將仿效前一章節，第一節將就此時期的整體國際環境及情勢進行探討。而在第二節及第三節中則將透過層次分析法的研究途徑，分述在此時期影響中日兩國政策的國內因素及領導者個人因素。於第四節則將檢視在此時期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所規範的五大領域的相關成果，用以評價此時期的中日關係。最後則是小結。

第一節 國際體系層次

如前所述，由於美日同盟之故，美國常被指為影響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之一。此時期亦為如此，安倍政權的外交政策在某種層面上仍受到美國的亞洲政策所影響。而此部分可分為兩個時期探討，一為 2013 年至 2016 年底民主黨的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執政時期，另一則為 2016 年底至今的共和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總統執政時期。此外，亞洲整體的國際局勢也將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產生影響。在東亞的國際局勢方面，由於此時期中國已在國際舞台上崛起，故在此段落中的國際局勢將聚焦於東南亞國協的影響力以及北韓的核武問題所帶來的影響。

壹、美國的亞洲政策

一、歐巴馬執政時期：再平衡(Rebalancing)戰略

在歐巴馬政權時期，美國對亞洲的政策為「再平衡」戰略。再平衡戰略一詞於 2011 年 10 月被提出，其源自於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所發表的「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再平衡戰略所強調的是美國將原有的外交政策焦點從伊朗、阿富汗等中東地區轉移至亞洲太平洋地區，並擴大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外交及戰略等層面的投資。²⁰⁴而歐巴馬本人也於同年 11 月在澳

²⁰⁴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October 11,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洲國會演講時也強調即便美國減少國貿預算，也不會減少在亞洲的軍事勢力，亦強調亞洲在經濟層面上對美國的重要性。²⁰⁵有學者指出，在 2012 年美國總統進行任期屆滿的改選，歐巴馬連任並進行人事調整後再平衡戰略的意涵也開始有了轉變。除了繼續加強美國在亞洲的同盟以外，再平衡戰略的重點在第二期歐巴馬政權由原先強調的軍事層面轉移至了經濟層面，並將中國與其他新興國家區別開來，強調與中國建立安定並具生產力的關係。²⁰⁶

面對中國在南海的軍事進出，美國在此時採取了將中國帶入既存的國際規範與秩序中的「干預」策略，試圖規範中國的軍事行動。簡言之，第二期歐巴馬政權的再平衡戰略有兩個核心：第一、面對中國的抬頭，試圖透過干預政策來維持亞洲秩序。第二、在經濟層面上，試圖透過環太平洋經貿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下稱：TPP)建立區域的通商秩序。²⁰⁷而到了歐巴馬政權的後期，再平衡戰略又出現了些許的變化。而於歐巴馬政權後期由於美國政策資源的缺乏與區域安保秩序的相對不穩定，其再平衡戰略有加強的趨勢。再加上由於美國將其軍事資源集中投資於高風險的危機管理中，因此開始要求區域各國增加相對的責任分擔，日本也不例外。而再平衡策略中的「中國因素」在歐巴馬政權後期也有增強的趨勢，因歐巴馬在強調國家航海自由與法律支配原則的重要性的過程中，或多或少源於意識到對中國日益增強的存在感及行動。即便其強調再平衡策略不針對任何國家，然而其對中國的「戰略對沖(Hedging)」卻或多或少從再平衡戰略中被呈現出來。²⁰⁸

自從美國提出 TPP 後，日本政府一直因顧慮部分國內產業的反彈聲浪而遲遲不願加入。然而自 2012 年年底安倍上台後，其便於 2013 年 7 月底宣布加入由

²⁰⁵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November 17, 201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²⁰⁶ David J. Berteau and Michael J. Green and Zack Cooper(2014). *Assessing the Asia-Pacific Rebalanc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pp.3-8.

²⁰⁷ 小檜山智之，(2018)。オバマ政権のリバランス政策—「未完」に終わったアジア太平洋戦略—。立法と調査，No.403，頁 109-122。

²⁰⁸ 切通亮，(2017)。アジア太平洋リバランスの再考—オバマ政権後期における安全保障政策を中心に—。防衛研究所紀要，第 20 卷第 1 號，頁 93-114。

美國主導的 TPP，此便為其響應美國的再平衡戰略之舉。而其也在各式場合中如：2014 年的日美首腦會談²⁰⁹、2014 年日美兩首腦於澳洲的會談等表達對再平衡戰略表達支持。²¹⁰在安全保障方面，一向強調美日同盟的安倍政權亦在再平衡戰略的背景下有了不少作為。除了在前述的 2014 年首腦會談中美國公開宣布釣魚台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以外，2013 年，美日兩國也開始以海洋戰略為核心重新修訂「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並於 2015 年公布了新版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增強兩國的防衛合作。另外，由於中國與日本於海上發生了數次雷達照射事件而引發紛爭，為抑止中國的行為，加上為了因應釣魚台周邊海域的緊急事態，2013 年美日兩國在「共同作戰計畫」及「美日相互合作計畫」達成了協議。同年年底，兩國也於沖繩周邊海域實施了大規模的海上軍事演習，展現了對中國海上行動的牽制。²¹¹

在東海問題上，雖然不能明言安倍政權正是因美國所主導的再平衡戰略而對中牽制，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再平衡戰略的背景之下，日本在東海問題上面對中國時更加的站得住腳並變得更加強勢的事實。再加上美國總統公開宣布釣魚台屬於《美日安保條約》所訂定的保障範圍，更是為日本在此一問題上打了一劑強心針。故此，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中所提及的「共同努力，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此一項目的執行也在這樣的情況下顯得更為困難。

二、川普執政時期：「美國優先」政策、「印太戰略」

與歐巴馬政權不同，川普政權截至 2018 年底仍尚未有明確的亞洲政策。其外交政策奉行「美國優先」精神，以美國本國利益為優先，其外交路線與歐巴馬政權的再平衡戰略有所差異。因此，川普政權一上台後便宣布退出 TPP，為加入

²⁰⁹ 日米首脳会談(概要)，日本外務省，2014 年 4 月 24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0755.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²¹⁰ 日米首脳会談，日本外務省，2014 年 11 月 16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page3_001017.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²¹¹ 林賢參，(2014)。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閣の対中ヘッジング戦略。問題と研究，第 43 卷第 2 號，頁 47-50。

TPP 的亞洲各國帶來極大的震撼。而其亦在《2017 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不僅確實地指出美國優先的概念，也指出世界上敵對美國及其同盟的三大勢力，包括：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的中國及俄羅斯，流氓國家(Rogue state)的伊朗及北韓，以及跨國恐怖集團 (Transnational threat organization)。在同一報告中，與歐巴馬政權使用「亞太」(Asia-Pacific)一詞表達亞洲地區不同，川普使用了「印太」(Indo-Pacific)一詞，似乎將以「印太戰略」作為亞洲政策的主軸。²¹²但其印太戰略至今似乎仍相當模糊，且其在 2017 年年底訪問亞洲五國時並未出席重要的東亞峰會，使各國對川普政權的亞洲政策存疑，其對亞洲的重視度明顯低於前一政權時期。

此外，川普政權為保障本國的經濟利益並消解貿易逆差，自 2018 年 3 月起，川普簽署總統備忘錄後便並宣佈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徵收關稅，涉稅的中國商品規模可達 600 億美元，中美貿易戰正式開始。²¹³

美國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也表示：「中國的行為加劇了美國的貿易逆差，去年與中國的貿易逆差為 3750 億美元，佔世界貿易逆差的近一半……(中略)中國政府現在要求許多美國公司提交商業秘密，以換取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報酬。其還協調並投資於收購美國公司，試圖擁有美國公司的所有權。」²¹⁴此番言論明顯反映出美國在貿易上對中國的各项不滿。雖說是中美之間的貿易糾紛，但與中國經貿關係密切的日本也不免受到影響。於此同時，川普政權亦宣布計劃對鋼鐵與鋁徵收進口關稅。此政策不僅對日本的貿易造成了嚴重的打擊，也有消息傳出川普政權貿易戰的下一個目標即為對其大量出超的日本。²¹⁵使得日本不得不對美國開始產生懷疑。

²¹² Unites States(201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p.25-26, 45-47.

²¹³ 貿易戰來勢洶洶 美宣佈對華 600 億美元商品加稅，**BBC 中文網**，2018 年 3 月 23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3500214>。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²¹⁴ 【ペンス副大統領演説：全文翻訳】「中国は米国の民主主義に介入している」：ハドソン研究所にて，**海外ニュース翻訳情報局**，2018 年 10 月 9 日，<https://www.newshonyaku.com/8416/>。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²¹⁵ “Trump steel tariffs: Trading partners threaten retaliation,” **BBC**, March 2, 2018,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43251320>

綜上所述，川普政權的對中政策在現階段看來皆較歐巴馬政權更為嚴苛，中美關係不論是在經貿或是航海自由問題方面皆遇到了障礙。而在現階段川普政權雖主張印太戰略，卻無法使人感受到其如歐巴馬政權的再平衡戰略一般領導亞洲的跡象。而與中國經貿關係依存甚深的日本，為保障本國利益，在美國政策不確定的情況下亦不願與中方交惡。在這樣的背景下，中日關係於 2017 年秋季開始有所轉變，故此，在 2018 年 10 月底的中日首腦會談中，中日雙方幾乎擱置了長年以來的爭議，包括領土資源爭議、歷史問題等等，並將焦點放在現階段兩國能合作的部分。²¹⁶

貳、東亞的國際局勢

一、東南亞國協：「大國平衡」戰略

東南亞國協國家在外交策略上多打著「大國平衡」的戰略，意指其在一方面試圖防止國際秩序中由單一強權掌握，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引入大國間的競爭獲取利益。但在南海問題上，東協國家則希望透過美國，甚至是透過日美同盟來對中國做出一定的制約。然而在經濟層面上，東協國家變成了中日合作的場域。由於中日兩國在東協的投資結構不同，其互補作用不僅將為東協國家帶來利益，更是為兩國的經濟合作帶來誘因。中國自習近平政權上台後，提出了「一帶一路」的經濟戰略構想。雖然至今一帶一路的倡議的實際成果有待觀察，但日本對中國提出的此構想於近期開始有了轉變。如前所述，在對川普政權的政策抱有不確定性的此時，即便尚未有實際動作，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也從無關心到開始釋放出了願意響應的訊號。²¹⁷日本具有的豐富的國際化投資經驗、先進技術，再加上中國所擁有的低成本、開拓市場優勢相互結合，將有利於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

²¹⁶ (社説)日中首腦会談 新たな関係への一步に，朝日新聞 DIGITAL，2018 年 10 月 28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3743636.html?ref=editorial_backnumber。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²¹⁷ 安倍總理の訪中(全体概要)，日本外務省，2018 年 10 月 26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4_004452.html#section11。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簡言之，雖然東協國家所提出的「大國平衡」戰略並不是影響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推展的關鍵因素，甚至在這其中還牽涉到了美國對南海政策的態度。但只要在東南亞地區的國際秩序穩定且沒有任何單一強權掌握的情況下，即便在南海議題上中日兩國有所分歧，但兩國在東南亞地區能發展的經濟合作能量及誘因不會輕易受到影響。且無法否認的是，東南亞地區的秩序安定也是促使中日共同推進互惠關係的基礎之一。

二、北韓核武問題

北韓核武問題一直是影響東北亞秩序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日本安全保障問題重要的一環。即便於 2018 年 4 月南北韓進行了領導人會談減緩了東北亞緊張的氣氛，同年 6 月美國與北韓間針對無核化進行了相關會談並達成一定的共識，日本在 2018 年的《防衛白書》中仍表示：「日本對北韓的核武與飛彈威脅的基本認識沒有改變。」²¹⁸這是因為於 2017 年北韓已經漸漸完成了洲際彈道導彈 (ICBM)，對日本本土的安全造成相當的威脅。面對因北韓而來的安全威脅，於 2016 年 9 月的聯合國大會的演說中安倍首相也採取了比起過往更為強硬的立場。安倍首相表示：「對話對北韓而言，只是欺騙我們並爭取時間的最佳手段。我們一再地希望透過對話解決問題，然而總是無功而返。為使其完全放棄所有的核能級彈道導彈計畫，需要的不是對話，而是壓力。」²¹⁹安倍首相也強調在解決北韓問題方面，國際間的合作也是不可或缺的，而合作的對象國不外乎就是「中國」。然而中國雖然不願見北韓發展核武，但其反彈卻不像日本如此強烈。這是因為中國與北韓之間訂有《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所以中國一貫強調北韓問題只能以和平方式解決，對於聯合國內部有關對北韓的經濟制裁案也多持保

²¹⁸ 日本防衛省，(2018)。防衛白書—日本の防衛—平成 30 年版。東京：日經印刷。頁 25- 26、63-66。

²¹⁹ 第 71 回国連總會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總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說，首相官邸，2016 年 9 月 21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0921enzetsu.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留態度，反而是對為了防止北韓核武而部屬薩德反導彈防禦系統(THAAD)的南韓有更大的反彈。

第二節 國內政治結構層次

在本段落中，與前一章節一致，筆者將以中國與日本的「國家利益」、「國內政治與經濟環境」兩個部分為主軸，探討影響中日兩國於此時期推行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國內因素。

壹、中國的國內局勢

一、國家利益

中國於 2012 年 11 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十八大）後，確立了此時期中國的國家利益。根據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報告，可以發現中國打出了較胡錦濤時期更為強硬的外交政策。例如在表述與像美國一般的發達國家間的關係時，中國提出了而十八大報告則用了如下表述：「我們將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係，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²²⁰新型大國關係指的是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的國際關係，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這是中國立足時代發展潮流和中國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選擇。根據習近平的公開演說，新型大國關係是「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大國關係，是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處理衝突和矛盾的新方式。在這邊的崛起大國指的是中國，而守成大國指的則是美國。故此可以看出，習近平對中國的認知已是「大國」。此外，此一大國指的並不只是區域大國，而是世界大國。根據習近平於 2014 年在外事工作會議上的演說，中國

²²⁰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由來，**新華網**，2013 年 6 月 6 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6/06/c_116064614.htm。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在往後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²²¹這表示中國對自身外交的定位從以往的發展中國家、亞洲的區域大國轉變為「世界大國」。

這樣的認知也反映在習近平政權的對外政策上。於 2010 年前後，中國的外交政策便有逐漸偏離先前鄧小平政權所確立的「韜光養晦」精神。而這樣的情況在十八大召開後更加明顯，習近平政權在各項爭議上皆採取了相較於前政權更為強硬的立場。例如在南海爭端及中日關係上，於 2013 年執政之初階採取了極為強硬的態度。其目的是為了樹立「強國」的國際形象，同時也營造出習近平政權致力於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的政治光環。藉此轉移中國國內社會對共產黨政權的不滿。

中國為了穩固自身的大國地位，其也提出了不少國際規模的倡議。如知名的「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下稱：AIIB)、絲路基金等等。此類倡議的推行不單只需要中國的力量，也需要周邊國家的協助才得以順利執行。故此，日本對中國的重要性也在近年開始轉變。

2017 年 9 月，中國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十九大）。在十九大後，中國對自身的國家核心利益的定義並沒有太大的改變。習近平在第一任期時致力於各項「集權化」的執行，這顯示出在習近平第一期政權時，國家最主要的國家核心利益是為共產黨領導。而在十九大後，除了共產黨領導以外，國家統一、經濟成長、與鄰國的友好關係、增強海上力量、平衡陸上勢力範圍、改變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等層面也變得更为重要。²²²根據這些國家核心利益的考量，是為中國對日本態度轉變的重要關鍵，也成為了中國在推行各項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細項時的基礎。

²²¹ 習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網**，2014 年 11 月 29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²²² Kevin Rudd, "How Xi Jinping views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May 10,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5-10/how-xi-jinping-views-world>

二、國內政治與經濟環境

中國對日強硬政策的目標往往是以「讓日本在國際上被孤立」為目標，但過往的經驗往往顯示這只會使美日同盟更加強化，或是使「中國威脅論」更為高漲。²²³ 習近平政權應深知這點，但因其於上任之初，政權尚未穩定，其必須在對日政策上採取更為強硬的手段來穩定政權。尤以其在上任之前，發生了著名的「薄熙來事件」，薄熙來事件牽涉的層面太廣，包括前代領導人江澤民及其下的「上海幫」等人，同時也是江澤民與胡錦濤間的權力鬥爭的代表事件之一。礙於篇幅限制，本文將不詳述薄熙來事件發生的原由與過程。²²⁴

習近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而被選定的接班人，他能成為胡錦濤的接班人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的能力與政績，而是因為其父親習仲勛與胡錦濤一樣師承胡耀邦，擁有共產黨高幹子弟的血統以及不與人為敵的性格，加上種種的機緣巧合，使他成為江澤民與胡錦濤間一個「妥協」的選擇。²²⁵ 在薄熙來事件後，中共高層的權力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使中國的政權相當不穩，也是中國共產黨向心力下降的時期。此外，除了共產黨內部的分歧以外，也有學者提到由於當時中國的貧富差距懸殊、物價高漲加上城鄉發展失衡等社會問題，使民眾對中國共產黨失去信心。這也是當時習近平上台後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²²⁶

綜上所述，雖然中國在 2010 年的「中國崛起」後有顯著且驚人的發展，但在此同時其內部的共產黨領導體制的合理性也開始受到質疑，使習近平不得不先穩固自身的領導地位，並以整頓國內問題為優先。因此，習近平在上任後便馬上處理了鬧得沸沸揚揚的薄熙來事件，展現其領導力。除此之外，對日政策似乎也

²²³ 明報專輯組，(2015)。明察天下 I——對日關係·中國問題·香港出路。香港：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頁 76。

²²⁴ 該事件最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對薄熙來開除黨籍。

²²⁵ 相關文獻參照：矢坂明夫，(2012)。習近平，充滿謎團，中國最弱勢的領導人，*天下雜誌*，2012 年 9 月 24 日，<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3641>。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黃安偉、安思喬，(2012)。習近平的升遷之路，*紐約時報中文網*，2011 年 11 月 16 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21116/c16bio/zh-hant/>。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²²⁶ 相關文獻參照：寇健文、蔡文軒，(2012)。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臺北：博雅書屋。頁 3-6。“The Men Who Must Change China,” *The Economist*, October 27, 2012,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2/10/27/the-man-who-must-change-china>

成為了其集中權力的一環。習近平在完全掌控了黨、政、軍大權後，於 2013 年 11 月宣布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引發美日韓等國的不滿。尤其是日本，防衛省於中國宣布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當天晚上即開會商討因應對策。兩天後，安倍首相便在參議院決算委員會上表明要求中國撤回防空識別區的決議。²²⁷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習近平在此時透過各項集權化行動讓權力更向自身集中。如在這段期間，習近平不僅整治國內政治的亂象、整肅數十萬的貪汙官員，也確立了「習核心」的領導集體。在此同時，中國國內的經濟形勢也不容樂觀，地方政府與企業債台高築。因此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上連任後，發展國民經濟應成為了當今中國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²²⁸如前所述，習近平在第一任期內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以及 AIIB 的構想，這不僅是中國擴張對外的國際影響力的舉措之一，其實質目的在於鞏固中國在東亞的霸權，同時讓中國廠商能有機會承攬亞洲開發中國家的基礎建設工程，讓國內過剩的產能有個出口，用以維持中國經濟的持續成長。然而一帶一路的推展不甚順利，也有一些國家對中國抱有遲疑，指出一帶一路的項目有可能讓參與國背上過剩債務。²²⁹因此中國若是能取得日本的支持，不僅有助於提升他國的信任感並緩解關係，再加上日本的投資經驗與相關技術，將能帶來中日兩國合作上的新的機遇。除此之外，如前所述，美國在近年來試圖在貿易政策上破壞現有的國際秩序，因此中國也欲利用美國對自由貿易、多邊主義、全球化等方面的消極態度，來提高自身在國際社會和輿論中的地位。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國，沒有加入由中國所主導的 AIIB，因此中國如果能

²²⁷ 第 185 回国会（臨時会）答弁書，參議院，2013 年 12 月 13 日，<https://www.sangiin.go.jp/japanese/joho1/kousei/syuisyo/185/touh/t185085.htm>。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²²⁸ 于潔，觀點：十九大後的中國外交「策」與「術」，BBC，2017 年 10 月 18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1673603>。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²²⁹ 日媒：中日一帶一路合作全面開展 安倍重申兩原則，多維新聞網，2018 年 10 月 25 日，<http://news.dwnews.com/global/news/2018-10-25/60093460.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成功爭取日本對一帶一路的支持，對中國來說或許意味著一種外交勝利，也能藉此鞏固中國共產黨領導政權的「合法性」。²³⁰

而於 2017 年 9 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下稱：十九大)召開後，習近平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確立了其第五代最高領導人的地位。此後，習近平於 2018 年 3 月透過憲法的修正，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不超過兩屆的限制。²³¹在習近平的任期不受到任何限制的情況下，其在中國的對外政策上所掌握的權力更加集中。其在對外政策上更能依憑自身的外交理念行事，其作為受到來自國內的反彈的風險也大為降低。

綜上所述，於習近平政權執政之初由於國內政治局勢動蕩不安，其在對日政策上稍有強硬的跡象。然而隨著局勢逐漸穩固，加上經濟層面上的需求，其對日本的態度有逐漸軟化的跡象。故此，中國在與日本間戰略互惠關係上的實行也更為積極。

貳、日本的國內局勢

一、國家利益

在國家利益方面，有學者指出現今日本國家利益的三大威脅為北韓核武·導彈危機、東海上中國的攻勢以及南海上美中兩國的攻防。²³²事實上，在 2010 年及 2012 年相繼圍繞著釣魚台發生糾紛後，安倍首相對國家利益的解釋也與第一次內閣有了些許差異。其在東海問題上不僅堅持日本外務省所主張的「中日兩國不存在領土問題」的立場，沒有外交交涉的餘地。其也認為在此議題上與其對中

²³⁰ 加藤嘉一，中國和日本 誰在靠近誰，**紐約時報中文網**，2018 年 10 月 23 日，<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81023/abe-xi-be-good-buddies/zh-hant/>。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²³¹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新華網**，2018 年 2 月 25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2/25/c_1122451187.htm。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9 日。

²³² 小原雅博，(2018)。日本の国益。東京：講談社。頁 215-250。

採取「曖昧」的態度，不如堅持日本在釣魚台上的實際統治才是維護日本國家利益的最佳方式。²³³

除了東海問題以外，經濟發展亦是安倍政權所欲維護的國家利益之一。安倍首相在上台以前便提出所謂的「安倍經濟學」，顯示國內經濟的振興是為安倍政權的施政重點之一。除了國內的經濟振興外，對外貿易也是日本經濟重要的一環。因此即使「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盛行，在全球化及中日經貿相互依存深化的背景之下，安倍政權仍難以削弱或放棄透過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以及兩國企業的經濟合作所獲得的利益。

而為了維護日本本土的安全利益，美日同盟是為不可忽視的關鍵。如前所述，從歐巴馬政權到川普政權的亞洲政策雖然有所轉變，然而堅持美日安保條約中包含釣魚台一事並未有所改變，顯示美國在戰略上對日本的重視。為了平衡上述所提及的各種國家利益，日本在對中政策上仍維持一種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的模式，也不難發現安倍政權對中國仍採取一貫的「政經分離」政策。若從日本的國家利益的觀點切入，可以發現日本若想實現完整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不僅取決於其單方面的對中政策，也取決於其如何在美中兩國之間取得平衡。

二、國內政治與經濟環境

在國內政治環境的層面上，主要可以分為自民黨內部權力鬥爭及國內輿論兩方面進行探討。於 2012 年 9 月自民黨總裁選舉時，與其較勁的最大競爭對手為前防衛大臣石破茂，其立場亦為對中強硬派。而唯一的親中派候選人林芳正的人氣則最為低迷。除此之外，自民黨內親中的派閥領袖相繼引退也對日本的對中政策造成影響。親中的古賀派與岸田派和谷垣幫分裂的結果，使在對中政策上能對安倍首相施壓的勢力漸漸消退。雖然引退的自民黨親中派政治家對安倍首相對中強硬的態度有所批判，但由於安倍首相在黨內政治基礎穩固的關係，使其就算無

²³³ 安倍晉三，(2013)。《新しい国へ：美しい国へ完全版》。東京：文藝春秋。頁 217-219。

視少數親中派的聲音，亦能維持黨內團結力，也使其在外交政策上較易發揮領導力並維持一定的自主性。²³⁴

此外，根據日本資深政治評論家田崎史郎所撰寫的《安倍官邸的真面目》（原文：安倍官邸の正体）一書，指出了在安倍政權上台初期至 2014 年年底，一些重要政策往往都由安倍本人及身邊少數側重的幕僚來決定。充分展現出了「安倍一強」的局勢。具體而言，「正副官房長官會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該書指出，正副官房長官會議雖然並非是公式會議，然而如集體自衛權及修正憲法解釋等決議，都是在這個會議當中被決定的。而正副官房長官會議中的成員除了安倍首相以外，還包含了：官房長官菅義偉、副官房長官加藤政信、世耕弘成、杉田和博，以及安倍政權的首席秘書官今井尚哉五人。安倍首相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在較棘手的案件上收到下層的報告後，會附帶一句：「向官房長官報告一聲。」或是「向今井先生報告一聲。」而在 2014 年 9 月安倍政權進行內閣改造前的一個月，安倍首相便異常地表示正副官房長官將全員留任。這樣的表態在日本政壇中是相當罕見的，也能看出安倍首相對這些身邊的幕僚的信賴。²³⁵

又根據日本內閣府的輿論調查顯示，自 2012 年底安倍內閣上台之後，日本人民對中的好感度普遍偏低。2012 年底日本對中國不懷有好感的民眾佔了 80.6%。²³⁶因此，安倍首相於 2012 年底時較易在釣魚台問題上堅持自身立場。然而這個情況到了 2017 年開始有了些許的轉變，在中日關係和緩地當時，安倍首相找回了較為親中的岸田文雄擔任政調會長，以及二階俊博擔任自民黨幹事長，使對中政策變得更為圓滑。雖然於 2017 年發生了「森永友學園」、「家計學園」等相關政治醜聞使安倍內閣的支持率下降，然而比起政治醜聞，日本人民較為關

²³⁴ Karol Zakowski, (2016)。安倍第一次・第二次政權の对中国外交—比較分析の試み。Silva *Iaponicarum*, No.49, 頁 24-60。

²³⁵ 田崎史郎, (2014)。安倍官邸の正体。東京：講談社。頁 26-40。

²³⁶ 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内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2012 年 11 月 26 日，<https://survey.gov-online.go.jp/index-gai.html>。最近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注「日本的對美、對中外交政策」、「經濟政策」之故，使政治醜聞不致於對安倍內閣在外交政策施展上帶來太大的影響。²³⁷

而就經濟層面而言，日本國內財界相較於一般的利益團體，在外交政策層面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由於經濟層面一直以來都是維持中日關係的一大要因，因此在這背後日本的經濟團體所帶來的影響亦不容小覷，如：「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下稱：經團連）、日中經濟協會等等。日本財界對中國廣大的市場一向抱有相當大的興趣，並希望加深與中國間的經濟合作。例如：在 2012 年中日關係盪至谷底後，2013 年年底日本經濟協會便率團訪中，這也是安倍內閣上台後規模最大的訪中經濟代表團。試圖在釣魚台問題而惡化的政治關係中，通過民間外交強化兩國經濟關係，不讓兩國的「政冷」影響「經熱」。²³⁸又如時任經團連會長榊原定征曾強調：「必須透過兩國的經濟合作建立戰略互惠關係。」除此之外，其也大膽表示中日兩國在包含一帶一路的國際性經濟計畫的合作將會創造兩國的雙贏局面。²³⁹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自 2015 年起，經團聯與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開始定期舉辦「中日企業家與元政府高官對話」（原文：日中企業家及び元政府高官對話）。內容言及了兩國的經濟界將會致力於兩國的政治相互信賴以及經濟互惠的擴大，並在各方面推動投資的便利性與自由貿易。²⁴⁰此會議至 2019 年為止定期舉行，至今已舉行了五次。經團連透過這樣的管道，不定期與中國的重要企業家及相關政府高層展開經濟層面上的對話，並發表相關聲明。由此可見，日本的經濟團體在中日關係上所帶來的影響力。而在中日關係明顯好轉的 2017 年，5 月

²³⁷ 森友・加計問題はもう飽きた？世間の関心は外交が 8 割，ニッポン放送，2018 年 4 月 13 日，<https://news.1242.com/article/141637>。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²³⁸ 日本經濟團訪華尋突破 媒體猜“中方誰會見”，環球網國際新聞，2013 年 11 月 19 日，http://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3-11/4577629.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²³⁹ 榊原経団連会長、日中対話で「戦略的互惠関係に貢献」，日本經濟新聞，2017 年 12 月 5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24265070V01C17A2EAF000/>。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19 日。

²⁴⁰ 第 1 回日中企業家及び元政府高官對話共同声明，日本經濟団体連合会，2015 年 11 月 13 日，<https://www.keidanren.or.jp/policy/2015/104.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14 日。

自民黨總幹事二階俊博訪中時，前經團連會長榊原定征也曾一同隨行，6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也曾與榊原定征就一帶一路計畫進行相關會談。²⁴¹在2018年10月底500多位經濟界人士隨行安倍首相參與訪中行程前，經團連及相關經濟團體也率先率領了200多位經濟界人士與中國政府進行對話，特別是在第三方市場合作上，確立了兩國經濟合作的方向。日方也表示，在滿足第一、顧及對方國家的財政健全性，第二、開放性，第三、透明性以及第四、經濟合理性這四個條件之上，欲積極與中國在第三國開展經濟合作。²⁴²透過這些會談的鋪路，中日兩國也順利在2018年10月安倍首相訪中時，確立了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框架。從這種種的跡象中也不難看出日本國內財界與中國間所締結的關係不僅是影響中日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國內財界期盼包含中日政府在內的經濟合作也是影響安倍政權推動對中政策的一個動因。

第三節 個人或決策層次

在本段落中，將分析此時期中日兩國領導人個人對彼此的看法、其對中日關係的期望，以及其個人的領導風格及偏好，藉此觀察兩國領導人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影響力。中國與日本皆在2012年底進行了政權更替。在中國，於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不僅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也當選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並接任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掌握了共產黨內的相關大權。並於2013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會議中正式取得國家主席的職位。

而在日本，安倍晉三於2012年9月再度當選自民黨總裁，且自民黨在12月的第45屆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選舉中取得勝利，安倍也成功當選日本首相至今。故此在本段落中，在中國方面，將以習近平為核心的「習近平體制」為主軸進行

²⁴¹ 中國副首相「中日關係に前向きの動き」 経団連会長と会談，日本經濟新聞，2017年6月12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S12H72_S7A610C1EE8000/。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2月19日。

²⁴² 日本就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提出4條件，日經中文網，2018年9月26日，<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aeconomy/politicasociety/32389-2018-09-26-09-04-06.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年6月15日。

探討；而在日本方面，則將以分析首相安倍晉三為主。探討於安倍首相個人的外交方針與對中關係的看法，藉此觀察日本於此時期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態度。

壹、習近平政權的政治外交理念

如前所述，習近平於執政之初，為了轉移中國民眾對於中國內部的不滿，其在對日政策上相較於胡錦濤時期有較為強硬傾向，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關心也不如胡錦濤政權。習近平調整了 1970 年代末期以來鄧小平所主張的「韜光養晦」的精神，強調由於中國國家實力及地位已產生改變，因此在外交政策上須根據該變化來調整對國家利益的判斷。

習近平於 2013 年正式提出「奮發有為」的外交戰略。²⁴³奮發有為這樣的外交戰略運用在對日政策上時，指的是中國在尊重日本的國家核心利益的同時，也欲守護自身所定義的國家核心利益，如：東海問題上擺出堅守底線、決不退讓的精神。另外在處理南海爭端問題時，中國也清楚地展現出絕不犧牲國家核心利益的決心。這樣的情況持續到了 2014 年年底，習近平的對日政策開始轉變，並對日本採取相對懷柔的政策。由於當時習近平已掌握軍權，也剷除了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在軍中的勢力，因此過度強硬的對日政策不再需要。

而在習近平政權邁入第二期後，中國的外交方針又有了些許的轉變。習近平在 2017 年 10 月十九大中所提出的報告指出：「中國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係，秉持正確義利觀和真實親誠理念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²⁴⁴由此可見，當前中國外交有三個方向，也就是大國關係、周邊外交及發展中國家。

²⁴³ 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網**，2013 年 10 月 25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1526.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⁴⁴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網**，2017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有學者指出，此時日本在中國外交中的定位已由「大國關係」的主體之一轉變為「周邊國家」之一。如在 2012 年 1 月的《人民日報》中曾指出：「中美、中俄、中歐、中日……一年裡，中國同各大國關係穩步發展。」²⁴⁵但日本在十九大的報告中的意義是中國周邊外交的重要國家，而非大國。日本在中國外交中地位的轉變並不意味其在中國外交總體佈局中變得無足輕重，而是因為中國調整了自身的對外關係佈局並重視周邊外交有關。²⁴⁶早在 2013 年，習近平便已強調：「周邊對我國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思考周邊問題、開展周邊外交要有立體、多元、跨越時空的視角。」²⁴⁷由此可見，在習近平的政權漸趨穩定後，其不僅在對日關係上更為重視，其欲與日本一同維護戰略互惠關係的態度也相較於前期更為積極。

貳、安倍政權的政治外交理念

一、積極和平主義

積極和平主義的提出是在 2013 年 9 月聯合國大會的一般討論演說中，安倍首相主張在國際潮流轉換的趨勢中，日本不能只致力於維持本國的和平，而是應為世界的和平與安定做出更加積極的貢獻。²⁴⁸有中國學者指出，安倍政權所提倡的積極和平主義在安保方面的主要戰略訴求之一，便是把中國作為「準敵國」程度的假想敵，因此其一系列的軍事布局的瞄頭也指向了中國。例如：積極和平主義試圖透過加強日美同盟，在東海問題上以美國為後盾加強日本的立場。然而，

²⁴⁵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2011 年治國理政紀實，**中國網**，2012 年 1 月 4 日，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2-01/04/content_24316482_6.htm。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⁴⁶ 金正昆、張芳慧，(2018)。中日關係演變與習近平對日外交戰略。**貴州省黨校學報**，2018 年第 4 期，頁 56-63。

²⁴⁷ 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人民網**，2013 年 10 月 25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1526.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⁴⁸ 第 68 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首相官邸**，2013 年 9 月 26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26generaldebate.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美國出於自己的戰略利益考量，既希望中日兩國維持一定的衝突烈度，同時又防止兩國爭端升級引發武裝衝突，因而其策略是通過「動態平衡」加以協調和掌控。

249

如前所述，2014 年首腦會談中美國公開宣布釣魚台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即便如此，美國亦期待中日兩國透過建立對話平台及信賴關係，和平解決東海爭端。而積極和平主義對中日關係的另一個影響則為修改憲法第九條和解禁集體自衛權所引發的中國的反感，也加深了中國對日本的不信任。在此部分則具體表現在 2015 年 9 月日本通過《新安保法案》，並於隔年 3 月正式實施。中國外交部則回應：「日本某些勢力一直試圖通過製造所謂“中國威脅”推進國內政治議程，中方對此堅決反對，要求日方不得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不做損害地區和平穩定的事。」²⁵⁰

面對這樣的批判，日本政府則表示：「新安保法案是為了保障日本國民的安全以及和平的生活，對日本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且新安保法案是近年來安全保障環境的變化下的產物，對不間斷的安全保障法治的整備而言是必要的。」²⁵¹強調新安保法案的目的是為了因應安全保障環境的變化，並不回應中國威脅論之說。

二、俯瞰地球儀外交

以上述的積極和平主義為基礎，安倍政權展開了「俯瞰地球儀外交」。俯瞰地球儀外交指的是：「不單單建立與鄰近國家的兩國關係，而是要如同俯瞰地球儀一般，立基於自由、民主主義、基本人權及法治的基本價值之上展開戰略性的

²⁴⁹ 胡令遠、高蘭，(2015)。「積極和平主義」：日美同盟的福音，**國際問題研究**，2015 年第 3 期，頁 21-35。

²⁵⁰ 2016 年 3 月 30 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記者會，**中國外交部**，2016 年 3 月 30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351837.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⁵¹ 「国の存立を全うし、国民を守るための切れ目のない安全保障法制の整備について」の一問一答，**內閣官房**，<http://www.cas.go.jp/jp/gaiyou/jimu/anzenhoshouhousei.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外交。」²⁵²此亦顯示出俯瞰地球儀外交實質上夾帶了「價值觀外交」的色彩。而這當中包含了兩大主軸，一為加強與中亞大陸各國的連結，另一則為以印度洋為中心，範圍從東南亞各國連接到非洲大陸的印度太平洋戰略。²⁵³

而後者則呼應了前揭的川普政權的「印太戰略」。截至 2020 年 1 月底，安倍首相已造訪 80 個國家（區域）。²⁵⁴然而安倍政權積極造訪世界各地的行動則被認為帶有「制衡中國」的色彩，舉例來說，也有報導指出 2014 年安倍首相訪問拉丁美洲的目的共有三個，分別是：「資源外交」、「謀求入常」和「牽制中國」。

255

三、安倍首相個人對中看法

上述兩項外交方針雖然看似對中國較不友善，且其更新了 2006 年的著作「美しい国へ」，並在 2013 年出版的「新しい国へ」一書中也曾寫到：「從以前到現在的日中關係以『友好』為首要目標，因此即便是損及國家利益，也必須維持『友好』的原則。然而友好只是維護國家利益的一種手段，而將手段變成目的，這是本末倒置的。」²⁵⁶這種種的跡象似乎顯示出安倍首相對中強硬的立場，然而自安倍首相的發言中可以發現其對中國並非完全的牽制。如其在 2012 年年底也於《文藝春秋》上撰文指出：「大力推進日中戰略互惠關係才是日本對中政策的最大利益。」²⁵⁷於 2013 年 1 月的眾議院質詢上也表示：「日中關係是我國最重要的兩國關係之一，即使有個別問題也應盡可能不波及至全體，且應回到戰略互惠關係

²⁵² 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首相官邸，2013 年 1 月 28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⁵³ 鈴木美勝，(2017)。日本の戦略外交。東京：筑摩書房。頁 35-57。

²⁵⁴ 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首相官邸，<https://www.kantei.go.jp/jp/feature/gaikou/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20 日。

²⁵⁵ 高洪，(2015)。略論 21 世紀日本對拉美外交戰略變遷。拉丁美洲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頁 33-40。

²⁵⁶ 安倍晉三，(2013)。新しい国へ：美しい国へ完全版。東京：文藝春秋。頁 217-219。

²⁵⁷ 安倍晉三，(2012)。新しい国へ 戦後の歴史から日本という国を取り戻したい。文藝春秋，2013 年新年特別号，頁 131。

的原點，以大局的觀點推進日中關係。」²⁵⁸其在上台組閣後也不斷釋放出願意與中國對話的訊號。顯示其一方面雖然有與中國較勁的意識，卻也同時意識到中國為本國所帶來的利益，因此不願持續於民主黨時期中日關係尷尬的狀態。其以自身在第一次組閣時所提出的「戰略互惠關係」為對中國「戰略對沖」的一環，一方面以美日同盟作為後盾在重點議題上堅持自身立場，另一方面也釋放出友好的訊號欲推進與中國之間的戰略互惠關係。

第四節 走向穩健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壹、增進政治互信

在增進政治互信的層面上，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中明訂：「建立兩國領導人定期互訪機制，原則上隔年互訪，在多邊場合頻繁舉行會晤。」

然而第二次安倍政權上台後直至 2018 年 10 月安倍首相才正式到中國進行了國是訪問，而目前尚未有中國領導人至日本進行正式的國是訪問。²⁵⁹雖然在領導人隔年互訪的部分稱不上成功落實，但在多邊場合中日兩國領導人仍有會晤的紀錄。如於 2014 年 11 月，於北京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召開前，安倍首相與習近平進行了短暫的會晤，並就改善中日關係達成四點原則共識，稍微緩解了中日之間自 2012 年釣魚台國有化事件後的高度緊張對峙局面。²⁶⁰此後，於 2015 年 4 月印尼亞非峰會、11 月法國巴黎出席氣候峰會、2016 年 9 月中國杭州 G20 峰會、2017 年 7 月德國漢堡 G20 峰會及 2017 年 11 月越南峴港 APEC 會

²⁵⁸ 第百八十三回国会 衆議院會議録第二号，国会會議録 検索システム，2013 年 1 月 30 日，<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yugiin/183/0001/main.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⁵⁹ 於 2018 年中日韓高峰會召開之時，李克強曾以「公賓」的身份前往日本。詳情參考：李克強・中国国务院総理の訪日 日中首脳会談及び晩餐会，日本外務省，2018 年 5 月 9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1_000526.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5 月 4 日。

²⁶⁰ 「習安會」北京上演 中日首脳再次會晤，BBC 中文網，2014 年 11 月 10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11/141110_china_japan_talks。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議中，安倍首相與習近平皆有相關的會晤紀錄。顯示自 2012 年釣魚台事件後，中日兩國雖然認知到無法馬上恢復緊密的雙邊關係，但對雙邊往來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共識，因此仍透過國際組織會議等場合進行意見交換，試圖維持一定程度的政治對話。

貳、促進人文交流，增進人民友好感情

在兩國的文化交流層面上，在這些年間兩國展開了不少民間交流活動。而就兩國的留學生人數統計資料可以發現近年來兩國青少年交流是日益活絡的。2013 年赴日的中國留學生為 81884 人，而該數值於 2017 年則達到了 107260 人。²⁶¹2013 年赴中的日本留學生為 2589 人，而該數值到了 2016 年也上升至 4091 人。²⁶²

而就旅遊人數的統計數據而言，可以發現於 2013 年訪日的中國遊客人次為餘 130 萬人次，而到了 2017 年則上升至餘 730 萬人次。然而日本訪中的遊客於 2013 年為 287 萬人次，2017 年則為 268 萬人次，並無太大的浮動。²⁶³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報導指出在針對日本大學生的相關調查中，發現日本大學生對中國不感興趣的原因不外乎「領土問題、海洋開發問題、反日情緒」等等。但同時前往日本旅遊，留學的中國年輕人卻逐年飆升，顯示中日青年的「交流逆差」仍不斷加劇。²⁶⁴

中日兩政府在雙方文化交流層面上的努力主要也是在 2018 年展現。4 月，兩國重啟了停滯九年的中日政府間文化交流協商會議，兩政府間的互動也加速了

²⁶¹ 外国人留学生在籍状況調査，独立行政法人 日本学生支援機構，2014 年 3 月、2017 年 12 月，https://www.jasso.go.jp/about/statistics/intl_student_e/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⁶² 協定等に基づく日本人学生留学状況調査，独立行政法人 日本学生支援機構，2015 年 2 月、2017 年 12 月，https://www.jasso.go.jp/about/statistics/intl_student_s/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⁶³ 月別・年別統計データ(訪日外国人・出国日本人)，日本政府観光局，2018 年 10 月，https://www.jnto.go.jp/jpn/statistics/visitor_trends/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⁶⁴ 蔣豐，「免費都不想去中國」—中日青年交流形成驚人「逆差」，日本新華僑報網，2017 年 5 月 12 日，<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91027>。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雙邊關係的改善。²⁶⁵同年 8 月，中日兩國為慶祝《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 40 周年，於北京舉辦了「中日大學生千人交流大會」。²⁶⁶上千名中日大學生的大型交流活動，不難讓人聯想到於 1984 年 3000 名日本青年訪中的盛況。然而如何消弭上述的交流逆差，還有待兩國政府的共同努力。

參、加強互利合作

在加強互利合作的層面，仿照前章節，本段分為兩個層面探討。一為兩國的經貿交流，另一則為共同解決東海問題上的合作。在經貿交流的部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中明訂：「中日兩國應從戰略高度有效運用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然而中日經濟高層對話自 2010 年舉辦後便因圍繞東海問題而急速惡化的中日關係停辦，2018 年 4 月才又再次舉行。於這次對話中，中日兩國主要以四個專題為主進行深入探討。分別是：宏觀經濟政策、中日經濟合作與交流、中日第三方合作以及東亞經濟一體化與多邊合作。再次舉行的原因可以舉出以下三點：第一、鞏固共同利益。第二、拓展合作空間。第三、支持自由貿易。前兩點是立基於中日兩國意識到東亞區域的經濟合作為本國帶來的利益，而最後一點則是美國所帶來的影響。由於中日兩國皆意識到當前美國採取本國優先政策之故，導致世界自由貿易體系已經漸漸受到威脅。

換句話說，美國因素不僅催化了中日兩國經貿層面的互惠關係，也為中日關係帶來更大的機會。²⁶⁷雖然中國政府與官媒皆表示這次的高層對話主要是由日方積極推動，中國僅是被動的配合。但事實上，日本官民卻有不同的解讀。有學者

²⁶⁵ 中日政府間文化交流協商會議機制在日本召開第 14 次會議，**人民網**，2018 年 4 月 23 日，<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8/0424/c35421-29944947.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⁶⁶ 慶祝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 周年“中日大學生千人交流大會”在京舉行，**環球網國際新聞**，2018 年 8 月 30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08/12872877.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⁶⁷ 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時隔 8 年重启的三層考量，**人民網**，2018 年 4 月 17 日，<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8/0417/c35421-29930435.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指出，這次的高層對話是源於中美關係的惡化，為了緩解中美貿易摩擦所產生的衝擊，迫使中國在對外關係上進行調整之故。²⁶⁸而在本次的經濟高層對話中，中日兩國也在政府層面就在協力廠商市場開展合作達成共識，為兩國企業在海外市場開展更為廣泛的合作奠定了良好政治基礎和政策保障。

而在東海問題方面，為避免中日兩國在東海海域產生偶發性的軍事衝突，事實上中日兩國於 2007 年便達成了建立通報機制的共識，然而完整的「海空聯絡機制」經過了多年的談判，直至 2018 年 6 月才正式啟用。這是因為於 2012 年因釣魚台國有化事件後，中國政府下令停止海空聯絡機制的磋商。直至 2014 年 9 月於中日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期間，雙方於原則上同意重新啟動海上聯絡機制的磋商。2015 年 1 月，中日兩國才又於東京啟動「海空聯絡機制」談判。此後又經歷了 2015 年 6 月、2016 年 11 月、2018 年 4 月的協商，終於在同年 6 月正式啟動。²⁶⁹

而中日兩國的海空聯絡機制主要包含三點：第一、設定日本自衛隊和中國軍隊在緊急情況下進行對話的無線電頻率和語言；第二、在防衛部門之間建立電話熱線；第三、防衛部門之間舉行定期碰面，促進相互信任。雖然由於 2014 年包含中日兩國等 21 國審議通過了避免海上衝突的行為規範《海上意外相遇規則》(CUES)，使日本自衛隊和中國軍隊的艦船發生不測事態時，可以通過 CUES 規定的通信規則進行聯絡，讓兩國間的海空聯絡機制框架的意義大幅減弱。但較為特殊的是，中日兩國的海空聯絡機制中提出了《海上意外相遇規則》中所沒有的防衛部門之間定期碰面，這表明中日達成的協議並非毫無意義。²⁷⁰中日海空聯絡機制的簽署與啟用，算是兩國於「共同努力，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

²⁶⁸ 石原忠浩，(2018)。安倍內閣「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回顧與展望。《戰略安全研析》，第一四九期，頁 21-30。

²⁶⁹ 日中防衛当局間の海空連絡メカニズムに関する第 7 回共同作業グループ協議(結果概要)，防衛省/自衛隊，2018 年 4 月 11 日，<http://www.mod.go.jp/j/press/news/2018/04/11g.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⁷⁰ 永井央紀、加藤晶也，「平和の海」残るリスク 日中、衝突回避へ連絡体制，日本經濟新聞，2018 年 5 月 11 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0344700Q8A510C1EA1000/>。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這點上跨出了一大步。但不可否認的是，圍繞釣魚台主權歸屬問題，中日兩國至今仍未達成共識，東海問題仍為中日關係之間的一大不確定因素。

肆、共同致力於亞太地區的發展

在此面向上也將分為兩個部分探討，分別為北韓核武問題及東亞區域合作。

如前所述，面對北韓核武所帶來的區域安全威脅，雖然「北韓無核化」為中日兩國的共同利益，但兩國的立場始終存在著些許差異。且六方會談的機制在 2009 年北韓宣布退出後，至今一直沒有復會，因此中日兩國在解決北韓核武議題上所展開的合作主要來自於其他多邊機制，如：中日韓高峰會。2015 年的中日韓三國在高峰會後共同發表了《東北亞和平合作聯合宣言》，在本宣言中言及北韓之條項為第一項及第五項，面對北韓所帶來的核武危機，日本與中國一致支持由韓國所主導的「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以及「中日韓核安全監管高官會」。²⁷¹而於 2018 年的中日韓高峰會中，三國除了針對 4 月南北韓簽訂的《板門店宣言》進行意見交換以外，也一同表示支持朝鮮半島的無核化，然而從各國的措辭中仍能感受到其態度有著些許的差異。例如：日本強調其站在與美國相同的立場，認為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必須是「完整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轉的無核化」。

而中國則僅止於表示支持北韓與他國在各方開展多種形式的對話、解決朝鮮半島的政治問題，除此之外，在北韓核武問題上，中國並未展現出特別強硬的立場。²⁷²顯示出在北韓核武問題方面，中日兩國雖然有合作的動機，但兩國對北韓無核化的程度及目標不一致，導致兩國在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中所提到的「共同致力於亞太地區的發展」、致力於維護東北亞地區和平與穩定這點上沒有完全的被落實。

²⁷¹ 北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平和と協力のための共同宣言，日本外務省，2015 年 11 月 1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3_001450.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⁷² 小野甲太郎，日中韓、難航した共同宣言 非核化へ温度差、道筋示せず，朝日新聞 DIGITAL，2018 年 5 月 9 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L594VCQL59UTFK00L.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現階段東亞區域合作的部分，除了有國際多邊組織如:APEC 及「東協+3」等平台進行對話以外，尚有多個區域貿易協定，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下稱：RCE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下稱：CPTPP)及多項 FTA 等等。RCEP 是於 2012 年由東南亞國家協會十國所發起，並加入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洲及紐西蘭，共 16 國國家所構成的自由貿易協定，而現在則由中國積極進行主導。由於參與國家眾多，各國所追求的利益有所衝突，加上參與的成員國之間發展水準差距過大、領導力不足等原因，導致目前 RCEP 目前仍在進行協商，尚未有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雖然 RCEP 有這樣的阻礙，但川普政權不斷挑戰現存的多邊貿易體制及其貿易保護主義所帶來的壓力，還是為 RCEP 的談判帶來了新的動力。例如於 2018 年 7 月的「RCEP 部長級會議」上，安倍首相也表示：「希望各國團結一致，在地區營造一個符合規則，自由而公正的市場。」²⁷³

再加上如前所述，美國退出 TPP 一事也使參與 TPP 的原始成員轉而聚焦於推動 RCEP 的談判。雖然中國並沒有加入 CPTPP，但缺少美國的 CPTPP，中國也不認為這會對 RCEP 構成太大分解力量與直接衝擊，因此其亦不反對由日本所主導的 CPTPP 的成形。²⁷⁴面對美國對日本提出的更為強硬的貿易政策，日本希望透過早日確立 RCEP 機制，並主導推動 CPTPP 儘快生效，以此牽制美國。換句話說，美國所帶來的威脅不僅影響了中日兩國的雙邊經貿交流，甚至加速了中日兩國在東亞的區域合作，促進亞太地區的發展。

此外，近年來中日兩國在促進亞太地區的發展上有一個突破性的進展，那就是在 2018 年 10 月安倍首相訪中之時，舉行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並

²⁷³ RCEP 部長級會議在東京舉行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致辭，[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702/c1002-30098463.html)，2018 年 7 月 2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702/c1002-30098463.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⁷⁴ 白云怡，TPP 變身 TPP11 中方坦率回應:沒有給予太多關注，[環球網國際新聞](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11/11374006.html)，2017 年 11 月 11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11/11374006.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簽訂了「第三方國家開發案合作備忘錄」，預計在各地的基礎建設上由中日攜手合作開發，使中日合作不僅為兩國帶來利益，更是為區域發展帶來更大的機會。然而，安倍首相也強調中日兩國這樣的合作必須在確保「開放性」與「透明性」的基礎上進行。²⁷⁵

伍、共同應對全球性課題

在此層面上將仿效前章節，以環境保護議題為例，探討第二次安倍政權在這方面的實踐。

雖然中日關係在釣魚台國有化事件後降至冰點，導致不少中日雙邊的環境保護對話平台中斷。如：「中日綠色博覽會」。於 2014 年才逐漸再次開啟雙邊的對話，如：「中日節能環保綜合論壇」，這也是 2012 年後中日兩國在政府主導下首次召開的大型活動。²⁷⁶這顯示雙方在環境保護的議題上能有較多的對話空間，也顯示環境保護議題能成為雙邊關係的突破口。而於 2017 年兩國的合作又更為熱絡，透過「中日環境高級別圓桌對話會」、「中日環境保護產業合作研討會」等平台深化務實合作。²⁷⁷

除了雙邊合作以外，中日兩國在多邊組織中針對環境保護的合作亦有不少成果，如：自 1999 年召開的「中日韓環境部長會議」，即便中日關係惡化仍每年如期舉行。於 2013 年的會議中，韓國在三國協商中扮演了斡旋的角色。由於中日之間在首相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及釣魚台國有化爭議上產生不小的衝突，中國原先拒絕了由日本所提議的政府層面合作機構，要求降級設立民間合作組織。然而在韓國的斡旋下，中日兩國最終同意決定設立「中日韓空氣污染政策對話會」，

²⁷⁵ 日中第三国市場協力フォーラム 安倍総理スピーチ，首相官邸，2018 年 10 月 26 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8/1026daisangoku.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6 月 15 日。

²⁷⁶ 第八屆中日節能環保綜合論壇在京舉行，中國能源網，2014 年 12 月 29 日，<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893579-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⁷⁷ 吳瓊靜，日本贊中國綠色發展決心 中日環保合作迎新契機，人民網，2017 年 6 月 17 日，<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7/0617/c35421-29345761.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由三國政府工作人員參與，但對外不提及該機構的官方性質。其旨在促進中日韓交流大氣污染防治政策與技術，共同應對空氣污染問題。三國還就沙塵暴問題進行了討論，計畫構建專門的體系，為治沙工程持續提供資金方面的支援，並將盡快成立綠色氣候基金(GCF)。²⁷⁸而於 2015 年，中日韓三國簽定了《中日韓環境合作聯合行動計畫(2015-2019)》，該項協議將三國把重點放在管理沙塵暴、煙霧和海洋污染的研究和政策建議相關的增值工作上。²⁷⁹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中日韓環境部長會議歷年來皆順利舉行，然而中日韓高峰會卻時常因雙邊關係不佳而停辦，顯示環境保護議題不僅為中日兩國的合作帶來誘因，更是在中日韓三國政府間形成了極高的合作共識。

第五節 小結

經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至今為止影響第二次安倍政權與中國之間的「戰略互惠關係」似乎不僅只是建立在中日兩國之間，日本在對中政策上總是存在著美國的影子。安倍首相在歐巴馬政權時期一面配合美國的亞洲再平衡戰略，另一方面又考量到自國的經濟利益，使得日本即便想在經濟層面上與中國達成「互惠」，然而在「戰略」上卻無法與中國達成共識，反而有相互較勁的影子。這樣的情況到了 2017 年開始有所轉變，雖然這當中也有北韓的核武威脅所帶來的影響，然而主要還是因為美國川普政權的不確定性所造成的。

而中國對戰略互惠關係的態度則在此時期有些許的改變。除了前述的美國因素以外，中國的國內政治環境也為中日關係帶來的一定的影響。於習近平政權前期，由於中國的國內政治環境尚未穩定，其為了轉移國內社會對政權的不滿以及維護共產黨執政的正當性，整體的對外政策較為強勢。然而，隨著國內政局逐漸

²⁷⁸ 中日韓三國將合作解決跨境空氣污染，**BBC 中文網**，2013 年 5 月 6 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3/05/130506_china_jhapan_korea.s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²⁷⁹ 中日韓簽署環境合作聯合行動計畫 將共同應對環境問題，**人民網**，2015 年 4 月 30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430/c157278-26933002.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2 月 20 日。

穩定，習近平在對外政策上的主導性增強。其為了要推動各項大型計畫，建立其在國際上的地位，固然需要來自於日本的各項協助，因此改善了於前時期僵化的對日關係。自戰略互惠關係的五個層面上的各項成果也可看出，於 2013 年至 2014 年之時未有進展，2014 年後開始有些許的改善，而到了 2017 年下半年，中日關係加速改善，使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成果。



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本文回顧

於第一章緒論中，對本論文的整體做了詳細的介紹。首先介紹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動機，並且詳述了本文的研究問題以及目的。接著闡述了本文的研究途徑及方法。本文採用了肯尼思·華爾茲所提出的層次分析法進行分析，並整理出了層次分析法於日本研究中尚未盛行的原因。於第一章的最後，也針對了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與限制進行說明。

接著於第二章中，針對了本文所使用的理論「新古典現實主義」進行介紹。同時也針對近年來影響中日關係的各種不同因素進行文獻探討。雖然影響中日關係的因素眾多，本章節中針對了「歷史認識問題」、「領土資源問題」、「經貿交流及發展」以及「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此四大因素的中日文獻進行了探討。

而於第三章中，針對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提出背景、成形過程，以及對其重要內涵進行了分析。在本章節中也整理出了《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此份文件的三大意義，分別是：將中日關係從兩國層次提升至世界的層次、帶領中日關係超越「72年體制」以及相較於前三份中日兩國所簽訂的文獻有升格的跡象，為中日關係帶來更大的建設性與可能性。

在第四章與第五章中，分別針對了胡錦濤/民主黨時期以及習近平/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成果以及當時的執行背景進行了分析。首先就前者而言，雖然中日兩國的領導人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都持有正面的態度，然而在東海上的領土主權以及海洋權益的衝突，成為此時期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無法完全落實的最大原因。而就後者而言，雖然在前期中日關係因東海問題的餘波而無明顯進展，然而在美國川普政權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北韓核武威脅的影響之下，到了後期則有明顯的改善。因此可以了解即便中日兩國在根本的問題上雖然沒有得到解決，然而在國際環境變化的催化之下，中日兩國仍有一定的合作空間。

第二節 對研究問題的解答

經過以上的分析，筆者在此對一開始的研究問題提出解答。

首先，針對「至今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成敗如何？以及其為中日關係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一問，透過研究可以得知，中日兩國在戰略互惠關係成立後，時常成為兩國領導人在公開場合中論及對中日關係的期望時的代名詞，因此也可以說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成為了當代中日兩國的一個共同目標。然而，這個目標的基礎有一大半部分建立在「經濟層面」上，故此，若觀察近年來的中日互動則可以發現，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脆弱性主要來自於「安全層面」。如：釣魚台的領土主權問題，對北韓核武問題的立場等等。至今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成敗一言以蔽之，成功的部分主要都在於經濟層面，而失敗的部分主要集中於安全層面上。

再來是針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中規定中日雙方在五大領域中建構對話與合作的框架，近十餘年來中日雙方在五大領域中有什麼樣具體的實踐？」一問，透過下表可以得知，在「促進人文交流，增進人民友好感情」的層面上兩時期皆有成果。而除了增進政治互信層面外，在其餘的層面上皆是於習近平/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較有所成果。

表 6.1：胡錦濤/民主黨時期與習近平/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成果概述表。

	2009 年至 2012 年（胡錦濤/ 民主黨時期）	2013 年至 2018 年（習近平/ 第二次安倍政權時期）
增進政治互信	2009 年：小澤率 600 人訪中。 習近平訪日會天皇陛下。 2010 年至 2012 年：雙方領 導人每年皆有互訪及對話紀 錄。	2018 年：安倍首相訪中。 2014 年 11 月後，中日兩國 於多邊會議上有些許會面紀 錄。

<p>促進人文交流，增進人民友好感情</p>	<p>即使於 2010 年與 2012 年發生了兩次釣魚台事件，中日兩國間的留學生及觀光人次皆呈現正成長。</p>	<p>留學生呈正成長。赴日觀光人次增加，赴中人次下滑。 2018 年：中日政府間文化交流協商會議。中日大學生千人交流大會。</p>
<p>加強互利合作</p>	<p>中日經濟高層對話僅於 2010 年召開一次。 2012 年 5 月：中日高層事務海洋會議。</p>	<p>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於 2018 年重啟。 東海問題：正式設立並啟動海空聯絡機制。</p>
<p>共同致力於亞太地區的發展</p>	<p>北韓核武問題：中國不願對北韓採取強硬的立場，然仍對「鈾濃縮計畫」及《9·19 共同聲明》表示支持。 東亞區域合作：鳩山的東亞共同體一度成為區域合作的契機，但沒有實質的進展。</p>	<p>北韓核武問題：中日立場有些許差異，但有多次談判對話的機會。 東亞區域合作：RCEP 與 CPTPP 都沒有明顯進展，但中日兩國不反對由對方主導的區域合作計畫。</p>
<p>共同應對全球性課題</p>	<p>哥本哈根會議中日無法達成共識。 中日韓高峰會：《關於永續開發的共同聲明》、《關於透過再生能源及能源效率推動永續發展成長的合作》。</p>	<p>2014 年：中日節能環保綜合論壇。 2015 年：《中日韓環境合作聯合行動計畫(2015-2019)》。 2017 年：中日環境高級別圓桌對話會、中日環境保護產業合作研討會。 2018 年：第三方市場合作。</p>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相關資料。

中日兩國針對北韓議題，在 2009 年中，除了希望能盡速恢復六方會談的框架以外並沒有更进一步的共識。於 2011 年，雖然以「東日本大震災」為主軸進行合作之協商，但也針對北韓所提出的「鈾濃縮計畫」表達關切，重申三國達成《9·19 共同聲明》之目標。《9·19 共同聲明》是 2005 年六方會談的成果，其重點目標即為以和平方式可核查地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然而，可以看出在此時期中國對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態度並不是太積極。如在 2012 年所簽署的《提升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中並未言及關於北韓核武問題一事。這是因為在中國的要求之下，日本與韓國接受了此項主張之故。但在本次高峰會中亦針對當年 4 月 13 日北韓試射導彈一事進行討論，三國同意面對北韓的挑釁行為進行更緊密的合作，並要求北韓「自制」其行為。²⁸⁰又如於 2010 年發生「天安艦事件」後，使兩韓的關係更為惡化。然而針對本次事件，日本與南韓雖然一同站在譴責北韓之立場，然而中國卻堅持「沒有確證能證實此事件為北韓所為」，而站在中立之立場。事後，中國也拒絕了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對北韓的制裁。²⁸¹從這種跡象可以看出，此時期中國在各方面對北韓並不願採取過於強硬的態度。

而在東亞區域合作上，主要可以舉出鳩山政權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其在上台前便在 VOICE 雜誌中公開發表了《我的政治哲學》一文，並提出了建構「東亞共同體」的構想。其概念雖然並未排斥美國的參與，卻指出了日本最重要的合作夥伴為中國。此外，於 2009 年 10 月 7 日，日本外務大臣岡田克也也在外國記者協會演說時，首次表明東亞共同體的成員包括：日本、中國、韓國、東協、印度、澳洲以及紐西蘭。其中並未言及美國，因此引發了美國的不滿。面對民主黨的表態，中國甚感歡迎，因為這不僅意味著日美同盟的弱化，也具體反映了中國在東

²⁸⁰ 第 5 回日中韓サミット 三国間の包括的な協力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強化に関する共同宣言，日本外務省，2012 年 5 月 1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2/joint_declaration_jp.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

²⁸¹ 劉德海，(2010)，近期東北亞安全局勢中的南韓角色。《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頁 1-6。

亞地區的大國地位。²⁸²然而，此一構想雖然看似為中日關係帶來了轉變的契機，實際上卻沒有顯著的成效。且在日後的釣魚台紛爭發生後，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也隨之泡沫化，成為紙上談兵。整體而言，於此時期在加強互利合作這方面，中日兩國並沒有一定的成果。

最後則是針對「影響中國與日本在實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上的各項因素為何？」一問。首先就中國而言，可以看出不論是在胡錦濤時期或是習近平時期，中央領導人的權力雖然相當龐大，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守舊派及既得利益者們的勢力也不容小覷。如在胡錦濤時期，雖然其提出「和諧社會」的口號，受到既得利益者們的牽制，中國國內社會的改革無法順利執行。再加上當時胡錦濤政權受到國內批評對外政策過於軟弱，使其也開始容忍當時中國國家海洋局為「擁護權益」所展開的各項活動。到了後期，則開始展開以維護三大核心利益（共產黨領導、領土的完整、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保障）為主軸的外交政策，對外態度也愈發強硬。使即便胡錦濤個人對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持積極正面的態度，在關於東海的核心利益上中國則不輕易退讓，也成為了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無明顯成果的主因。而於習近平時期，亦是因為中國國內政治問題而間接影響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實踐。於習政權初期，受到了前政權對外過於強硬而導致周邊外交受損的影響，其在強調擁護權益的同時，也展開了一些修復國際形象的作為，其代表例即為「一帶一路」。然而為了穩定國內政治，其不僅加速了集權化政策的執行，也透過對外強硬的態度博取國內的支持；而於習政權後期，隨著集權化的進行，中國的國內政治環境漸趨穩定。再加上來自於美國的各种壓力，其對日態度也逐漸緩和。

而就日本而言，在民主黨時期影響戰略互惠關係執行的主因為當時的領導人。由於民主黨強調政治主導，首相的意見也顯得更為重要。然而，這樣的景象到了民主黨執政後期有所轉變，國內輿論以及國內社會環境對對外政策的影響力逐漸

²⁸² 李世暉，(2016)。鳩山、菅直人、野田：「東亞共同體構想」。載於李世暉、吳明上、楊鈞池、廖舜右、蔡東杰(編)，**當代日本外交**(頁 79-90)。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上升。而於自民黨時期，首相的意見也相當重要。戰略互惠關係原為安倍首相於第一次執政時所提出的構想，故此安倍首相對戰略互惠關係的落實相較於其他首相顯得更為積極。另外執得注意的是，日本財界以及國內輿論的影響力在與民主黨相較之下格外明顯。也可以說，在日本首相的權力固然為大，但由於牽涉到的各項國家利益較為複雜，因此在決策面上並不是單純探討領導人層面便能做出解釋的。此外，與中國相似，自民黨政權的對外政策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來自美國的影響。在川普政權上台執政後，中日兩國受到來自美國的貿易及外交壓力，使得中日關係拉近距離，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在 2017 年後的成果顯得相對豐碩。

第三節 本研究的意義

本研究將焦點放置在中日兩國的政策決定者的影響力上，因此也可以說是中日兩國國內政治構造的研究的一環。此外，本研究還加上了各項國際要因進行分析，因此也可以說是宏觀的國際關係研究。近年來，中國於國際舞台上的存在感逐漸上升。因此，本文藉由戰略互惠關係的事例。來解明中國近年影響對外政策的因素，為今後中國有可能採取的外交行動提出方向。

此外，筆者認為雖然現今的中日關係有回暖之跡象，然而中日間政經分離的狀態應該仍會持續下去，且中日兩國在亞太地區爭奪地域政治主導權的情況也不會停止。尚不可忘記中日兩國仍存在著長年以來的兩個根本問題：歷史認識問題及關於海洋權益上的各項議題（如：領土問題與海洋利益）。即便現今並沒有因這兩個根本問題而發生爭議，也無法斷定在未來中日關係是否會突然因此產生劇烈摩擦。除此之外，透過民意調查的分析也可以發現中日雙方國民對彼此的好感度仍不穩定，因此也需要注意如何不讓彼此國民間的感情影響到雙邊關係。所幸現在中日兩國領導人的政權相對而言處於穩定的狀態，安倍首相在自民黨內有領導對外政策的自主性，而習近平主席也在十九大會議後更加鞏固了其領導地位。筆者認為即便有美國此一不穩定的因素存在，但兩國領導人在未來若能真正建立

起相互信賴的關係，於「戰略」上不彼此猜忌懷疑，在經貿上也持續加深交流取得「互惠」，便能達成中日之間真正的「戰略互惠關係」。

第四節 未來的研究方向

最後，筆者欲以本文的研究結果為基礎，提出今後的研究方向。首先，筆者認為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五大領域雖然可以概括中日兩國的互動，是為廣義的中日關係。然而，本研究僅對近年來的中日關係進行廣泛的探求，在各細項上並沒有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故此，為了更加闡明中日關係的全貌，未來仍需要更多各項領域的相關事例研究。

再者，本研究雖然針對影響中日兩國對戰略互惠關係的執行，列舉出了多項國際要因以及國內要因並進行了相關分析，然而針對國際要因與國內要因相互影響力與其各自的影響力大小，礙於篇幅限制無法深入探求。為了使影響中日關係的各項要因的相互作用更加明確化，今後在中日關係的研究上，關於國際要因與國內要因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有所必要，在此方面仍有待後人探求。

參考文獻

壹、中文文獻

書籍

-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and Steven E. Lobell 著、劉豐、張晨譯。2017。新古典現實主義 國際政治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Ranjit Kumar 著、胡龍騰、黃瑋瑩、潘中道譯。2000。研究方法：步驟化學習指南。(台北：學富文化)。
- 王玉民。1994。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台北：洪頁文化)。
- 矢板明夫著、黃怡筠譯。2012。習近平：共產中國最弱勢的領袖。(台北：天下雜誌)。
- 石之瑜。2003。社會科學方法新論。(台北：五南文化)。
- 宋學文。2009。國際關係的理論與應用 入門、進階與研究設計。(台北：五南書局)。
- 李世暉，(2016)。鳩山、菅直人、野田：「東亞共同體構想」。載於李世暉、吳明上、楊鈞池、廖舜右、蔡東杰(編)，當代日本外交(頁 79-90)。台北：五南圖書出版。
- 明報專輯組。2015。明察天下 I—對日關係·中國問題·香港出路。(香港：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
- 金熙德。2000。日本政府開發援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林曉光。2003。日本政府開發援助與中日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馬立誠。2002。仇恨沒有未來：中日關係新思維。(香港：香港中和出版)。
- 寇健文、蔡文軒。2012。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臺北：博雅書屋)。
- 新華月報編。2008。暖春之旅—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 戴秉國。2016。戰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

期刊論文

- 石原忠浩。2008。「中日簽署『第四公報』後的中日關係與台灣」，**戰略安全研析**，第 38 期，頁 45-48。
- 石原忠浩。2010。「中國漁船碰撞日本巡邏船事件與日中關係」，**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 13 期，頁 19-23。
- 石原忠浩。2012。「『政治主導』的對外政策？——日本民主黨執政下的日『中』關係」，**展望與探索**，第 10 卷第 7 期，頁 42-58。
- 石原忠浩。2012。「日本首相也田佳燕訪中的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第 81 期，頁 37-45。
- 石原忠浩。2018。「安倍內閣『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回顧與展望」，**戰略安全研析**，第一四九期，頁 21-30。
- 朴炳光。2012。「北韓核武問題之未來展望」，**全球政治評論**，第 38 期，頁 21-24。
- 朴炳光。2010。「胡錦濤時期中國對北韓政策及其對北韓核武問題之認知」，**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頁 27-46。
- 李世暉。2011。「日本民主黨政權的外交政策思維」，**國際關係學報**，第三十二期，頁 157-173。
- 金正昆、張芳慧。2018。「中日關係演變與習近平對日外交戰略」，**貴州省黨校學報**，2018 年第 4 期，頁 56-63。
- 李思嫻。2015。「中國威脅論下的『和平崛起』論述」，**人文社會學報**，第 11 卷第 1 期，頁 63-80。
- 吳漢。2010。「從哥本哈根會議看中國應對氣候變化談判的策略」，**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1 期，頁 23-28。
- 李巍、王勇。2006。「國際關係研究層次的回落」，**國際政治科學**，2006 年第 3 期，頁 112-142。
- 周永生。2008。「日本國內關於東海問題的爭論」，**國際政治科學**，第 13 期，頁 99-129。
- 屈彩云。2011。「中日釣魚島爭端的發展及趨勢」，**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11 年第 2 期，頁 42-46。
- 胡令遠、高蘭。2015。「『積極和平主義』：日美同盟的福音」，**國際問題研究**，2015 年第 3 期，頁 21-35。

- 洪銘德。2015。「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之研究」，**全球政治評論**，第 51 期，頁 147-165。
- 徐志民。2015。「中國人眼中的靖國神社及其參拜(1950~2014)—以《人民日報》報導為考察中心」，**河北學刊**，第 35 卷第 4 期，頁 64-70。
- 秦亞青。2005。「現實主義理論的發展及其批判」，**國際政治科學**，2005 年第 2 期，頁 138-166。
- 高洪。2007。「關於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若干思考」，**當代世界**，2007 年第 4 期，頁 7-8。
- 高洪。2008。「略論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亞非縱橫**，2008 年第 3 期，頁 1-4。
- 高洪。2015。「略論 21 世紀日本對拉美外交戰略變遷」，**拉丁美洲研究**，第 37 卷第 1 期，頁 33-40。
- 晏英。2014。「“自虐史觀”與日本教科書問題」，**日本侵華史研究**，2014 年第 2 卷，頁 85-88。
- 孫承。2011。「菅直人內閣的對外政策與中日關係」，**國際問題研究**，2011 年第 2 期，頁 53-59。
- 時殷弘。2003。「中國接近與『外交革命』」。 **戰略與管理**，2003 年第 2 期，頁 71-75。
- 徐梅。2013。「經濟視域下的中日關係」，**日本學刊**，2013 年第 3 期，頁 41-53。
- 高蘭。2015。「突破“72 年體制”建立戰略互惠關係框架下的新型中日關係」，**國際觀察**，2015 年第 1 期，頁 87-98。
- 國分良成。1997。「1972 年體制的變化與發展協調關係之路」，**日本學刊**，1997 年第 5 期，頁 45-52。
- 許志嘉。2007。「中國新睦鄰外交政策：戰略意涵與作為」，**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8 卷第 3 期，頁 43-80。
- 張季鳳。2017。「中日經濟關係的新動向與今後展望」，**日本研究**，2017 年第 3 期，頁 25-30。
- 張璉堯。2004。「送走切尼 迎來金正日：判讀北韓核武問題走向」，**世界知識**，第 2 期，頁 9。

- 黃介正。2009。「歐巴馬亞洲行與美國亞太戰略轉型」，**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12 期，頁 1-4。
- 葉琳。2008。「“金融大危機對中日經濟的影響”國際研討會會議綜述」，**日本學刊**，2008 年第 4 期，頁 147-152。
- 蔣立峰。2008。「戰略互惠 合作共贏:中日關係發展新階段」，**日本學刊**，2008 年第 4 期，頁 18-27。
- 潘兆民。2011。「中國大陸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的戰略分析」，**展望與探索**，第 9 卷第 10 期，頁 13-18。
- 劉若楠。2010。「新古典現實主義的進展與困境—評《新古典現實主義、國家和外交政策》」，**國際政治科學**，2010 年第 2 期，頁 135-46。
- 劉德海。2010。「近期東北亞安全局勢中的南韓角色」，**全球政治評論**，第 31 期，頁 1-6。

網際網路

- 人民網，中日政府間文化交流協商會議機制在日本召開第 14 次會議，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8/0424/c35421-29944947.html>
- 人民網，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時隔 8 年重啟的三層考量，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8/0417/c35421-29930435.html>
- 人民網，中日韓簽署環境合作聯合行動計畫 將共同應對環境問題，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430/c157278-26933002.html>
- 人民網，日本民主黨眾議員談新政府對華政策，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7 日，檢自：<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9992431.html>
- 人民網，中國外交部就朝鮮再次進行核子試驗發表聲明，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10 日，檢自：<http://world.people.com.cn/GB/8212/9491/142315/9361835.html>
- 人民網，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 60 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全文)，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13 日，檢自：<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1024/3699888.html>

人民網，真實報導感動日本民眾 日本救援隊搭起中日橋樑(3)，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檢自：<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7286489.html>

人民網，習近平向安倍闡明中方對中日關係的原則立場，上網日期 2018 年 8 月 31 日，檢自：<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906/c1024-22824048.html>

人民網，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1526.html>

人民網，奧運拉近中日民間情感：“中日良性迴圈的開始”，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檢自：<http://world.people.com.cn/GB/14549/7689515.html>

人民網，RCEP 部長級會議在東京舉行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致辭，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702/c1002-30098463.html>

于潔，觀點：十九大後的中國外交「策」與「術」，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1673603>

大紀元，鳩山友愛外交 恐有行無市，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19 日，檢自：<https://www.epochtimes.com/b5/9/9/24/n2666670.htm>

中國外交部，2016 年 3 月 30 日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主持例行記者會，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351837.shtml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8 日，檢自：<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429414.html>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為了友誼與合作——溫家寶在日本國國會的演講，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17 日，檢自：<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5608455.html>

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13 日，檢自：<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72347/6347991.html>

中國能源網，第八屆中日節能環保綜合論壇在京舉行，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893579-1.html>

中國新聞評論網，日媒：日本大地震為改善中日關係提供契機，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3 日，檢自：
<http://hk.crntt.com/doc/1016/3/3/3/101633333.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633333>

中國新聞網，綜述：高訪"常態化"下的中日關係步入穩定發展階段，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檢自：<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5-01/1672632.shtml>

中國新聞網，媒體解讀"暖春之旅":期待中日關係"永遠是春天"，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18 日，檢自：<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8/05-12/1246165.shtml>

中國網，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2011 年治國理政紀實，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www.china.com.cn/policy/txt/2012-01/04/content_24316482_6.htm

中國證券網，第三次中日經濟高層對話簽署七項合作文件，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3 日，檢自：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311221530/http://cnstock.xinhuanet.com/index/gdxw/201008/814081.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舉青春之力 謀世代友好，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21 日，檢自：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08-12/18/content_1182041.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胡錦濤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60 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18 日，檢自：http://www.gov.cn/ldhd/2005-09/04/content_28944.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第八輪中日戰略對話在北京舉行 雙方願加強合作，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檢自：http://www.gov.cn/jrzg/2008-02/23/content_898806.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上網日期 2019 年 1 月 10 日，檢自：
<https://www.fmprc.gov.cn/chn//gxh/zlb/smgg/t450471.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胡錦濤在亞非峰會上的講話(全文)，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13 日，檢自：<https://www.fmprc.gov.cn/123/wjdt/zyjh/t192875.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8 日，檢自：http://www.mod.gov.cn/big5/affair/2011-09/06/content_4295874.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中美聯合聲明（全文），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2 日，檢自：<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zmsbzyjw/obama/t628909.htm>

日經中文網，日本就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提出 4 條件，上網日期 2020 年 6 月 15 日，檢自：
<https://zh.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2389-2018-09-26-09-04-06.html>

王緝思，和諧世界：中國外交新理念，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19 日，檢自：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6006746.html>

白云怡，TPP 變身 TPP11 中方坦率回應：沒有給予太多關注，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11/11374006.html>

矢坂明夫，習近平，充滿謎團，中國最弱勢的領導人，上網日期 2020 年 5 月 4 日，檢自：<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3641>

石原忠浩，民主黨政權是親中路線？：從小澤訪中團與習近平訪日事件談起，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3 日，檢自：<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政策報告/兩岸國際/2226-民主黨政權是親中路線？：從小澤訪中團與習近平訪日事件談起>

加藤嘉一，中國和日本 誰在靠近誰，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81023/abe-xi-be-good-buddies/zh-hant/台灣e新聞,親美派日本首相野田佳彥>

多維新聞網，日媒：中日一帶一路合作全面開展 安倍重申兩原則，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http://news.dwnnews.com/global/news/2018-10-25/60093460.html>

吳瓊靜，日本贊中國綠色發展決心 中日環保合作迎新契機，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japan.people.com.cn/n1/2017/0617/c35421-29345761.html>

林曉光，日本民主黨政府的對中政策，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7 日，檢自：
<https://news.cnyes.com/news/id/317254>

金燦榮，「巧實力」：歐巴馬外交政策回顧與展望，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4 日，檢自：<https://kknews.cc/world/2ob9g9.html>

陳志芬，兩會觀察：中國軍費和「維穩」開支，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6 日，檢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03/140305_ana_china_npc_army

陳積敏，2009 年中美關係：回顧與反思，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2 日，檢自：
<https://www.zaobao.com.sg/forum/letter/us/story20100101-50129>

新浪財經網，福田的“迎春之旅”，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17 日，檢自：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06/11191909748.shtml>

新華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由來，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3-06/06/c_116064614.htm

新華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19 日，檢自：http://www.xinhuanet.com/2018-02/25/c_1122451187.htm

新華網，背景資料：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1 日，檢自：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6/24/c_1115704629.htm

新華網，習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新華網，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張隕璧，2014 中日關係輿論調查 公眾好感度不樂觀，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5 日，檢自：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4-09/09/content_18568473.htm

黃安偉，國家安全法再次定義中國核心利益，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30 日，檢自：<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0703/c03chinamemo/zh-hant/>

黃安偉、安思喬，習近平的升遷之路，上網日期 2020 年 5 月 4 日，檢自：<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21116/c16bio/zh-hant/>

劉江永，菅直人外交政策或將被迫「右擺」，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19 日，檢自：<http://world.people.com.cn/GB/12367429.html>

蔣豐，”免費都不想去中國”—中日青年交流形成驚人”逆差”，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91027>

環球網，第十一次駐外使節會議在京召開 胡錦濤溫家寶講話，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3 日，檢自：<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mbkx>

環球網國際新聞，日本經濟團訪華尋突破 媒體猜“中方誰會見”，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http://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3-11/4577629.html

環球網國際新聞，日調查稱日本超 6 成受訪民眾支持釣魚島”國有化”，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5 日，檢自：<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07/2917080.html?agt=131>

環球網國際新聞，慶祝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 40 周年“中日大學生千人交流大會”在京舉行，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08/12872877.html>

BBC 中文網，中日韓三國將合作解決跨境空氣污染，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3/05/130506_china_jhapan_korea.shtml

BBC 中文網，安倍：中日應恢復戰略互惠關係，上網日期 2018 年 7 月 9 日，檢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01/130122_abe_china.shtml

BBC 中文網，「習安會」北京上演 中日首腦再次會晤，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4/11/141110_china_japan_talks

BBC 中文網，貿易戰來勢洶洶 美宣佈對華 600 億美元商品加稅，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3500214>

BBC 中文網，資料：中國「神舟」載人航天歷史，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8 日，檢自：<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38451050>

貳、日文部份

書籍

阿南友亮。2017。戰略的互惠關係の模索と東シナ海問題 2006-08 年。載於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關係史 1972-2012 I 政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

安倍晉三。2013。**新しい国へ：美しい国へ完全版**。(東京：文藝春秋)。

伊藤剛。2012。胡錦濤政権と新思考外交の挫折 2003-05 年。載於高原明生、服部龍二(編)，**日中關係史 1972-2012 I 政治**。(東京：東京大学出版社)。

岡垣知子。2016。ケネス・ウォルツの日本的受容。載於大矢根聡(編)。**日本の国際關係論**。(東京：勁草書房)。

岡田充，2012。**尖閣諸島問題—領土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魔力**。(東京：蒼蒼社)。

岡田実，2008。**日中關係と ODA—対中 ODA をめぐる政治外交史入門—**。(東京：日本僑報社)。

小原雅博。2018。**日本の国益**。(東京：講談社)。

笠原十九司。2011。**戦争を知らない国民のための日中歴史認識 『日中歴史共同研究<近現代史>』を読む**。(東京：勉誠出版)。

國分良成。2017。**中国政治からみた日中關係**。(東京：岩波書店)。

板垣英憲。2009。**友愛革命—鳩山由紀夫の素顔**。(東京：共栄書房)。

鈴木美勝。2017。**日本の戰略外交**。(東京：筑摩書房)。

高嶺司。2016。**日本の対中国関与外交政策—開発援助からみた日中關係**。(東京：明石書店)。

- 田崎史郎。2014。安倍官邸の正体。(東京：講談社)
- 田中明彦。2007。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日本の”現代”)。(東京：NTT出版)。
- 谷内正太郎、高橋昌之。(2009)。外交の戦略と志 前外務事務次官 谷内正太郎は語る。(東京：産経新聞出版)。
- 朱建榮。2012。中国外交 苦難と超克の100年。(京都：PHP研究所)。
- 豊田正和、小原凡司。2017。曲がり角に立つ中国 トランプ政権と日中関係のゆくえ。(東京：NTT出版株式会社)。
- 日本防衛省。2018。防衛白書—日本の防衛—平成30年版。(東京：日経印刷)。
- 春原剛。2013。暗闘 尖閣国有化。(東京：新潮社)。
- 伏見岳人、佐藤悠子、玉置敦彦(譯)。2018。日中 親愛なる宿敵(Sheila A. Smith 原著)。(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 2016 (東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松田康博、家近亮子、段瑞聰編著。2012。岐路に立つ日中関係—過去へ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京都：晃洋書房)。
- 丸川知雄。2009。「中国なし」で生活できるか 貿易から読み解く日中関係の真実。(京都：PHP研究所)。
- 宮本悟。2011。国際的制裁と対外政策。載於中川雅彦(編)。朝鮮労働党の権力後継(情勢分析レポート)。(千葉：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 宮本雄二。2011。これから、中国とどう付き合うか。(東京：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 宮本雄二。2017。強硬外交を反省する中国。(京都：PHP研究所)。
- 毛里和子。2016。中国政治 習近平時代を読み解く。(東京：山川出版社)。
- 毛里和子。2006。日中関係 戦後から新時代へ。(東京：岩波書店)。

期刊論文

- 安倍晋三。2012。新しい国へ 戦後の歴史から日本という国を取り戻したい、
文藝春秋，2013 年新年特別号，頁 131。
- Karol Zakowski。2016。安倍第一次・第二次政権の対中国外交—比較分析の試
み，**Silva Iaponicarum**，No.49，頁 24-60。
- 切通亮。2017。アジア太平洋リバランスの再考—オバマ政権後期における安
全保障政策を中心に—，**防衛研究所紀要**，第 20 巻第 1 号，頁 93-114。
- 小池修。2015。「東アジア国際政治のなかの日韓関係—国際関係理論からみ
た過去と展望—」，**危機管理研究**，第 23 号，頁 39-48。
- 小島朋之。2006。日中関係は戦略的互惠関係に，**東亞**，2006 年 11 月，頁
42-49。
- 小檜山智之。2018。オバマ政権のリバランス政策—「未完」に終わったアジ
ア太平洋戦略—，**立法と調査**，No.403，頁 109-122。
- 國分良成。2012。「『1972 年体制』から『2006 年体制』へ?」，**日本現代
中国学会ニューズレター**，第 36 号，頁 1-3。
- 瀬口清之。2014。中国経済の構造変化と日中経済関係，**フィナンシャル・レ
ビュー**，第 119 号，頁 191-218。
- 太田修。2007。「2005 年歴史教科書問題—『対話的』真実に向けて」，**文
学部論集**，第 91 号，頁 17-30。
- 中内康夫。2012。尖閣諸島をめぐる問題と日中関係—日本の領土編入から今
日までの経緯と今後の課題—，**立法と調査**，第 334 号，頁 69-84。
- 林隆司。2014。「『日韓軍事情報包括保護協定(日韓 GSOMIA)締結延期の要
因分析』—署名 1 時間前の土壇場で政策変更された背景にあったもの
—」，**海幹校戦略研究**，第 4 巻第 2 号，頁 76-98。
- 松本盛雄。2013。日中経済関係の変遷と「戦略的互惠関係」の再評価，**社会
システム研究**，第 26 号，頁 15-28。
- 村瀬信也。2007。日中大陸棚画定問題。**国際問題**，No.565，頁 1-4。
- 林賢参。2014。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閣の対中ヘッジング戦略，**問題と研究**，第
43 巻第 2 号，頁 27-63。

網際網路

朝日新聞 DIGITAL, (社説)日中首脳会談 新たな関係への一步に, 上網日期
2020年2月19日, 檢自: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3743636.html?ref=editorial_backnumber

小野甲太郎, 日中韓、難航した共同宣言 非核化へ温度差、道筋示せず, 上網
日期2020年2月20日, 檢自: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L594VCQL59UTFK00L.html>

海外ニュース翻訳情報局, 【ペンス副大統領演説:全文翻訳】「中国は米国の
民主主義に介入している」:ハドソン研究所にて, 上網日期2020年3
月19日, 檢自: <https://www.newshonyaku.com/8416/>

栞原響子, 中国のシャープパワーに翻弄され続けた世界, 上網日期2020年3
月30日, 檢自: <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14382>

經濟同友會, 実効性のある日中『戦略的互惠関係』の構築に向けて—日中兩
国政府への具体的提言—, 上網日期2018年10月6日, 檢自:

<https://www.doyukai.or.jp/policyproposals/articles/2010/110121b.html>

国会會議録 検索システム, 第百八十三回国会 衆議院會議録第二号, 上網日
期2020年2月20日, 檢自:

<http://kokkai.ndl.go.jp/SENTAKU/syugiin/183/0001/main.html>

産経ニュース, 鳩山会見詳報(2)完「友愛外交でEUできた」, 上網日期2019
年3月11日, 檢自:

<http://web.archive.org/web/20090529123603/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policy/090526/plc0905261915025-n1.htm>

Sankei Biz, 中国防空識別圏 撤回要求 首相「領海領空を斷固守り抜く」,
上網日期2020年2月19日, 檢自:

<http://www.sankeibiz.jp/express/news/131126/exa1311260901000-n1.htm>

城山英巳, 単なる親中派にあらず 小沢一郎「中国観」の本音, 上網日期2020
年3月18日, 檢自: <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760>

新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会, 新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会最終報告書—日中「戦
略的互惠関係」の強化へ向け—, 上網日期2020年6月7日, 檢自:

https://dl.ndl.go.jp/view/download/digidepo_4023437_po_hokoku.pdf?contentNo=1&alternativeNo=

首相官邸，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上網日期 2018 年 7 月 9 日，檢自：

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0111kaiken.html

首相官邸，第 71 回国連總會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

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6/0921enzetsu.html

首相官邸，第 174 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19 日，檢自：

<http://warp.ndl.go.jp/info:ndljp/pid/11236451/www.kantei.go.jp/kan/statement/201006/11syosin.html>

首相官邸，第百七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野田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19 日，檢自：

<http://warp.ndl.go.jp/info:ndljp/pid/11236451/www.kantei.go.jp/jp/noda/statement2/20110913syosin.html>

首相官邸，第百八十回国会における野田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19 日，檢自：

<http://warp.ndl.go.jp/info:ndljp/pid/11236451/www.kantei.go.jp/jp/noda/statement2/20120124siseihousin.html>

首相官邸，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説，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

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128syosin.html

首相官邸，第 68 回国連總會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

https://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3/26generaldebate.html

首相官邸，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20 日，檢自：

<https://www.kantei.go.jp/jp/feature/gaikou/index.html>

首相官邸，中国四川省を震源とする地震の発生に対する福田総理発胡錦濤国家主席及び温家宝総理宛見舞いの伝達，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檢自：
<https://www.kantei.go.jp/jp/hukudaspeech/2008/05/12message.html>

首相官邸，日中第三国市場協力フォーラム 安倍総理スピーチ，上網日期
2020年6月15日，檢自：
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8/1026daisangoku.html

政府インターネットテレビ，第174回国会における鳩山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
針演説，上網日期2020年3月30日，檢自：[https://nettv.gov-
online.go.jp/prg/prg3202.html](https://nettv.gov-online.go.jp/prg/prg3202.html)

人民網日本語版，王毅駐日大使に聞く（3）安倍首相の訪中を評価，上網日
期2018年12月19日，檢自：
http://j.people.com.cn/2006/12/12/jp20061212_65869.html

人民網日本語版，中国大使に丹羽宇一郎氏が決定，上網日期2020年6月15
日，檢自：<http://j.people.com.cn/94474/7027881.html>

人民網日本語版，日本民主党「靖国神社は絶対参拝しない」，2020年6月
15日，檢自：<http://j.people.com.cn/94474/7027881.html>

JJJI.COM，ドキュメント鳩山内閣，上網日期2020年3月18日，檢自：
https://www.jiji.com/jc/v2?id=20091031hatoyama_cabinet_vol2_07

独立行政法人 日本学生支援機構，外国人留学生在籍状況調査，上網日期
2020年3月3日，檢自：
https://www.jasso.go.jp/about/statistics/intl_student_e/index.html

独立行政法人 日本学生支援機構，協定等に基づく日本人学生留学状況調査，
上網日期2020年3月3日，檢自：
https://www.jasso.go.jp/about/statistics/intl_student_s/index.html

永井央紀、加藤晶也，「平和の海」残るリスク 日中、衝突回避へ連絡体制，
上網日期2020年2月20日，檢自：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30344700Q8A510C1EA1000/>

内閣官房，「国の存立を全うし、国民を守るための切れ目のない安全保障法
制の整備について」の一問一答，上網日期2020年3月20日，檢自：
<http://www.cas.go.jp/jp/gaiyou/jimu/anzenhoshouhousei.html>

内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上網日期2020年2月
19日，檢自：<https://survey.gov-online.go.jp/index-gai.html>

内閣府世論調査，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上網日期2020年5月4日，檢自：
<https://survey.gov-online.go.jp/index-gai.html>。

内閣府世論調査，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5 日，檢自：

<https://survey.gov-online.go.jp/h24/h24-gaiko/2-1.html>

日本財務省，財務省貿易統計，上網日期 2020 年 5 月 4 日，檢自：

<http://www.customs.go.jp/toukei/info/tsdl.htm>

日本政府観光局，月別・年別統計データ(訪日外国人・出国日本人)，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3 日，檢自：

https://www.jnto.go.jp/jpn/statistics/visitor_trends/index.html

日本外務省，安倍總理の訪中(全体概要)，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

自：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4_004452.html#section11

日本外務省，新日中友好 21 世紀委員会，上網日期：2020 年 6 月 7 日，檢

自：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jc_yuko21-2/index.html

日本外務省，「戦略的互惠関係」の包括的推進に関する日中共同声明，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22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0805_ks.html

日本外務省，第 5 回日中韓サミット 三国間の包括的な協力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強化に関する共同宣言，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12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2/joint_declaration_jp.html

日本外務省，第二回日中ハイレベル経済対話の概要と成果，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0906_gs.html

日本外務省，第 4 回日中韓サミット 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及びエネルギー効率の推進による持続可能な成長に向けた協力，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18

日，檢自：<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1/energy.html>

日本外務省，中華人民共和国過去の要人往来・会談，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檢自：<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index.html>

日本外務省，中国四川省における大地震に対する緊急援助について，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h20/5/1180110_907.html

日本外務省，持続可能な開発に関する共同声明（仮訳），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18 日，檢自：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jck/jizoku_kai_ka.html

日本外務省，日米首脳会談，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page3_001017.html

日本外務省，日米首脳会談(概要)，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11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noda/usa_120429/pmm.html

日本外務省，日米首脳会談(概要)，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0755.html

日本外務省，日中高級事務レベル海洋協議第 1 回会議（概要），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30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jc_kk_1205.html

日本外務省，日中共同プレス発表，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16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abe/cn_kr_06/china_kpress.html

日本外務省，日中共同プレス発表，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17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0704_kh.html

日本外務省，日中首脳会談（概要），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visit/0807_sk.html

日本外務省，東シナ海における日中間の協力について（日中共同プレス発表），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18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higashi_shina/press.html

日本外務省，福田総理の中国訪問（概要と評価），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17 日，檢自：https://www.mofa.go.jp/mofaj/kaidan/s_fukuda/china_07/gh.html

日本外務省，福田総理訪中スピーチ『共に未来を創ろう』，上網日期 2018 年 12 月 17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fuk_1228.html

日本外務省，復興支援・観光促進に関する日中協力，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3 日，檢自：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jck/summit2011/pdfs/jc_fs.pdf

日本外務省，北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平和と協力のための共同宣言，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rp/page3_001450.html

日本外務省，李克強・中国国务院総理の訪日 日中首脳会談及び晚餐会，上網日期 2020 年 5 月 4 日，檢自：

https://www.mofa.go.jp/mofaj/a_o/c_m1/cn/page1_000526.html

日本経済新聞，榊原経団連会長、日中対話で「戦略的互惠関係に貢献」，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24265070V01C17A2EAF000/>

日本経済新聞，中国副首相「中日関係に前向きの動き」 経団連会長と会談，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LASFS12H72_S7A610C1EE8000/

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第 1 回日中企業家及び元政府高官対話共同声明，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19 日，檢自：

<https://www.keidanren.or.jp/policy/2015/104.html>

日本民主党，民主党の政権政策 Manifesto2009，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11 日，

檢自：http://archive.dpj.or.jp/special/manifesto2009/pdf/manifesto_2009.pdf

日本民主党，民主党の政権政策 Manifesto2010，上網日期 2019 年 3 月 11 日，

檢自：<http://archive.dpj.or.jp/special/manifesto2010/data/manifesto2010.pdf>

ニッポン放送，森友・加計問題はもう飽きた？世間の関心は外交が 8 割，上網

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19 日，檢自：<https://news.1242.com/article/141637>

鳩山由紀夫，政・官の在り方，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1 日，檢自：

<https://www.cas.go.jp/jp/siryoku/pdf/090918siryoku.pdf>

防衛省/自衛隊，日中防衛当局間の海空連絡メカニズムに関する第 7 回共同作業グループ協議(結果概要)，上網日期 2020 年 2 月 20 日，檢自：

<http://www.mod.go.jp/j/press/news/2018/04/11g.html>

みずほ総合研究所，中国『4 兆元』の経済対策の考察，上網日期 2020 年 3 月

30 日，檢自：<https://www.mizuho-ri.co.jp/publication/research/pdf/asia-insight/asia-insight090105.pdf>

参、英文部份

書籍

Bruce Martin Russett and Harvey Starr, (1992). *World Politics: A Menu for Choice*, 4th Ed., New York: W. H. Freeman.

Kenneth Waltz,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enneth Waltz,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James N. Rosenau, (1980).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Nichols
Publishing Company.

期刊論文

David J. Berteau and Michael J. Green and Zack Cooper, (2014). Assessing the Asia-Pacific Rebalance.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pp.3-8.

David Singer, (1961).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14(No. 1), 80-89.

Ellings, Richard J., Robert M. Hathaway, Colin Clarke, Anand Yang, Davis E. Bobrow, Amitav Acharya and Parag Khanna, (2010). Roundtable. Are We Adequately Trai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sia Experts? *Asia Policy* (No.9), pp.1-43.

Gideon Rose,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51(No.1), pp.144-172.

網際網路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Retrieved March 3 2019, from: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China seen as biggest threat to stability, Retrieved December 18 2018, from:

<https://www.ft.com/content/89261466-0a79-11dd-b5b1-0000779fd2ac>.

How Xi Jinping views the world, Retrieved February 19 2020,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8-05-10/how-xi-jinping-views-world>

Moving toward a reconciliation of civilizations, Retrieved March 2 2019, from: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09-01/15/content_7399628.htm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to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Retrieved March 3 2019,

from: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The G-2 Mirage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Not Ready to Upgrade Ties,

Retrieved May 4 2020, from: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east-asia/2009-05-01/g-2-mirage>

The Men Who Must Change China, Retrieved May 4 2020, from: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2/10/27/the-man-who-must-change-china>

The World Bank Data, Retrieved March 4 2019, from:

<https://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

Trump steel tariffs: Trading partners threaten retaliation, Retrieved February 19 2020,

from: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43251320>

U.S. is back' is Asia,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declares, Retrieved March 2

2019, from: <https://www.nydailynews.com/news/world/u-s-back-asia-secretary-state-hillary-clinton-declares-article-1.429381>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8 : Financial Stress, Downturns, and

Recoveries, Retrieved February 23 2020, from: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6/12/31/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08-Financial-Stress-Downturns-and-Recoveries-22028>

